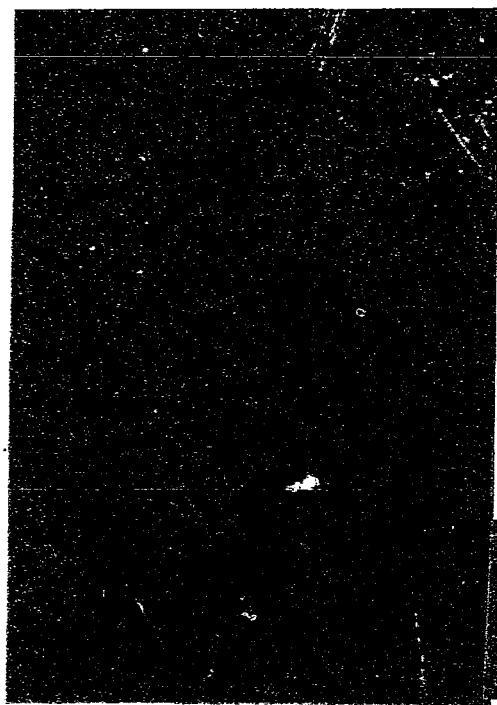


戰時的青年知識

編 夫 健 陳



S
M
D
2

MG
D432.9
221

戰時的青年知識

陳健夫編

新知識書店出版

938

6714



3 1798 7722 4

00437

目次

新的世界觀·····	一
新的世界的誕生·····	六
新的世界和舊的世界·····	一三
新的時代與新的青年·····	二七
新的民族領袖·····	三八
新的戰爭的術藝·····	四一
新的財政問題·····	五七
新的外交原則·····	六九
新的政治訓練·····	七六
新的軍事訓練·····	八四

新的邏輯及其方法	一九二
新的科學	一〇七
新的文學	一一一
新的教育	一一七
新的教育原則	一二二
新的哲學研究	一二七
新的文學研究	一三五
新的語文	一四二
新的大眾語文	一四五
新的通俗文	一五〇
新的職業觀	一六二
新的文學生活	一六五
新的人生觀——新的世界觀的一部分	一六九

新的人生觀·····	一七六
新的婦女觀·····	一八四
新的戀愛觀·····	一八六
新的道德觀·····	一九一
新的理論和新的實踐·····	二〇一
新的社團生活·····	二一一
新的讀書人·····	二一六
新的追求知識的三條路·····	二二二
新的思想訓練法·····	二三〇

新的世界觀



(南)

人類對於整個世界的認識，是人類歷史中最近的事。人類對於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整個聯繫的認識更是最近的最近的事。

在地板上爬來爬去的螞蟻，不會相信有立體世界的存在。蚯蚓的世界就只是它的周圍幾方尺的泥土。在現在回想我們的祖先，真和螞蟻蚯蚓一樣地可憐可笑。在十三四世紀以前，西人不知道大西洋以外有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在元明以前，中國人老是相信中國是在世界的中心。中國以外的四夷只是世界的邊緣。

在人類歷史的最近的年代中，因交通方法的進步，人類對於世界的認識範圍是擴大了。人類知道了地有七大洲和四大洋，更知道地球是屬於太陽系的一個星球，而太陽系又是無量數星系中的一個。這樣人類算是認識了世界的廣大範圍，可是却還沒有完全理解了人類自身和這外部世界的整個聯繫。換句話說，人類的世界觀，還是沒有充分地擴大，至目前為止，還有

一部分人類被拘囚在封建的種族的或家族的世界觀的狹隘籠子裏邊。

舉個例來說：德國雖然產生了愛因斯坦這樣一個大數學家，發明相對性理論，可是一大部分德國人民還是誤信着種族的世界觀，以為日耳曼人種超越一切人類。希特勒就利用這種謬誤的世界觀，建立他個人的權威，驅使德國人民到戰場上，爲了資本家和軍火商的利益去送死。

說到我們中國人，直到最近爲止，我們主要的生產手段是限於農業，就是有了些手工業和農村商業，範圍却是十分狹小的。在這農業生產的社會中，一切都自給自足，用不到和外部世界發生關係。因此，一向我們的世界觀是封建的家族主義的。中國人一向主張「只掃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佛家提倡「出世」，儒家主張「與世無爭」，詩人渴想着「世外桃源。」這些都可以證明中國人是有意或無意地無視外部世界的存在的。

對於外部世界雖然取無視的態度，對於內部的小世界，却又取非常積極的肯定態度。這小世界是以家族作中心，以與家族有關聯的親戚世交作外圍，而在家族中又以家長作中心，以妻妾子女作外圍，儒家的倫常，代表中國人的世界觀的整個系統。孝經是中國人人生哲學和世界觀的全部。出仕是爲顯親揚名，做官是爲位置親友甚至賣國求榮，却無虧於孝道。這些都是中國

人的世界觀的實踐的結果。

可是自從帝國主義的軍艦駛入了中國口岸，資本主義的商品侵入了中國農村以後，中國人一向的偏狹的世界觀，是已根本動搖着了。因利源外溢農村破產的結果，向來靠着耕種土地過生活的農民，整千、整萬地流遷到都市裏，變成了工業無產者。中小地主也不能靠剝削地租爲生；一個個都傾家蕩產，整個民族都成了帝國主義剝削的對象。到了現在這一天，要回復這自給自足的農村社會，固然辦不到；拿從前的家族本位的生產組織，抵抗和潮水一般湧進來的舶來品和外國資本，更是一無希望。因此，我們原來的狹隘的世界觀，是絕對沒有保守的可能了。

假如中國本來已有強大的國防和工業，本來已有了抵抗外力侵略的工具，那麼我們或者還能和墨索里尼、希特勒、荒木所夢想的那樣，建立種族主義的世界觀。不幸我們又不曾具備這些條件，在半殖民的中國現狀下，更不許今後中國有強大國防和工業的建設。因此要在中國造成一種民族的幻想，事實上也不可能。經過百年來的帝國主義侵略，許多次的喪權失地，中國的國家主義的幻想，已經消失無遺，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但是中國竟是這樣無望了嗎？不是的。不但不是無望，而且正因它的偏狹的世界觀消失以

後，新的廣大的世界觀，方纔建立起來。有了這新生的世界觀，才有了中國的新生。

什麼是新生的世界觀呢？我們的世界是一整個體系，在這一整個的體系中，各部分是互相連繫着的，資本主義的商品制度更加緊了這些連繫。目前世界的各部分都因商品及資本的流通流換，發生密切的經濟關係，由這密切的經濟關係，更發生密切的政治文化關係。每個部分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關聯的。就我們中國來說：雖然在窮鄉僻壤，家家戶戶都用着美孚的煤油，內門的洋碱。中國的茶是供給倫敦貴族家庭的消耗的，絲是作巴黎時裝的原料。不但如此，美國宣佈白銀國有，就影響到上海銀行的現銀庫存，中國發生一次內戰，就增加了一次國際軍火商人的荷包。這些事實，都證明着我們的生活是和全部世界的生活密切聯繫着的。

但在這整個世界的體系中，却又包含着無數大大小小的矛盾；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與新社會制度的矛盾，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矛盾……這些矛盾一天天在進展，轉變，消滅，却沒有一個不直接間接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在各種矛盾中都有我們自己的一部分。

舉歷史的事實來說明罷，中國在閉關時代，對於中國以外的四夷爭戰，看作「蠻觸相爭」和中國全不相干。一直到上次世界大戰，中國雖然在表面上為參戰國之一，實際上却視為不關

痛癢可是到現在，大家的觀念就不同了。大家知道爭奪中國市場，爲帝國主義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帝國主義間的一切矛盾，都直接間接影響到中國。日本的強佔東北，根本就爲了進攻蘇聯的一種準備。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恐慌，使帝國主義不得不加緊對於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剝削。至於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矛盾，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前途，那是更無待說明了。但是另一方面中國自己也能推動促進轉變這現象的矛盾。中國的連年水旱，農村崩潰，購買力降低，促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恐慌，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對於帝國主義最嚴重的威脅，同時也是對於全世界的革命運動，一種強有力的聲援。要是詳細的分析一下中國的一切都脫離不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繫，與外部世界的相互因果關係。

把握住了這一點，才能明白我們不是孤立的，我們的一切努力也不是孤立的，我們自身的努力促進各種矛盾的轉變統一，而各種矛盾的進展，也增加我們的努力的效果。因此我們和外部世界是一致了。

5
認識我們和全部世界的連繫性，努力去促成世界各種矛盾的進展，同時我們就在這矛盾中進展着。這樣我們才跳出狹隘的世界觀的籠子，而建立起新新的世界觀了。（胡愈之）

新的世界的誕生

人類畢竟是需要刺激的動物，在全部的文化史上，我們看見每經過一次大的災患，人類就要覺悟一次，十四世紀氾濫於世界的黑死疫，曾經造成了叫人寒心的大恐怖，但是這次大災難，却有機會使得當時呻吟於大蟲血爪下的受難者，頓時覺醒起來，僧侶，貴族，地主，豪強們趁着天災流行的當兒，壓榨敲剝是越來越兇，終於點起了奴隸們反抗吃人制度的怒火。二十世紀間，人類的大劫總要算上次的世界大戰，這戰爭毀滅了無量數的生命和物力，却也造就了人類變革世界的絕好機會。世界的大衆是從此更認識了世界和自己，認識了朋友和仇敵，而且在地球的一角早已揭開新歷史的序幕了。現在我們彷彿又看見有六分之五的地球是陷在黑死疫的恐慌中，這黑死疫不是天災，却是人禍，各國億萬的災民是在淒厲地嚷着飢餓，望着賣不掉而傾在海裏毀在火裏的糧食，由發怔而憤怒，由號哭而抗鬥。在同一時期，却又看見到處冒着火藥氣味，比上次更大的戰爭恐怖，在威脅每一個愛好和平的人。於是上帝的兒女們便警告着說：「看啦，

天國近了，世界末日快到了。」

的確，我們是逼近一個末日，不過這不是世界的末日，却是表面文明骨裏野蠻的黑暗社會的末日，這末日的前面是殘殺，欺詐，剝奪和饑餓，後面却是光明，自由，親愛和快樂。跟着大多數人的一致覺醒，人類歷史將換過一個新頁。在那時，坐在審判座上的，不是三位一體的神，却是創造世界的人，受審判的，不是一「慢神叛道」的「罪人」，却是巧取豪奪的「大亨」。這便是世界的重生。同時也就是人類文化的重生。

我們歡迎新世界來到，可是同時該認識世界的重生是必然要經過一個相當時期的分婉痛楚，忍耐不住這痛楚，就只有投入於黑暗的懷抱，只有做奴顏婢膝的叩頭蟲。

有眼睛的該朝四方看看，我們到底是處在一個怎樣的世界中？然後想想我們該怎樣對付自己的環境。哼着一輩子「今夫天下」的老糊塗不知道「天下」有多少大，這是一點不用希奇的，但是如果甘願站在時代前頭的青年，不懂得今日的世界是怎麼一回事，那是斷斷說不過去的。

平日留心國際政治經濟文化，不斷地吸收新的世界智識，當然是認識世界最主要的法門，

可是我們更需要對現代世界的特質有着正確的全盤的理解，不要爲世界的外表裝璜所迷惑而應該將我們的眼力透入於世界機構的內層，這樣才會增強我們替新世界接生的能力。

現代世界文明表面上是建築在機械與科學上，但是說也奇怪，今日不是人類驅使機械，却是機械支配人類，不是科學替廣大人民造福，却是少數人利用科學來行屠殺，行榨取，許多勤勞者是變成了機械的一部分，變成了機械與科學的俎上肉，於是有人咒詛機械和科學，又有人提倡什麼「精神文明」和「東方文明」，甚至西洋鬼子也會唸起阿彌陀佛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機械和科學的鬼靈在那兒作祟呢？還是現代世界文明有了殘疾呢？相信祝由科和張天師符籙能治病的人認爲前者是對的，而相信科學醫理的健全人却認爲後者才是正確的。因爲在那正在努力征服自然而廢除人剝削人的國土裏大規模的機械使用和科學研究不但沒有妨礙大眾的幸福，而且正在開墾一個廣大的人間樂園，在另一個世界裏却就在機聲隆隆聲中充滿着殘刻，醜惡與險詐，這可以斷定這個老世界定規有了毛病，主要的是：機械與科學是在少數不生產者的掌握中，甚至連照料機器者和科學研究者也在他們的支配之下，所謂機械與科學也就消失了牠們原有的光輝，只不過變成了榨取大眾膏血來替少數大塊頭製造補品的

怪物罷了。你以為現在是機械發達科學猛進的時代嗎？可是你不要忘記，在歐美等「文明國家」有許多上好的機器是放在那裏生鏽，有許多新的科學發明是給人收買了去永遠關在黑房子裏，不見天日，機械生產了無數的貨色，他因為找不到許多顧客，是在棧房裏生着黴。或者索性讓海和火吞了去，這樣自然又將千百萬的生產者拋斥在街頭。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社會的生產力還有希望發展嗎？人類還能從機械和科學的本身要求着一種普遍的幸福嗎？所以寄生制度的黑漆一團，生產力受着壓抑得不到自由透氣，造成最可悲慘的浪費，大多數人被驅逐到饑餓的大海裏去，這是現代「文明世界」的第一特色。

科學和機械雖然在生產方面受到了遏制但是在殺人的事業上却得到了驚人的發展，無數科學家和機械家的腦力正消耗在戰爭利器的製造發明上，光是秘密發明的毒氣現在已不知有了幾多種，槍炮和軍艦飛機的發明已經不是第一次大戰時所能想像到的了，在別的產業鬧着普遍不景氣的時候，獨有軍火製造家和販賣家在那裏眉開色喜。這告訴我們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爲着要重新分割世界，爲着要復仇，爲着要攻擊資本主義的敵邦，都在發熱病似的準備仇恨的戰爭，資本主義列強各自在自國和殖民地，屬領，勢力範圍的四周築起經濟政治的萬里

長城，展開空前未有的市場與資源的爭奪戰，使各國間的猜忌，仇恨在發酵般的增長着。在另一方面，各國的吸血者正在用最無恥的榨取方法來吸取勤勞者和殖民地的最後一滴血，假如說現在資本主義還能在恐慌中掙扎一下子，而不致馬上蹣跚，那是全靠敲剝的格外加緊，這樣就加劇了資本主義致命的矛盾，因着恐慌的日益深廣化，使一些老國家對於新興國的仇恨增長，自然是在意料中了。所以現世界的第二特色，是各國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跟着世界恐慌的劇化而一天一天尖削起來，人殘害人的悲慘也日益增大着。

作為現階段世界的第三特點的，是資本主義的腐化和頹廢傾向，所有為資產集團豢養的科學，哲學家，藝術家正在組成精神主義的合唱隊，提高嗓子宣揚神道和國粹主義，江湖式的「預言家」是大走紅運，連身為總理的世界要人紅人也不能不求神問卜了。（前次報上登載一段希特勒問卜的消息想來不是捏造的）政治上極殘暴的寡頭制度一盛行，文化破壞主義和異族排斥主義也就着猖獗。許多國家人民連透氣的自由都喪失了。達爾文主義也在犯罪之列，其餘還消說嗎？什麼自由，民主，科學現在是索性一脚踢開，十九世紀末葉的資本主義頹廢傾向——即所謂「世紀末」——和現在簡直是比不來了。

這樣的一個舊世界的臭皮囊還能繼續長久存在嗎？世界有生氣有血性的人還能讓它長久存在嗎？

我們是站在一個歷史的大轉灣點，同時臨到了一個大災難的前夜，因為世界是安放在裝好了引線的炸藥上，第二次世界大戰血洗地球怕是不遠的事。雖是我們明明知道戰爭不可避免地要到來，但是却不能靜靜地等待着它。要知道任何帝國主義的戰爭都是殘殺世上最有生氣的人，都是毀壞人類的物質精神文化的。我們不用恐怖也用不着幻想逃避，因為逃是逃不了的。拯救世界報復帝國主義殘殺的唯一方法，是團結大眾的戰鬥力量實行堅決的長期的抗爭，由民族的自衛戰發展成爲消滅國際帝國主義的戰爭。只有大眾的力量是轉禍爲福的鐵的保證。

歷史是在分娩的痛楚痙攣中，我們應準備迎接世界的新生。不用學盧騷一批人主張回到自然，也不用像「辣的黨」(Luddites 英國十九世紀初破壞機器的工人)因憤恨機械而要求廢棄機械的使用，我們正需要一個大規模驅使機器和科學的新世界到來，在這世界中，機械與科學將成爲全人類合力征服自然的武器，而不再是吸血敲骨及屠殺人羣的兇器。但是

若不首先拆毀現代阻礙生產分裂人羣的舊世界構造，我們是無從實行一致「槍口對外」——即全體合力征服自然的。（倩之）

新的世界和舊的世界

提起世界誰也不會忘掉這六分之一的土地，六分之一的土地並不是與六分之五的土地脫離關係，也不是由於地殼的變遷忽然出現的。它是從舊世界的胚胎裏產生的，而且還是從資本主義世界胚胎裏產生出來的。

這六分之一的土地就是現在的蘇聯。從十月革命到今天一共已有十九年的歷史了。這個十九歲的孩子，是經過很多困難的奮鬥才長成起來。人們對於這孩子可以算得是毀譽兼施，但到底事實最雄辯這孩子終於成人了。

我們之所以要提到蘇聯，並不是一定舉出它的好處來歌功頌德，無非是想就事論事看這個世界，是不是應該走一條大路。換句話說，看這個以新姿態出現的國家，是不是能夠成爲典型

的模範？

蘇聯建設的成功，已成為有口皆碑的鐵證。一考歷史，它在大戰後，在一九二二年前，那時一則因為國內的秩序尚未排列起；一則因為外部的破壞正在加強。所以也和資本主義世界一樣，鬧得恐慌，不過恐慌的性質稍有不同吧了。自此以後，就進行所謂「新經濟政策」，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止。在這個時期中，蘇聯的一切建設，才回復到戰前的水準。而這個時候，在資本主義世界方面，也正是所謂「繁榮」時期。所以就發展說，這時，還不能說蘇聯一定會優於資本主義世界。但是自「第一次五年計劃」實施後，蘇聯的建設成績，却蜚聲宇內了。

第一次五年計劃本來是打算在一九二八——三三年間五年當中完成的，然而由於蘇聯社：制度的不同，生產關係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很順利地在一九三一年就使計劃完全實現，一共僅化了四年又三個月的工夫。這個時候，蘇聯的工業不僅有了良好的成果，而且農業也有了長足的進步。一九三二年度蘇聯工業總生產額達六百八十一萬萬盧布，較一九二八年增加三倍。農業方面，全國農民百分之六十已加入集體農場，耕地的四分之一，已由國營農場或集體農場來大規模的耕種。這種成績，本來值不得誇耀；可是和同一時期的資本主義世界一

比較，那真是「相形見拙」。資本主義世界，像前面說過的，不是正在恐慌中鬧得天翻地覆嗎？九三二年蘇聯的建設，還算不得奇觀。第一次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不過在發展重工業和使農業集體化與機械化吧了。那麼，奇觀又在那裏呢？

第二次五年計劃——一九三三——三七年——才是驚人的發展。這次計劃，在政治上要澈底肅清資本主義份子，要全蘇聯大眾，都成爲社會主義積極的建設者，要增進工農勞動者的生活條件。在經濟上，打破工業與農業技術的不平衡還不夠，一定要做到工業的電氣化。據計劃規定，一九三七年機械工業生產額，至少要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三倍或三倍半；電力至少要增至一千萬萬基洛瓦特；煤產量增至二萬萬五千萬噸，即較一九三二年約增三倍；石油產量也要增加一——三倍；鐵道要建成二萬五千至三萬公里的新路。在輕工業方面，農業方面，都是按比例要較第一次五年計劃增加若干倍。

自第二次五年計劃施行到今天，已經三個年頭了。這個計劃，正是配合着資本主義世界「特種蕭條」的時期，假如有錢人的謀士說：這有什麼稀奇，請看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指數，不是增加了嗎？現在就列一個表來看一看吧。（一九二九——一〇〇）

資本主義世界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五年
蘇聯	六二・四	八三・五
	一八二・七	二七五・〇

(本表引自世界知識第四卷第六號第三〇二頁)

數字相差太遠，實在比不得一比就會醜態畢露。就農業說，一九三六年蘇聯全國又是豐收，機器耕種機站 (I. M. S.) 由一九三五年的三九七七所增，至今年春季的四九四〇所就，過去兩年的小麥收成說 (單位千擔)

	一九三三—三四年	一九三四—三五年
資本主義世界	一〇一、三六〇	九七、七〇〇
蘇聯	三三、二〇一	三五、二一〇

當五年計劃開始的一年，馬爾杜爾就說過：

「社會主義在農業方面已爭得新的世界歷史的勝利了，但資本主義世界底農業情形又是怎樣呢？在資本主義世界麥子、糖、米底耕種面積都繼續減少了，無論甚麼地方耕地所用的肥

料都比較減少，一部分的曳引機，割打聯合機和農業機器，全無法使用，在美國和加拿大，今年麥子年成之壞，是資本主義世界四十年來所未嘗見過的……美國羅斯福底計劃，把麥子耕地減少百分之十五至二〇。雖然成百萬的饑餓者，爲數日益增加……三百五十萬包棉花被毀滅了，一千萬英畝地上的棉花被掘倒，被毀滅。」

「只有一個唯一的國家，得能擴大耕種，提高收成，只有一個唯一的國家不知恐慌爲何物。」

（引自時事類編第一卷第八期第五一〇頁）

就工人的生活情形說，在蘇聯總是每年進步的。今年前八個月全國大工業中工人數，增加百分之八·三，平均每月工資增加百分之二〇·八。據蘇聯中央統計局的調查，今年上半年，每個工人家庭的貨幣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五·五。茲將最近幾年蘇聯國民收入的情形列表如下：（以一九二六——七年的不變價格爲基準）

年 份	總額(十億盧布)	對前一年的百分比	對一九一三年的百分比
一九一三	一一·〇	—	100·0
一九二一	八·〇	九五·三	三八·一

一九二八	二五・〇	一一五・六	一三七・六
一九三一	四五・五	一一一・二	一九四・八
一九三三	四八・五	一〇六・六	二三一・〇
一九三四	五五・八	一一五・〇	二六五・七
一九三五	六五・七	一一七・八	三一二・九
一九三六(計劃)	八三・一	一二六・五	三九五・七

(此表引自世界知識第四卷第十號第五二八頁)

世界上有錢的美國國民收入，在恐慌時期（一九二九——三三）減低了一半以上，（百分之五二）同一時期，德國的國民收入，幾降低百分之三九。別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差不多是類似的情形。

再就存款說，今年前八個月內，工人在儲蓄銀行的存款共達七萬萬九千零三十萬盧布，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七一・八。

說到吃，希特拉不特不吃肉連牛油也沒有得來吃的。可是在蘇聯，今年上半年，全體工人平

均每口人肉類的消費額，增加百分之三六。同期，豬肉消費，約增加兩倍（百分之八三）；雞鴨消費，約增加一倍半；脂肪消費，竟增加三倍；糖的消費，約增加百分之六一；水菓消費，約增加兩倍。其餘的無不增加。

至於衣服，今年上半年，蘇聯平均每人的消費，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四，其中購買物服者，竟增加三倍；而重要食品 and 一般物價，是比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十三的。

最後，講到文化、教育、健康各方面，這裏用不着再來舉例。我們知道，蘇聯的文旨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時，就要完全消滅了。我們知道蘇聯不特正在創造新文化，而且正在發揚舊有的遺教了，像沙士比亞、果戈里、托爾斯泰這一類的名著。而且蘇聯國民的普遍體育運動，對於他們的健康，都是足以令人驚異的。

從上面的一些例子看，已能知道蘇聯建設進展的大體輪廓。這是什麼道理呢？這就是一個「計劃經濟」的成功啊！

「計劃經濟」之所以能成功，並沒有什麼神奇的地方，它全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結構之上，才得以實現的。大家都知道，社會主義的經濟關係，基本的一點是生產手段不為私人佔有，因而

生產關係，不再是勞動力的剝削，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於是社會建設，才獲得顯著的成績。這一點，也就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根本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統制經濟」醫不好資本主義老病最基本的理由。

蘇聯建設本已着着成功，再加上斯達哈諾夫運動的推行，就過去一年中的成績看，更是突飞猛晉，眼見第二次五年計劃，又將於四年中完成了。

在國內的情形是這樣，在國際上，也顯示出蘇聯地位特別的活躍。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已獲得全世界的共譽，特別是受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歡迎；就是資本主義國家，除目前積極從事侵略戰爭的國家外，也要以這和平的重鎮是賴。現在全世界的國家，除極少數都與蘇聯恢復了邦交。早在一九二五年，蘇聯就提出「互不侵犯條約」相號召，第一個接受這提議的是土耳其。一九二六年與德國、阿富汗立陶宛；一九二七年與波斯（現改名伊蘭）；一九三二年與芬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波蘭、法國；都先後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一九三三年夏季，又重申不侵犯條約的意義，與許多國家簽訂了幾個重要協定：（一）與阿富汗、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斯、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等七國締結了一個不侵犯協定；（二）與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即小協約國）訂立

了一個協定，土耳其也參加的；(三)與立陶宛單獨訂立一個協定；(四)是年九月與意大利訂立了不侵犯條約。一九三四年十月，蘇聯允三十四國的邀請，加入國際聯盟，一時國聯聲勢頓時昂揚起來。蘇聯外委李維諾夫，每次在國聯會議席上所作的和平演說，如下侵略國的定義，提倡集體安全制度，為阿比西尼亞呼籲和平等等，無不吸引多數的觀衆，和博得讚美的掌聲。從此以後，國聯在消極作用上，逐漸表示出成爲一種維持和平的機構，一換從來專供帝國主義做分贓機關的面目。而自一九三五年二月，法蘇互助公約成立後，使歐洲的和平陣線，建立起更穩固的基礎，接着捷蘇、羅蘇互助公約的締結，更增加了和平陣線的勢力。在遠東除不斷向日本提出締結互不侵犯的條約外，今年春間成立的蘇蒙互助公約，又說明整個世界的和平陣線，已經展開到東方來了。這一些，無疑是證明蘇聯和平外交的勝利，這勝利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前途，有着極密切的關係。這是我們一點也不能忽視的。

蘇聯是正向着和平建設之路邁進了，佔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的人們是隨着歷史的齒輪走着康莊大道，跨着長步地邁進了，可是其餘六分之五的土地上的人們，又向着什麼方向在行進呢？

這時候，再也沒有什麼新的理論，可以用來替資本主義辯護了。週期性的經濟恐慌，本來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但結果又被資本主義的發展破壞了。這是什麼原故呢？這是不是上帝鑄定的命運呢？不是的，那完全是社會經濟的結構，沒有適合於人類生產力發展的原故；而那種經濟結構，也不是什麼上帝鑄成的，只不過是少數人與多數人間的關係，弄得不合於「人性」的發展吧了。根據我們上面的分析，已經夠明白，現在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儘管害着不可救藥的病，但經過各種各樣的手術，到底還有最後的一息，還能表現出「特種蕭條」的景氣，說它一定就壽終正寢，恐怕未免太武斷一點吧？

是的，提到資本主義的生死問題，的確不能武斷它今天一定會崩潰，明天一定會死滅。不過，大家都看見它的病的確是一天比一天沉重，這已不是今天才發現的事實，從它出生時起，它就帶有一種病根，通常所謂「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是指「生產社會性和佔有私人性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就是醫不好的病根。以前，資本主義在青年時代，壯年時代，病發作過後，克服的力

量還有一點，所以恐慌發生，結果還可以回復到繁榮。只可惜它現在是愈趨衰老了，它對於人類的貢獻，已經盡完了。所以自一九二九年以來，靠它吃飯的那些「大老闆」，不過盡可能地把這「死馬當作活馬醫」吧了。

很顯然的，目前的資本主義世界，那裏看得見一點培養資本主義的元氣的东西。生產是害的偏頭風，消費是攢的牛角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經由慢性肺癆，轉為急性肺炎了。

但是，謀士們並未準備資本主義的後事，在他們的眼睛裏，只把法西斯蒂的統治方法，殖民地的掠奪戰爭，當作資本主義返老還童唯一的滋補劑。軍火商的一些老鬪們，不是正擁護那些法西戰神嗎？

的確，在我們看來，資本主義世界，果然「殺氣騰騰」，在「特種蕭條」過程中造成的「火藥庫」，有錢人滿心以為這就是資本主義唯一的出路啊！

不管那是不是資本主義唯一的出路就目前的形勢說，法西魔王們統治的天下，朝着「戰爭」的路上跑，總算得是一日比一日更來得鮮明的事實。

看！東方的戰神，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就打起戰鼓，向着它那「愛好和平」的隣居着

着進攻西方的戰神，一個早在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就伸出它那「長靴式」的鐵蹄，蹂躪了東非的「黑人王國」；一個在「第三帝國」的夢裏，正向歐洲展開了戰旗到處都點起烽火了。一直到最近，這些自命爲資本主義的救星，還企圖勾結起來，擾亂整個世界的安寧秩序。

世界上三大法西斯侵略主義的國家，明目張膽地要重新分割世界土地，共同反對蘇聯，從德意妥協（今年三月德奧協定成立以後）共同援助西班牙叛軍，到日德同盟（今年十一月）以至意大利承認僞滿與日本締結協定，這是說國際和平破壞者的陰謀網，已經張佈出來，接着它們要把幾年來集的「私房」軍火，向全人類表彰他們挽救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功勳。

但是，誰能說「法西戰爭」（因爲這是一對孿生子）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出路呢？火藥氣味下的血腥統治，與其說是挽救資本主義的「法寶」，勿甯說是毀滅資本主義的「地雷」。

看！整個世界，隨着法西斯侵略主義的抬頭，反法西戰爭的和平勢力，也就日益高漲，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內，在蘇聯我們都看到英勇的和平運動。美國無數次的和平示威，幾十萬大學生以罷課擁護和平的熱烈情緒，這說明金元帝國儘管充實國防，軍火大老，鬧儘管出賣軍火，可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裏，已經有了另一種新的因素。美國的人民陣線運動，

已經由勤勞大眾，自由主義者，和平擁護者結成了。

在英國，右傾的政府，儘管祖護德國，包爾溫內閣儘管增大軍事國防費，甚至英國的法西主義，儘管蠢動；可是英國愛好自由和平的人，却不斷地增加，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反法西的大示威運動，已經說明英國的人民陣線具備了擴展的基礎。

在法國，今年二月更成立了人民陣線政府，每次表現的反法西鬥爭，是說明軍需工業大老闆們支持的右派勢力，終於無法抬頭。在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與叛軍的英勇鬥爭，更證明前途是光明的。

在法西侵略主義國家內，到處都起來反抗血腥的統治了，特別是日本的人民陣線，已經建立起鞏固的基礎。

資本主義國家反法西的鬥爭如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對侵略戰爭的情形更加熱烈，我們前面已經有過例證了。

至於蘇聯，它以新社會制度的資格，自然是無條件的反法西反戰的主力軍。單看蘇聯全國人民無論老幼，援助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軍的熱情，便可知道。

世界的法西侵略主義，固然已由個別的行動，進而爲聯合的陰謀，形成了國際間的侵略陣線，但是世界反法西侵略主義的陣勢，也在「保衛和平」的共同目標之下，結成了更堅固的和平陣線。誰都知道，這是以法蘇互助公約爲模型的。

時代的車輪不息地向前邁進，人類的歷史不斷地趨向光明。蘇聯是以新姿態出現於世界上，資本主義國家不一定走「戰爭」這一條路，也在上述的事實中看到了；就是那發動侵略的資本主義國家——日德意也只有少數人才主張用「戰爭」來開闢資本主義的血路，多數人是正在爭取自由和平哩！那麼，資本主義世界往那裏去，不待言也可以想像得到的了。

然而法西侵略主義者正在進行「戰爭」，却是誰也不敢否認的。假如今日的世界，還是一九一四年前的世界，那麼，我們可以斷定說資本主義世界的出路，只有一「戰爭」。正因爲目前的世界已經走上新的階段，才使帝國主義的「戰爭」，沒有爆發；不然，一九一四——一九年的覆轍，恐怕不到明天，早就又要重蹈的了。（柳乃夫）

新的時代與新的青年

有如人體的發育依賴新鮮的有生命的細胞，時代的進展依賴活潑有爲的青年。

誰都承認，爲感應新的狀況起見的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的要求一到了活動的時期，青年是脫不了干係的，不但脫不了干係，而且他們還獻身在隊伍的前列。無論在東方或在西方，各種改革運動——不論運動的傾向如何——的前鋒隊都是由最年輕的分子充當的。

這現象在各國間也許有進步的程度的差異，但沒有這現象的國家幾乎可以說沒有。這現象是非常緩慢地逐漸逐漸起來的，所以牠對於未來的重要性常爲人們所忽視。要是我們試把現代青年的氣質和他們的前輩的氣質作一番比較的觀察，我們就不難完全認知這新勢力的意義了。

青年運動的種種表現各不相同，但不論在何國，牠們總與本國中最尖銳的問題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容否認的舉世一致的情形。對於各國青年運動很詳知而且常和各國青年運動的

領袖們接觸的一個美國新聞記者湯姆孫氏 (Valentine Thomson) 曾在紐約時報發表一段概括地比較各國青年運動的文字。他的觀察雖未必完全準確，但我們卻不妨把他引述當作參考的資料。他說：

「目前，最尚武的和最革命的青年是在中國、印度、南美與中美諸國。組織最好的是在中歐諸國，特別是在德國。在那兩個自大戰以後激烈地改變了他們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國家——俄國和意國——青年處在爲使新制度鞏固起見的鬭爭的前鋒。」

「在那些個人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也就是號稱最興盛的國家——法國、英國和美國——青年在組織方面和意志方面都最薄弱。但這也只是比較的情形而已。就是在這些國家，要是我們把運動的生氣和他開始活動的期間的短暫作對比，我們就清楚地明白，青年對於超個人以上的種種問題的覺醒是以非常的速度前進的。」

教育與革命常同時並進，自從西洋教育輸入我們中國，我們從前如睡獅一般的文化的基礎就開始動搖。由專制而共和，由共和而黨治，這其間不知多少青年學子喪失了他們的生命的，以後的革新中，更將有不知多少青年學子準備着喪失他們的生命。在日本，公然謀害首相襲擊

官署以求達到他們的志願的乃是軍事學校的學生。在印度，對於英國統治下的武備的攻擊全出於高等學校的男女學生；出於成人們的，多少不脫甘地的無抵抗主義的方式。在南美，每一次民衆運動都以驍勇的青年學生作前驅。

在歐洲諸國，青年運動的興起大都是受舊式的「沙果耳主義」(Sokolism)的感應。「沙果耳主義」距今六十年前起源於屬於捷克斯拉夫族的波希米亞。那時候，波希米亞民族正呻吟於嚴重的壓迫之下，但在那時候，捷克的國家主義卻不能用政治的形式公開表現。於是，希求保存國家的生機，希求建設國家的文化，希求到達解放的時機，這種種熱烈的欲望終於在一種名叫「沙果耳」的青年組織的形式中表現出來。

從表面看來，「沙果耳」是一種專門屬於體育訓練的組織。但牠的創設者卻早已認知，對於健康、體力和自恃等興味的復興足以謀民族自覺的統一和鞏固。果然，「沙果耳」到了後來成爲具有堅定的革命精神的人物的中心；幾乎全部的捷克斯拉夫青年都加入了這個組織。捷克斯拉夫民族的解放得力於這個青年團體，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沙果耳」思想不久如傳染病一般蔓延到波蘭。波蘭的人民正掙扎着在三重統治之下

求全國一致的國家主義的表現。波蘭的國家主義存在於嚴重的壓迫之下。波蘭人民的解放，波蘭青年運動的擴展，得力於「沙果耳」思想的影響着實不小。

這是值得注意的，「沙果耳」從開端就具備晚近在許多國家中為感應新的狀況而起的種種青年運動所有的特徵。

他們表示青年對於機會不均等的制度的叛逆；他們放棄個人主義而趨於組織的活動；他們要求而且進入一種高尚形式的勇敢；他們形成藉以推翻舊秩序的統治的威勢的前鋒；目前他們又在新的和急迫的情形的壓力之下顯明地分成兩派：一派是維持現狀的保守黨，一派是向左的急進黨。

在德國對於現狀表示叛逆的青年運動，無論在組織方面或範圍方面都很可觀。牠的範圍這麼廣泛，至於幾乎所有在選舉年齡以下的德國青年都成為這個運動中的分子。在世界大戰以前，運動的形式是純社會的，是對於教育制度上種種不公平的權威思想的反動。學生們和年輕的工人們成羣結隊走到鄉野地方，以自動的力量作自然的活動。參與活動的青年們自己須遵守種種的紀律，特別是禁絕煙酒及其他陋習。

這運動的進步這麼迅速，至於牠被認為與德國的國家的生命有關。這些年輕的漂遊者有「遊鳥」(Wandervoegel)之稱。不久，爲這些漂遊者的隊伍供給住宿的設備成爲必須計劃的問題。起初，各地的校舍可以借用，後來，專門爲他們設備的宿舍在各地建築起來。目前，全國中已有可供四百萬青年漂遊者寄宿的設備了。

德國的青年運動不但迅速地進步，而且隨着牠的進步同時成爲系統化。地方團體與其他地方團體接觸。不久，由地方團體聯合而成的全國總組織成立了，這全國總組織又與英法及其他各國的青年組織接觸，交換參觀，交換圖書，互相辯論，共同研究中心的問題。

大戰以後，德國的危機逐漸消失，德國的青年組織開始向政治方面擴展。到了目前，他們處在全國革命分子的隊伍的前列，而且，和各處的青年組織一樣，分成各走極端的兩派——就是以希特勒爲領袖的國家社會黨和左翼的急進黨。

最近，在希特勒與政府之間似乎又發生一個關於統率青年的顯明的鬭爭，當與登堡總統新近公布一種爲「鍛鍊身體，遵守愛秩序愛同伴的紀律以求全體的福利」起見的青年團體的制度以後，希特勒立即不落後地宣言不久就要創設一個德國從來未有的大規模的青年團

體。

在意大利青年幾乎是一切法西斯計劃的基礎。意大利人民從孩子時代起，就成爲政治設計與社會設計的明確的單位。他是國家必須占有而且必須培養的資產。從學校生活第一日起，兒童就受半軍事式的訓練。到了在通常的兒童只專心於遊戲的年齡，一個意大利的青年棒喝黨就感到自己身上負有重大的任務了。

每一個棒喝黨的學校兒童都有「裴里拉」(ballia)之稱。裴里拉原是一七四七年抵抗奧國軍隊的一個熱諾亞兒童的名字，因此這名字就成爲法西斯組織的象徵。「裴里拉」是意大利青年從孩子時代起就開始受法西斯訓練的許多級序中最低的一級，凡八歲至十四歲的兒童都屬於此。

一個年輕而熱誠的意大利棒喝黨曾對一個外國記者說道：「自然賦與意大利的是豐富的無上的美麗，卻不是豐富的物質的以財。所以我們必須訓練意大利人，教他們從開始就勞作和服從紀律。」

實在，當外人以 Venice 或 Florence 的美景向一個意大利青年讚美時，他顯然不大高

與。他會得這樣回答：「我們不願以我們的過去的歷史被人稱賞。我們的公共事業，我們的交通大道，我們的繁盛的實業，這些纔是我們所以自豪的呢。」

俄國施於青年的計劃比意大利的計劃更超脫傳統，後者不過是舊法的劇烈化和組織化而已。在俄國，學校就是整個社會組織的雛型，每一個兒童都得參預公共的努力。使兒童面對實際工作的問題的「設計教育」正在那里實行了。在工人方面也勵行着同樣的教育。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消弭那存在於學問和生產之間的鴻溝；他們要求勞力者即勞心者，勞心者即勞力者。每一個學校中都有「前鋒戰員」的隊伍，他們的顯明的宗旨是激勵他們的同伴去從事「社會主義的鬪爭」。

目前，青年運動的基本的動機可以說是到處相同。任何國家的青年向來都不能在議會中占一席之地。權力向來被保留在長於政治的競技而且致力於他們有分兒的制度的永存的那些成年人的手中。這制度一直依照自己的定律邏輯地發展着牠的機能，而結果卻使世界的大部分捲入空前大戰的漩渦。青年，在引起大戰的種種原因的釀成上毫不曾參預的青年，在大戰發生的時候卻驟然被徵募了去首當其衝。

許多青年的生命和許多青年的前程，都葬送在強迫從軍的義務中。但國家對於他們的犧牲是有預約的交換條件的。青年的被徵發去從軍是爲了新的和更良好的秩序可以從此產生。戰爭是爲了打破世界的畸形，稍除文化的障礙，以及種種使青年戰士甘願犧牲的好結果。當時誰都承認，國家對於青年所負的債務確實非常浩大，這是非金錢的數量可計的另外一筆戰債。和其他戰債一樣，這一筆戰債尚未清償。世界對於青年的種種信約完全沒有履行。世界不能供給機會與捷徑以來發展與穩固，這情形的普遍已不僅限於許多大戰時期的交戰國。在大戰時期，許多國家的青年都覺得必須捨棄私人的幸福，必須冒生命的危險去從事非他們自己親手造成的戰爭；同樣，在目前，幾乎到處的青年都覺得必須爲求他們的生存起見去參預世界的改造。

這問題特別是青年的問題，因爲在青年首當其衝的殘破的局面之下，他們必須隨時適應任何情狀的改變。從學校出來的男女青年找不到出路。從前青年可以自由跨進去的門戶現在都閉塞了。

於是青年反抗，青年挑戰，青年變得認真而且暴戾除選擇職業和選擇從事職業的地點以

外，青年更努力求根本問題的解決，努力求怎樣纔能恢復已失的機會這一個問題的解決。

在今日，這是一個對於成人和青年都有切身關係的比任何其他問題格外嚴重的問題。因為政治上的強者無力解決牠們的矛盾，政治上的弱者遂被迫去找求一種團結的形式以增強他們的力量而且申訴他們的願望。

可是對於這同一問題，青年所持的見解顯然和他們的前輩不同。在考察一個成人的態度的時候，我們就理會到這個差異。一個成人已走上生活的道路，無論在經濟方面或政治方面多少和已往的情狀發生關係，而且已在舊制度之下養成思想與行爲的習慣。只要他有住的房屋，有工作的職務，有社會的和政治的牽連，他自然畏忌會使他動搖的任何徹底的改革。除非繼續增長着的不安定已把他的一切關係全毀滅了的時候，他決沒有面對根本改革的預期的勇氣。

至於青年卻很少——即使有的話——有如成人一般種種須得加以顧慮的束縛。他們面對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他們沒有穩定的地位——甚至連不穩定的地位也沒有，這些地位只保留在他們的前輩的手中。他們毫無顧忌，他們可以清算一切，他們覺得斷然的行動似乎可以使他們獲得一切而無所損失。他們的意志不為經驗所磨滅，不為失敗所挫折，他們一味聽任

繼續加重的他們自己的需要的壓力的驅使，這樣到處的青年傾向於各種斷然行動的擁護。

青年運動的力量各國互異，大部分和各國由舊的一狀況的改變的尖銳的程度成正比。新時代的信條是什麼，須得從青年在改變的情況下的態度去預測，無論在東方或西方都是一樣。

這信條正和青年的這麼廣泛這麼協力的組織的衝動相依從。無論牠的表現方式是徹底的俄國式的集合主義，是意大利青年的半軍事式的武備教育，或如其他國家的比較模糊的形式，青年的顯明的信條卻是一致的。這就是舊時代的個人主義已被打倒了，個人的利益必須隸屬於公衆的利益的时代已到來了。

這見解是不足怪異的。試一想青年的致力於團體的組織正是因為他們對於個人的問題不能作個人的解決的緣故。這不是個人的失敗，卻是使個人成功的條件的失敗；這情形如今很明顯了青年的叛離效果惡劣的個人主義的秩序不容說是當然的事。

無疑的，青年運動掌握未來時代社會的和政治的局面的鑰匙，因為將來實施他們的志願的就是現在從事運動的青年。

那麼，未來的新時代的情形是怎樣的呢？記者敢代全體從事運動的青年作下列的宣言：

「在十九世紀，人類爲個人的自由而戰鬪。在二十世紀，我們將爲超於私人私益的公衆利益的統治而戰鬪。人生的標的不是少數特權階級的個人的幸福，卻是人類全體的福利。舊時代的人們忽略了人民第一依賴他們的社會的關聯。我們的使命是掃除不合公衆需要的一切個人主義的傾向和一切私人的貪望。」

青年在達到這個標的以前，自然免不了許多錯誤的凌亂的步驟和誤認的指針，但他們的正在向着這個標的進行而且一定能夠達到這個標的乃是無疑的。（月 祺）

新的民族領袖

在顧頡剛氏主編的大衆知識（第一卷第四期）上看到一篇文字，題目就是「論非常時期的領袖。」這篇文字解釋領袖的意義，領袖權力的來源以及現時我們所要擁護的領袖等等，有許多話，正是我們所要想說的，這裏就把其中的若干要點摘錄在下面：

「領袖是從羣衆裏面產生出來的，領袖本身即是羣衆的一分子，其特殊之點是領袖有組織羣衆的能力與領導羣衆的地位。」

「領袖不是自己造成的，是社會環境造成的，無論一個領袖有怎樣的本領，他一定要忠實擔負羣衆所付與他的使命，始能維持其領袖的地位。」

「領袖何以偉大？是因為有羣衆做他的背景；領袖何以有力？是因為有羣衆合成的力量供他運用。所以不僅領袖的地位是社會羣衆造成的，領袖的力量也是社會羣衆給他的。」

「領袖的權威與力量是羣衆擁護的結果，維持領袖地位的最好方法是消極地不要脫離

羣衆的立場，積極地要領導羣衆去追求羣衆所願望的目標……爲鞏固羣衆的組織，當然需要鐵的紀律，但是有組織始有紀律，如果不組織羣衆，甚至不准羣衆有自動的正當組織，不領導羣衆，甚至惟恐羣衆之覺醒而處處以紀律鉗制羣衆的正當活動，壓迫羣衆的言論，這就是放棄羣衆的行爲。用這種壓力對付羣衆，或者可以收效於一時，能夠維持一時的地位。但是長久下去，必定使羣衆灰心失望，喪失羣衆的信仰……領袖所取的方法是精誠團結，是要使羣衆誠心悅服，願意效死，獨裁者所取的方法是暴力壓迫，使羣衆攝於淫威，不得不服從。

「中國現在非常時期中……目前舉國一致的願望便是抗敵救國。誰能領導民衆誠意抗敵，他便可以獲得民衆的信仰，做民族領袖……」

這些話，我們認爲都十分中肯，值得讀者思索玩味。最後我們尚有一點意思要補充，是關於領袖與歷史的關係的。

領袖這一個名詞，用舊一點的字眼來代替，不外是「英雄」「豪傑」之類。歷史上英雄豪傑的出現，大抵不在承平之世而在社會發生大變動的時期。那時候，社會制度舊的已經破敗，新的尚未建立，因而社會上呈現着種種矛盾和紊亂的現象，羣衆的生活也就絲無保障，一般羣衆

爲要求生存起見，都渴望太平世界的到來，一遇到社會上有才能超衆的人，就信仰他，擁護他，希望他能將大家從「水深火熱」的苦境中解救出來，於是這人便被擁爲領袖，成了英雄。這是領袖所以產生的根源。（這一點意思，大衆知識上的文字也會提到。）由此更可以見得領袖的產生，決不在他的本身而在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換一句話說，就是客觀的歷史條件。所以領袖要想對時代有所貢獻，唯一條件是認識他所擔負着的歷史使命，把握住當時羣衆的迫切需要，然後運用羣衆的力量，努力去求實現。如果只想利用機會，犧牲羣衆的福利來造成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地位，那必然要爲羣衆所遺棄。毀滅一個領袖比造成一個領袖要容易得多，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例證是舉不勝舉的。（金仲華）

新的戰爭的藝術

一

新的世界大戰，在最近的國際形勢的發展中，不論你站在任何立場，大致沒有誰再敢加以武斷的否認了罷！「戰爭是遲早要發生的，」已成了大家一致公認的預言，並且它馬上就要實現了。這不論你願意不願意，當前的世界客觀的實踐是如此。

打開每日的報紙，我們祇要把華盛頓、倫敦、巴黎、柏林、羅馬、東京那些地方每日發生的大小事件，指揮那些事件的時代的要人們（政治領袖，經濟要人，軍事專家……）的一切活動，綜合起來，他們一致忙的是準備戰爭，這已是鐵證的事實，就連他們自己也不能加以否認了。

時代謀於這些「巨人」肩上的最重要的課題是新的戰爭的藝術問題。這一問題不獨是主持將來戰爭場面的英雄們現在值得虛心的去研究與學習，即全世界被壓迫的大眾，連各

帝國主義國內的勞動大眾都在內，都應大大的加以注意，認真的去學習這一戰鬥的藝術。因為我們要反對世界大戰，要祈求世界和平，消滅殘忍非人道的屠殺，也不能避免與壓迫者的一場惡戰，我們在爭取自己的最後勝利的把握，當此戰機危迫的今日尤為急迫的需要。

新的戰爭的藝術，切不可認它是一個單純的技術的問題。這原因很簡單，因為新的戰爭是比第一次大戰更大規模的一種近代的戰爭。第一次大戰已經告訴我們，戰爭並不是幾個野心家造成的遊戲，戰爭的勝負不單在軍事技術上。第一次大戰是「國民間」政治的大鬥爭，為擴張工業販路與重分殖民地的國與國間互相狙擊，戰爭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新形態之發生的「消極條件」，它與恐慌同一作用，在整個資本主義的體系內，是舊的資本勢力的改編，資本的集中進入一新的過程。因此戰爭的規模，戰爭組織，是在動員一國家集團的一切力量來遂行的，戰爭再不僅是軍事技術的問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了近階段戰爭的新的藝術。

新的戰爭的性質雖然依據目前的形勢可以有兩種性質，一是帝國主義間的戰爭，（這裏包括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戰爭），一是反蘇戰爭。我們姑不論戰爭在那一意義上爆發，但新的戰爭的藝術必然是高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更進步的一種新藝術是無可懷疑的。

這一藝術，現在雖還祇在創作的開始，却已有很多的天才的作品供我們的研究了。

我們先從資本主義王國的天才的作品加以考察，但同時我們要特別介紹現時中日戰爭——「一二八」上海戰爭及關外義勇軍戰爭——中許多戰爭的藝術作品給一切反帝國主義的被壓迫大眾，因為這是我們最後解放的武器。

二

新的戰爭組織過程的基礎的藝術，是極力掃除資本主義的體制內經濟的無秩序狀態。近代戰爭對於一國支配階級的運命是「如果別的方面沒有甚麼變動發生，則戰爭影響之大小，實與各個國家資本主義托辣斯之經濟組織的強弱，成正比例。」所以戰爭的爆發前，及進行中，爲着戰爭的要求，與戰爭組織過程的強化與持久性都集中在生產過程之集中化與分配之合理化與組織化。這一過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強化於戰爭開始後，這是因爲資本主義在一九一四年時代尙是國家資本主義較脆弱的年代的緣故。可是，在現在迥然不同了。一九一八年以後，尤其是一九二三年以後，世界資本主義進入了暫時穩定的階段，它的特質是大戰期間獨

佔資本化的加強，在產業組織與技術方面都做到所謂「科學的合理化」了。但是這決不是說資本主義間矛盾的掃除，真正做到「合理化」了，它不過是資本步步的進入獨佔化，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頂點的一種衰老的徵象，同時它擴大了資本世界對立，輾轉造出了世界經濟恐慌爆發的一些前提條件。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到底爆發了，恐慌給與資本主義的作用又是極度的促進資本集中。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所謂資本主義的「統治經濟」就變為帝國主義間一致奮鬥的標的，它成爲新的戰爭的藝術之一形態而出現，爲新的戰爭出現之前兆。

這裏我們可以舉出幾幅「最偉大的作品」來。頂有名的是美國的藍鷹運動了。我們切不要被美國資產者所濛混，以爲產業復興祇是對恐慌的一種一時的對策！不錯，產業復興運動是由恐慌所引起的，同是一種對恐慌的對策，但真正目的可是在滅除「產業混亂形勢之產生」（產業復興法第一部第一條立法之目的）「使各個產業組織化，在政府指揮監督之下，排除不公正之競爭，發揮現存之生產能力。」（同上）不獨如此，參議員奈尼更老實的承認「復興法規促進資本的獨佔化，」「復興法規不過是大工業的附庸。」這是標本的經濟的法西斯化。

在日本，所謂「壓制經濟」亦鬧得震天價響。在鄉城之助的經濟國策之革新的著作中，即主張托辣斯和卡忒爾爲生產統治的核心組織。以「非常時」的名義，主張用主要的產業所組成的大企業聯合底方式來增大利潤，縮減工資，及禁止妨害國家經濟及大小利益的罷工，怠業的法規等，已成爲理論與實踐一致的要求了。日本在滿洲不獨統制了交通工業，礦業，鹽業，紡織業，並且在各種企業聯合的大單位間，更由政治的強制形成了比母國更堅固的經濟組織，現在由「日僞經濟同盟」更進一步要求日華經濟同盟了。

其他如德國用暴力去剝奪猶太人的獨佔資本去增強日耳曼人的獨佔資本，造成戰爭的經濟基礎與英法用較和平的掠奪中小階級，以達到獨佔資本強化，其性質一般無二。

雖然，他們這種努力在消除國內外經濟的矛盾一點上不能不是完全的絕望，但它在備戰的一意義上是有着特殊的意義的。這種經濟強化的要求，是說明了新的戰爭的嚴重性，它自然還是集中的開始，如果戰爭一旦爆發，它還可用國家的名義強制的壓縮集中起來，成爲更高度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集體，當作戰爭的基礎。

經濟組織過程是新的戰爭佈置的重心，頂溫和的殺人藝術作品之一。

與克服生產無秩序同時並行的是克服政治上「民主」的鬆懈，政治進入空前未有的獨裁。就日本論，日本底統治階級在戰爭準備中，政治的任務是加速建立一個極端的國家主義的政府。我們細心考察日本近年來的政潮，我們看出資產階級執政的各集團內進行重新配合，獨立政黨的政綱愈成爲失了各自的特殊性了。著名的政治家，上至總長，大臣，首相都被人刺殺了。這是十分露骨的代表爲的要急速把全部政權更可靠的讓渡到軍事獨裁者手掌中去的一種政治清算。

不僅日本如此，其他各帝國主義國家亦同樣在進行這一藝術的創作。德國自希特勒登台後，政治的獨裁可說更甚於老牌的法西斯的意大利了。最近政變更說明了統治階級內部力量還有重新配合的必要。希特勒在興登堡死後襲得大總統與國務總理之職，是德國政權要發揮到超偉馬憲法的最高峯，至於希氏的政權將來如何，那是另一問題，總之德國政權的發展，除革命外，是不會再轉「民主」的。

陶爾斐斯的被刺也是階級內部力量重新配合的一個好例子。這是法西斯與法西斯互爭殘酷的血的國家主義政權的領導罷了。這一內鬨雖然不見得即已告終，但政權之愈趨於獨裁是可預言的。

至於以一「保護民主反法西斯主義」為標榜的法英美，在帝國主義者準備戰爭中不是失去其意義嗎？不！法國社會民主黨的民主保護者，不論是左的布留姆也罷，右的倫議德也罷，他們從來沒有像現在親密的在法國總司令懷中撒嬌，迎順軍人集團的意志去進行內政外交，強化國內政權。所謂民主反法西斯不過是在維持凡爾賽的尊嚴下的假屍體啊！

英國的麥唐納先生，他是比倫議德更溫和的人，他與鮑爾溫除名姓不同外，實在找不出什麼差別可分了。他現在正埋頭幫助政府擴張軍備，並無絲毫忽視政權的強化呀！最民主的美國，羅斯福之權力也早超過美國憲法所規定。國會一再授權給他，他本身上已是一個獨裁者。這一個國家也與日德意一樣在本質上是無分別的。戰爭昭示了各國的統治者，在戰時中需要的是，一個純一的徹底的軍國主義的軍事政府，對內能夠進行野蠻的恐怖政策以鎮壓國內革命與不滿，對外能戰勝強敵。這教訓法英美諸國當局都十分領悟了。

所以政權之法西斯化，是新的戰爭組織之第二重心，也是新戰爭的一種藝術。

四

要使上面兩種藝術發揮它最大的威力，最主要的還要看肅清社會方面無秩序的程度爲決定。因爲經濟的組織過程，不僅有企業組織人們間的關係，同時還有沒有生產工具的一種階級間的關係。如果在這一環中發生了階級的決鬥，這一過程是不容易完成的。在政權方面亦是一樣，現在資本主義各國普遍表現的是戰爭與革命的危機，半年以來如巴黎流血，與京巷戰，倫敦飢餓隊的遊行，檀香山大罷工，西班牙，古巴革命等已夠表示社會的不安了。自然，資本階級對這社會的不安是不能絲毫忽視的。他們知道要從速掃清這種不安，不然就不能進行戰爭了。「把無產階級的身體同精神，爲着戰爭以及戰爭的名義，通同動員起來，這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舉行，同物質的生產的一齊動員，一樣是必要的先決條件！」他們將採如何的手段去達到這種社會的組織化呢？這有以下的二個方面。

第一便是加緊政治上的壓迫，個人自由的妨害和縮小到沒有了；尤其是對於工人的革命

運動，殖民地的革命運動，特別是左翼政黨取着最無情的沙皇的高壓。這一現象表現在日本最爲明透。日本由一九三一年七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逮捕的工人、農民、兵士、學生等共達二萬人。對於所謂「危險思想」取締的法律，不僅及於已發現的行爲，政府官僚並可依「在某個公民底腦中好像一定抱着」某種思想的假定，即可加以逮捕並加以嚴刑拷打，官場並可不詳細宣布這些被逮捕的人的情形。

日本的工人時常有發現「失蹤」的事。一個工人如果在蘇聯境內做過工，或與蘇聯工人有往來，參加前進工會或俱樂部與國際工人發生聯繫，甚或去聽左傾教授的演講等，他們常常在極盡繁華的道路上，忽然宣告「失蹤」。

日本政治警察，軍事偵探現在作出的罪惡遠超過沙皇的時代。

自然，這不是日本專有的特徵，在政權已達到法西斯的過程或張着「保護民主」的口號而備戰的國家，多少是表明這是共通的要求。德國希特勒的「焚書」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國在這次檀香山的罷工中也顯出它的惡魔的面具了。不錯，這是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的前夜所看不到的新戰術，是最新的戰爭的藝術啊！它是與世界革命危機一同生長起來的。

五

第二，便是精神組織形態。因為統治者知道專憑壓力的強制是不能全收社會組織過程的效的，所以在劍的旁邊還應有一部戰的經典。這就是加緊愛國主義的麻醉與鼓動。我們知道，在羣衆間如沒有極端愛國主義，對於戰爭不會生出狂情的。沒有戰爭的狂情就不能開始戰爭。日本帝國主義最近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沒受何等損失而獲得大的便宜的事實，去鼓動勞動者；因為在那一次戰爭中日本勞動者確是略分得一些麵包灰屑的。這使日本新的愛國狂情容易高漲。日本的社會民主黨更向日本勞動者證明，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日本勞動者爲要爭得自己的生存，只有將「中國資產階級不能開採的天源財富佔有，在惡劣條件下的日本勞動者實應享受這些天然財富啊！」它用了這樣的鼓動進成戰爭的心理。日本海陸軍部還進一步把這種一般的國家主義的宣傳與軍隊中專門的政治訓練，作戰技術等巧妙的連結起來，使得士兵自告奮勇的作戰。譬如日本軍隊中，長官與士兵在一罐子吃飯，火線上，長官應站在自己部隊的前面，士兵在火力下可伏臥，掩藏在戰壕內，長官却只能「立」和「跑」地指揮使自己

給全部士兵都要看見，在沖鋒時更不用說長官要帶領隊伍，有時竟是撐旗者。在這種鼓勵中，養成士兵好戰的精神，我們不能否認，日本軍隊正在一天天左傾，但愛國主義之毒在軍隊中仍是特殊濃厚的，就是在這二年來的中日戰爭中仍然有許多兵士自告英勇的爲「大和魂」而戰的。我們不應輕於忽視。

愛國主義自然不都是大和魂的。在德國就是以反凡爾賽和約，大日耳曼帝國等口號去造成戰爭的狂情。法國和比國也本着同樣的目的用保護民主反法西斯等幌子去反德國，其實都是同一本質的國家主義的鼓動，是製造戰爭的狂情，同時帝國主義者極力在製造民族間的仇恨，煽動國內民族的分裂或敵國的殖民地民族離異而自己取得其領導，以增自己的戰鬥力，譬如日本製造「滿洲國」，內蒙自治，唆使回族到處與漢人不和，贊助菲律賓獨立等，以外如希特勒之排猶，均是燃放着狹隘的民族愛國主義怒火，擴大將來的大屠殺。

爭取國民精神的動員在戰爭爆發前爲最重要之任務。大致他們通過資本家公會，右翼社會民主黨，一部分消費合作社，利用工人中殘存的小有產階級情緒，先使這些工人組織國有化。這些形勢，現在一天天在英國勞工黨，法國社會黨，美國黃色工會及衰老的第二國際等組織

或領袖口中喚出，「不反對合法的戰爭，」他們仍然要像一九一五年時代喚起「擁護祖國」的老調子了。這一過程，現在正在發展中。

六

如果以上各組織過程都已完成，則戰爭的勝負就要決之於軍事本身了。這是戰爭藝術最表面的一部份，關於近代戰爭的軍事技術的裝置，包括有物的武器部份及人的技術部份。這一方面一半是繼承舊的技術，另一半是在戰爭的實踐中創造。關於各帝國主義者擴張軍備及新式軍事技術，新式武器之發明等，本文不能詳細敘述。這裏應特別提到的是這二年來中日戰爭中許多軍事技術上的教訓，已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我們知道，「一九一八」後，日本侵華所使用的是歐戰後最新式的武器與軍事技術，是最新軍事藝術一次大的「試驗」，不應輕視它的國際意義。日本在「一二八」及華北和義勇軍的小戰爭中，雖然還有許多新式武器並未採用，但這些小的戰爭比起本國內最大規模的軍事的演習，用着試驗彈的假想戰是有偉大的意義。因為只有在真正的實踐的戰爭中纔有真正的新的藝術的貢獻。這只要看各國軍事專家如何緊

張的留心滿洲與中國北部戰場上最新武器的殺人效率底指數就可知道，在華北戰場上已有某國軍事專家指出日本的偵探飛機工作底動作過程所表出的以下的缺點：

一、摩托架子和機盤薄弱；

二、沒有必需的配置去調劑摩托在冷天中的動作；

三、不充分地使摩托與油機保存煖氣；

四、飛機的滑板在冰凍的地面上過於溜滑；

五、日本的航空指揮部曾指出空中拋擲炸彈底落中只佔較少數的百分數。

因此，就有減少炸彈之容量與重量的改良的方法，同時採取了少量的多數彈作成羣的拋擲，以增加落中的百分數，並且還替拋彈者製出一種專門的表格，附有隨飛機速度為移的瞄準的角度。

在中日小戰中所表現的缺點，我敢相信，在將來的大戰中是早已會改正的，決不會再現出以上的缺點。這還不過是一個例子。帝國主義各國的軍事家們現在正在埋頭在研究殺人武器的效率及其使用的技術。

自然這是對於整個人類的生命及文化的一種威脅。

七

爲什麼新的戰爭的藝術也值得我們被侵略者的勞苦大眾去學習呢？我們的學習却不是預備替某些野心家充當技術人員，而是爲了我們民族的防衛，爲了世界真正和平，我們不能不與侵略者去抗戰。我們需要武裝自己，因此我們需要戰爭藝術。我們須從敵人方面學得制死敵人的切藝術。

恰恰成爲侵略者壓迫者的反面，我們僅只是防禦與解放，即不讓敵人佔住我們的寸土，我們自己解除我們的鎖鍊。我們戰鬥的藝術，因此也與侵略者壓迫者不同。關於這一方面，我們很可以從殖民地叛亂革命，反抗的血戰中，社會集團殘酷的鬥爭中，看出偉大的藝術作品與天才來。

反抗與解放戰爭的藝術，一方面是着重於分解敵人經濟組織，動搖其政治體系，擾亂其社會秩序，說服大眾，解放大眾愛國狂情的愚昧。只有說服了大眾，取得了大眾的多數，革命方有

成功的可能。」在與民族的敵人抗戰時，這一部分工作，大致是由敵人自己的營壘內，最覺悟的分子去做的。譬如，在「一二八」時，日本的非戰的份子，在日本兵營，工廠中反對戰爭，在東京示威遊行，組織索夫團等，都是最好的例子，在與國內階級敵人宣戰時，對於這一方面的意義要勝過軍事千萬倍。我們只要一回味俄國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就不難理解了。

關於這方面，我不想比這還說得更多。

現在我們要強調的是指軍事藝術。我們常聽見有些虛偽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家竭盡全力來證明在現時資產階級軍事技術與武裝力量下，勞動大眾的武裝反抗是不可能的。同時我們又聽見許多高等華人說，在日本底軍事技術與武裝力量下，中國的反抗是絕對不可能的。這都是無稽之談。我們姑且就上海防禦的經驗來一回味罷！

一九三二年上海底防禦戰無論物質上或是精神上都是獲得相當勝利的。它擊碎了那些頹喪，悲觀，軟弱的人們「不能抵抗」的邪說。上海巷戰發明了殖民地民族戰爭的新藝術，我們在這次戰爭中，看出街道上的坦克和鐵甲汽車如果不得到房屋上面幾層和屋頂上火力的幫助，是要失去作用的。而我們的戰士却巧妙的利用了屋頂上的射擊，擊敗了坦克和鐵甲汽車。並

且特別有成效的撲滅了進攻的部隊。中國在石頭房子所掘的優等射手的藏身地，給了日本軍隊以莫大的損失。日本航空隊會企圖從上面趕走中國射擊者，又不可能有幾個飛機反被優等射擊底火力所擊碎了。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戰爭藝術的精神與物質兩方面。

我們從東北義勇軍的戰士口中，更得到不少的戰爭經驗，中國不能抵抗嗎？被壓迫的大眾不能救亡圖存嗎？這都是一些亡國之音。中國大眾如果要想獲得民族的解放和社會的解放，就不能不學習戰爭的藝術。（柳滄）

新的財政問題

——由平時財政說到戰時財政——

財政是整個經濟機構之一環；軸和貨幣、金融，固然是互爲表裏，和一般的生產、分配關係，也是互相作用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財政的基礎，建築在利潤上面；軸分沾了一小部分的利潤，然而不可能消滅利潤。統治者在表面上，雖然提出很好聽的「以負擔力量決定徵取標準」的口號；而在事實上，對於資本集中的趨勢，是無損毫末的。

在財政的收入方面，所徵收的不過是利潤中極小的一部分；而在財政的支出方面，往往再增加資本家的利潤，在購買上，在軍需製造上，在債務費的支出上，資本家往往要藉以取得很大的利潤；在公務員的消費上，一部分的薪俸就變成資本家的利潤。經過了儲蓄的過程，別一部分

的薪俸，也直接或間接的加入生產過程，和利潤一樣的變成資本，要之，在財政支出方面，是剛好助長資本集中的趨勢。

因為財政是整個經濟機構中之一環，所以，一般經濟關係上所有的矛盾，也正是財政上所有的矛盾。在經濟走向繁榮的時候，資本家利潤的豐厚使財政收入大增，財政收支就自然膨脹起來。財政收支的膨脹，便會增加了通貨的膨脹，便會使無政府的生產狀態增加牠的速度。這樣，財政上盲目的膨脹便成爲以後經濟恐慌的一個因素。等到經濟恐慌發生，資本家利潤的減縮，使財政收入低落，這便造成財政恐慌。財政恐慌中支出的減縮，加重了一般購買力的減縮，而使一般經濟恐慌增加了嚴重性。這樣，財政上的矛盾和一般經濟關係上的矛盾，就成爲互爲因果之勢，而循環往復的開展起來。

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財政上所表現的，自然是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在收入方面，因爲所採取的是間接稅制，所以往往是通過了帝國主義的販賣網和封建勢力的剝削網，而把大部分的負擔轉嫁給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比方，關稅的徵收——主要的是進口稅的徵

收，進口洋商所繳納的，並不出自他們的利潤項下，而不過是一筆墊款；他們馬上把所繳的稅額，加入商品的成本上去，輾轉的經過販賣網，向消費大眾收回這一筆墊款，而還要加上一些屬於墊款的利潤。鹽稅的徵收，鹽商所繳納也照樣的是一筆墊款。他們通過了封建的剝削網——「引岸」，向消費大眾收回比墊款數更大的一筆款子。且看，差不多每次政府增加鹽稅的稅率，鹽商必然要加重的取償於人民的。統稅的徵收，形態比較的不同，那中間的帝國主義在華產業徵收的，還不到半數，大部分是出自民族工業的。但是，轉嫁的方式，是一樣的。田賦的徵收，取自地主，地主也可以轉嫁於佃農；同時負擔的不公平，也超過其他的捐稅；紳豪階級，往往是能夠得着很大的便宜的。

財政上的弊害，在古代，是取自民間者，未能盡散諸民間；因之，資財集中於貴族，而民間無藏。這種弊害，到現在依然存在，但是嚴重性是格外大了。我們要分析目下財政的弊害，必須再把財政的支出方面，加以研究。中國財政上的收入，中央和地方併計，每年不下十五萬萬元，那中間散諸民間的，能有幾多呢？巨額債務費的支出，一部分是流出國外，一部分是留滯在金融資本家的手裏，官僚軍閥的高樓大廈，多數是建築在租界裏；他們的巨額存款，一部分在租界裏，另一

部分却早已逃到海外去。政府的購買和建設上的支出，一部分是留滯在都市，而另一部分也要流出國外。頂頂嚴重的，恐怕要算是內戰上的消耗。牠一面在軍用品的購買上使金錢大量外流，而另一面却還要毀滅人民的財產，阻礙人民的生產。因此，目下財政的弊害，遠不止取諸民間者，未能盡散諸民間，而是取諸農村者，未能盡還諸農村，取諸國內者，未能盡留諸國內，甚至應造福於人民者，轉而貽禍於人民。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能不咀咒目下的財政，是封建殘餘的把戲，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是民族的毒害者。

無疑的，目下農村的破產，財政要負很大的責任。往昔豪紳階級掠奪農民，他們所得的金錢往往仍以高利貸及購買耕地等方式再付給農民；那中間雖然有財產的變遷，然而對於農村金融，是沒有多大的妨害的。目下軍閥、官僚，以及紳豪的掠奪，結果就不同了。軍閥、官僚固然要把農村裏括來的金錢，移到都市甚至海外去消費或者投資，豪紳們的消費和投資，也有同樣的趨勢。再因為在內地的金融機關，多為都市金融機關的分支行；牠們的主要任務，是吸收內地存款，攜赴都市。豪紳們在這農村經濟衰落，農民到處暴動的時候，為安全計，也寧願把往昔高利貸及購買耕地的資本，存入當地的金融機關；而一轉移間，這一部門的資金也就流入都市了。因此，目下

的農村問題，不單是農民貧窮化問題，而同時是農村金融枯竭的問題；不單是農民喪失了土地和生產工具問題，而同時是農民被剝奪了交換工具問題。農民甚至要藉高利貸苟延殘喘，要出賣耕地和家畜以度日，而都不可得了。

在理想上，一個國家倘使能在財政徵稅上吸收人民所有的利潤——自然連公務員的儲蓄也在內，而把牠運用起來，作為國家資本建設之用，資本便不可能集中到少數私人的手裏去。資本家和官吏，假如不過在消費上享受較高的生活，雖然不公平，但對於社會，是沒有很大的危險的。國家徵收了全部的利潤之後，建設國家資本，增加國家的生產力，反過來就可以提高人民的幸福。

退一步說，國家在財政徵收上，即使不能公平到剛好吸收人民的全部利潤，只要牠一面不苛刻到超過了某一部分人的利潤，而變成超經濟的剝削，另一面不縱容別一部分人把他們的利潤轉變成土地資本、工業資本，以至金融資本，那也就很好。把私有資本限制在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的領域裏面，對於社會，是不會有大的危險的。國家只要能夠把握住金融機關、大產業

機關和土地，便可以用發展合作社和民間借貸機關的手段，逐漸的消滅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牠一面更可以運用公債政策和鼓勵人民投資國營事業政策，逐漸的吸收民間的借貸資本。爲甚麼單說大產業呢？因爲小產業國家依然可以暫時放棄；牠只須控制住動力、燃料和原料的供給，小產業是不可能有危害社會的發展的。

再退一步說，國家對於資本的發展，即使取放任態度，牠只須能使取諸國內者留在國內，那對於社會，固然有資本集中於少數私人的弊害，然對於整個民族資本的力量，是不會減少的。那樣，財政上的收支，只有因爲增加一些貨幣在流通中效力的喪失，可能使金融一時不敷周轉，然而決不會使金融陷於枯竭。只要同時能產生多一些的信用貨幣，以節省硬幣的流通，以補償貨幣在流通中效力的喪失，金融便也不至有不敷周轉之苦。

我們應該不應該主張取之於農村者盡數還諸農村呢？我們不能這樣主張。因爲，農業資本轉變爲工業資本，是社會進化必經的階段。我們的合理主張，是要把農村中窖藏的一部分資本，轉變爲國營產業資本，而農村中僅供流通的一部分資本，依然還之農村，自然，那時候還可以用信用機構，以信用貨幣還之農村，而把貴金屬騰出來，以作國家資本建設之用。

因此，中國平時財政政策的運用，主要的是防止民間資本變成內戰資本，防止農業資本變成都市中的買辦資本和享樂資本，防止國內資本變成國外資本。頂合理的方式，是運用民間的窖藏資本，運用信用機構所能騰讓出來的金銀，作為國家產業開展之用，而同時使農村依然保持着適度的流動資本。

說到中國的戰時財政，牠是和貨幣、金融、貿易、國際收支、以及物價等問題聯繫的。在貨幣上，我們必須充分的用紙幣作國內交換媒介之用，而騰出來的全部金銀，作國際支付之用。在金融上，我們必須限制私人存款的支付，限制對於私人信用的膨脹，同時努力吸收公務員和一般人民的積蓄，務使私人不至有有餘的購買力，以從事於日用品的囤積居奇。我們要把全部的膨脹力量留給國家，要把所有的剩餘購買力交給國家。在貿易方面，我們要管理貿易，限制私人對於非必需品之購買，同時，限制戰時資源的輸出。在國際收支上，我們要鼓勵華僑匯款，使牠不至因戰爭恐慌而減少，反而因對於祖國熱情的提高而增加。我們同時管理匯兌，使國內資本，無法逃避國外，停付外債以保存巨數的外流資本。對於物價，我們要統制市場，使日用品價格，不致劇烈

的上漲，自然，這在一方面，是和統制金融交相爲用的，而在別一方面，根本的還須維持生產力，甚至要提高生產力。關於生產力問題，農產物的生產，只須在抽調農民壯丁服務兵役的時候，能動員鄉村中的婦女，繼續耕作，大致就不成問題。只有工業品的生產，因爲工業中心，都在口岸，倘使沒有方法把牠移到安全地帶，那真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

目下有許多人把戰時財政問題集中在徵收的方式上，那是輕重倒置，見小不見大，而永遠也搔不着癢處的。

因爲中國目下的徵收方式是買辦的方式，是集中在敵人炮火所及的口岸的，所以，一到戰時，自然大部分都不適用。這在徵收方式上面，自然要有一個大大的改革，然而，只要我們能夠把握着上述對於貨幣、金融、貿易、國際收支，以及物價的幾個樞紐，徵收方式的澈底改革，對於整個的財政，到並不是最嚴重的問題。

因爲中國未來的戰爭是一個存亡所繫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們是必須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去對付牠的。多數人在前方拼了死命，讓少數人依然躲在後方享樂，那固然是不應該有的事；

多數人的血肉犧牲爭取了民族解放之後，讓少數人再來在那基礎上建立起資產階級的天堂，那更是不可能的事。老實說：在未來的戰爭當中，我們不但要推翻帝國主義的勢力，而要同時解決社會問題——我們是要在戰爭的過程當中，奠定了新社會制度的基礎的。中國的財富階級中有天良，有民族意識的人們，應該會明白「毀家紓難」本來是分所應爾。少數沒有天良，沒有民族意識的，我們還能顧惜他們的私利，助長他們的私心嗎？簡單的說：爲了解決戰時財政問題，我們是要管理人民的財產，徵收一切人民的剩餘資財的。

自然，在實行的時候，我們要運用高度的技術，保持極度的公平。在技術方面我們要有先後的層次，要有不同的方式。在公平的原則之下，我們要運用民衆組織，作很精密的調查；我們更得運用民衆互相勸說的力量，儘可能的使大家了解而悅服。

累進的所得稅和遺產稅，不但應該是戰時的財政來源，而且應該是平時的財政來源。可是，在目前，因爲帝國主義勢力的庇護，因爲封建殘餘勢力的阻礙，我們外不能徵收集中在租界的大數產業利潤和遺產，內不能徵取依舊分散在軍閥、官僚、以及豪紳階級掌握中的利潤和遺產。等到戰爭起來的時候，那個情形就大不同了。多數依然還需要一個祖國的資本家，自然會放棄

了他們的託庇外人的生活，自然會提取他們寄生在租界或者國外的財產，而繳納到國民經濟的體系裏面來。少數甘心做亡國奴的，甘心 and 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絕緣的，便會毅然決然的，捲所有，到外洋去做一個無國之人——自然，那時候外洋不能有他們安居的地帶，也是一個問題。這樣，就把一向寄生在租界的中國資本家，劃成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陣線——奴隸陣線和國民陣線。奴隸陣線裏面不需要祖國而願意讓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吐棄的一小部分人，自然不能再要他們負擔戰時的經費；這就在帝國主義列強，也是無法制裁這一類無恥之徒的。大多數願意回到國民陣線裏來的資本家，在平時國家無法徵收他們的所得稅和遺產稅的，到這時却一律可以依法徵收了。這種陣線的劃分，不但在戰時財政徵收上有極大的補助，在鞏固民族陣線的意義上尤其是十分重大。然而，這種偉大的功業，不是有一個反帝的戰爭，是不可能完成的。

對於留滯在內地的軍閥、官僚以及豪紳階級，也只有有戰爭的時期，要「全力對外」的口號之下，才能用民衆的力量，使他們很自然的放棄了特權，而順服在抗敵的政權之下。在那時，在民衆的檢舉之下，他們不可能隱蔽他們的利潤和財產，在民衆的監督之下，他們也不可能違抗國家的徵收。所以封建殘餘的勢力，在戰爭當中是可能自然肅清的。這也不但對戰時財政有極

大的補助，在整個民族解放上，也有重大的意義。這種功業，我們只有在戰爭當中是可以很自然的取得。不然的話，我們便得用專門對內的革命手段去爭取，那就比較的艱難了。

除了捐稅政策之外，我們自然還要充分運用公債政策，以吸收民間的儲蓄，和捐稅政策所徵收不到的利潤。自然，捐稅是不能過於苛重的，否則便要使一部分的資本家起了反感，甚至起了反抗；在統一戰線的意義之下，這種不必需的反感，我們要儘可能的避免。我們假如用公債政策，補助捐稅政策的不足，那末，在國家戰時，財政的需要上，是同樣的可以達到目的；而在負擔的人們看起來，接收了有價值有收益的公債，却比較一去不同的捐稅好得多。而且，只要國家能夠有很正確的整個經濟政策，公債的收益是不可能造成資本集的中，而危害將來的社會的。

一個國家在平時預算內，不應該以公債發行來抵補財政的虧缺；而在戰時，公債的發行却是天經地義。我們要用公債的發行，避免通貨的直接膨脹。那就是說，我們應該以公債發行彌補財政上的全部虧缺，而不能用紙幣發行彌補這種虧缺。

但是通貨應該不應該膨脹呢？換句話說：紙幣是不是需要增發呢？自然是需要的。在軍事收支浩繁的時候，平時的一些紙幣發行數，自然是不夠流通的；所以，我們必須有更大的發行數。不

過，增加發行的數目，也不能超過實際的需要。倘使民間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留存着過多的游資，那末，那種游資就會變成商品市場中囤積居奇的資本，而要抬高物價，或者甚至因為人民購買力的增高，而變成資財的浪費。因此，政府在紙幣發行的時候，固然應該十分審慎，在發行以後，還要不斷用強制儲蓄及發行公債等手段，吸收民間的游資。

除了上述的種種之外，募捐運動自然要努力推進；範圍不限於國內，而且要普及於國外，使華僑和各國的同情大衆，都能貢獻他們的熱情。又年來民衆呼聲中，尚有沒收敵人及賣國賊財產之一項；這當然是應有的，不過能得幾何，却是一個問題。敵人的財產，多在口岸，即使沒收，恐怕因為敵人海空軍力的攪擾，不見得能利用。唯一可能沒收的敵人財產，恐怕只有債款；但是，到那時，應該是一切外債都停付的。至於賣國賊的財產，因為他們早已不準備做中國人，恐怕已經全數在國外了吧！

有人主張恢復厘金，我們是要反對的。這種割裂民族的封建方法，我們還應該使之還魂嗎？總之，中國戰時財政的意義，是兩方面的。牠一面要集中民族力量，加以妥善的運用，以延長抵抗時間，以取得最後的勝利；一面還要消滅階級和特權，以樹立新社會的規模。（章乃器）

新的外交原則

民國十三年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發表宣言，其中關於外交政策最主要的有以下各項：

- (一)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
- (二)凡自願放棄一切特權之國家及願廢止破壞中國主權之條約者，中國皆將認爲最惠國。
- (三)中國與列強所訂其他條約有損中國之利益者，須重新審定，務以不害雙方主權爲原則。

民國十五年九月七日國民政府發表爲出師北伐告國民書，其中又說：

「國民政府對內力求肅清軍閥，對外努力推翻帝國主義……未嘗稍懈」

總而言之，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爲手段，以推翻帝國主義爲目的，這是當時中國國民黨對外政綱的主要原則，也就是一般所稱爲革命外交的基本原則。這革命外交的基本原則，在最近十年中到底做到了幾分，是另一個問題。但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推翻帝國主義這兩個原則，已經不僅是中國國民黨的對外政綱，而成爲中國人民在外交國策上的一般信念和普通口號了。這情形一直到最近，也還是沒有多大變更。

中國是半殖民地的中國。中國所以成爲半殖民地，是因爲帝國主義列強過去用武力侵略強迫簽訂不平等條約的結果。所以在十年前，帝國主義列強正在遠東保持着均勢的時期，中國只有毅力廢除不平等條約，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才能達到民族的獨立解放。所以革命外交的原則，在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再正確沒有的。

但是所謂外交政策，決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一切外交政策都是根據本國的地位和國際的現實環境來決定的。國家地位和國際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外交政策必然也跟着發生變化。要是不然，守着固定的原則，拋撇着現實而談外交，那樣的外交不但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而且一定走頭無路，對於國家和民族是根本有害的。

拿目前和十年以前相比，大家都不免有世變滄桑之感罷！

中國的地位顯然和十年前不同了。在十年前中國還不過是半殖民地現在却已在急速地走向全部殖民地化的途中。現在我們不僅受原有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而且正遭遇着新的更慘酷的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這武力侵略的可能的結果，也不只是喪失一部份領土主權，而是要使中華民國從世界地圖上完全消失。

國際環境也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和歐洲的均勢已經消失。由凡爾賽條約和華盛頓條約所產生的戰後世界暫時穩定局面，完全粉碎了。在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已展開了序幕；在遠東和非洲，帝國主義不恤用武力掠奪新的殖民地，因此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已預備動手相互火併。另一方面，全世界已逐漸分割成和平和侵略的兩大陣線。一部分帝國主義國家爲了自身利害關係，也加入了和平陣線，和蘇聯以及全世界的人民大眾，共同反對侵略，這和十年前帝國主義和被壓迫民族截然分成兩大營壘的情形也完全不同了。

中國的地位和國際的環境既然有了重大的變化，在目前爲了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要是依然保守着十年以前所謂革命外交的原則，自然是無濟於事了。因爲在目前，中國民族解放運

動最緊急的任務是抗敵救亡，而廢除不平等條約反成爲次要的問題。中國唯一的出路是加入和平陣線以共同反抗侵略，所以籠統地主張推翻一切帝國主義，也斷然行不通。

換句話說，在這新的地位和新的環境之下，我們必須有新的外交原則。這新的外交原則，我們就稱之爲「國防外交」。

國防外交應該是整個國防政策的一部分。中國目前的國防政策，目的在於動員全國，抵抗侵略，收復失地。所以國防外交必須和武裝抵抗侵略聯繫起來。沒有軍事抗戰談不到國防外交，但是沒有國防外交，單是軍事抗戰，也不容易得到最後的勝利。

那麼這國防外交的基本原則是什麼呢？

- 一、聯合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共同抵抗侵略國家。
- 二、以中國爲中心，結合遠東反侵略的各友邦，尤其是美國和蘇聯，以確立太平洋的安定力。
- 三、在中國抵抗侵略，收復失地未達到目的之前，中國不要求取銷除侵略國以外一切外人的既得權利，同時並歡迎非政治性質的外國借款及投資。

第一個原則決定中國一般的國際政策。中國民族是愛和平的民族。中國目前又是武力侵

略的直接犧牲者。所以從國際義務和民族利益來說，中國都必須加入全世界的和平陣線以共同反對侵略陣線。在一切外交活動中間，中國應該聯合所有和平的力量。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是一種和平力量；全世界愛和平的人民大眾是一種和平力量，社會主義的蘇聯是一種和平力量，一切反對侵略擁護民主自由的國家，是一種和平力量，國際同盟在大多數和平國家共同支持之下，也是一種和平力量。總之，運用一切和平力量，不放棄一點一滴，使中國成爲國際和平陣線中最忠實的一員，這樣才能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而使抗敵時期的外交不至陷於孤立。這是中國在一般國際政策上所應採取的方針。

第二個原則決定中國在太平洋區域區所採取的特殊政策。就面積人口，地理位置或海岸綫長度而論，中國都不失爲太平洋上最主要的國家。中國的存亡對於太平洋和平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爲求太平洋的區域安全，必須以中國的抗敵救亡運動作軸心，把太平洋岸上一切傾向和平的國家和人民聯合起來，以共同反對侵略，保障各國的領土安全與主權獨立。在太平洋上，中國、美國和蘇聯這三大民族在目前反對戰爭與侵略是相同的，傾向民主自由也是相同的。這三大民族聯合起來，再加上太平洋東海岸一切被壓迫民族，不難結成全世界最強大的和平集團。

不但中國的民族危機可從這集團的力量得到挽救，太平洋的持久和平也只有從這裏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真正所謂「太平洋安定力」應該以此種集體安全制度為基礎。但是要確立太平洋安定力，中國應首先担任和平集團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中國民族應以對侵略國艱苦抗戰的事實，促成這集體安全制度的建立。因此，向來所謂日內瓦路線，莫斯科路線，東京路線等等，完全否定中國民族自身的力量，企圖倚賴他國以求存，都不是正當的外交出路。中國的出路首先在以抗戰恢復民族的自信，同時聯合太平洋上一切和平勢力，以爭取民族的生存和解放。

第三個原則決定中國現階段的外交策略。現階段的中國正在抗戰救亡的途上，因此在這個時候，一切力量都集中在抗戰救亡這一點上。目前中國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侵略國及其同盟者。所以爲了減少抵抗侵略的阻力起見，除了侵略國及其同盟者外，一切外國的在華既得權利，不妨暫時加以容許。等到抗戰救亡得到勝利以後，再要求收回。而且在抗戰時期，中國需要發展國內經濟以增加國防實力，因此非政治性質的外國借款及投資，不但不應反對，而且當爲中國所歡迎。

這些國防外交的基本原則，在表面上和過去的革命外交原則完全不同，因此有人要懷疑

向帝國主義妥協讓步，其實恰巧是相反。因為我們即使暫時聯合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利用帝國主義的相互矛盾以挽救中國的危亡，但是到了抗戰救亡得到最後勝利的日子，中國失地收復，國力鞏固，由半殖民地的地位，一躍而為獨立自由的國家。那時民族的大敵已經消失，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華殘餘勢力，自然易如反掌。不然，中國因軍事不抵抗，外交無辦法而至於因循亡國，徒然空談廢除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會有一點用處嗎？

所以國防外交實在並不是和革命外交相反的。國防外交只是把握着現實，以求貫徹革命外交的原來目的。所以稱國防外交為「現階段的革命外交」也未嘗不可。我相信，在目前凡是具有保障國土主權決心的抗敵政府，可能採取的外交方針，斷不能離開上面的三個原則。在這國防外交原則不能實現以前，至少首先應該使這些原則成為全國人民共同的外交信念。至於這些原則如何實現，我希望有機會詳細研究，尤其希望熱心愛國的人士共同討論。（胡愈之）

新的政治訓練

目前危急的形勢，課給我們一個萬分迫切的任務，即抗戰的準備工作。但是這裏的所謂「準備」，決不是說我們的軍火不足，我們要多多購買飛機大炮，我們的財政收支尚不相符，我們還得大開財源，我們的國內尚未統一，我們得做一番統一的運動，我們在外交上尚無聯絡，我們還得大大地做一番外交的活動等等，這些工作決不是一時準備得齊全的，也來不及應付目前危急的局面，老實說，可不可能準備得好還是問題。現在的局勢就好像是火已經燒到了眉頭，倘使我們要等着掘好了井再來取水，那纔真是遠水不能救近火，坐等滅亡了。雖然我們也不否認上述各項工作也都具有莫大的重要性，但那究竟不是我們的任務，而是政治家、財政家、以至外交家們的工作，讓他們去做。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做我所能做得到而且迫切的工作。我們早就說過，我們不是一切都準備齊全了再抗戰，而應時時刻刻準備抗戰的到來，因為我們可以等待抗戰但抗戰是不等待我們的。

比方綏東北現在有大批大批的僞軍在某方的驅使之下向我侵襲，倘使我們因準備尚未齊全，而不與以迎頭抵抗，那我們祇好再把綏遠送給別人。這不是再明白不過的事嗎？因為敵人常常出我不意地侵犯我們，我們要不是枕戈以待的話，那還來得及嗎？

關於我們的準備工作，我們首先應該幹什麼，這我在前期本刊已經大略地說過，不外乎組織與訓練。其實這兩項工作也是分不開的，我們不能機械地等組織好了再訓練，我們在訓練的同時，也可以進行組織。比方在城市，假定這城市有十萬人口，你要想一時把這十萬人都組織起來，大概還不是一件容易事。即令是在比城市人口少的鄉村，假定這鄉村有一百戶，每戶平均以五口計，共五百人，要是一時把這五百人都組織起來，恐也很難。雖說身家性命，人人都看得重要，但是這裏面究竟有貧富不等，老少有別的不一致，因而在見解上，在情緒上，決不是一時三刻可以統一起來的。我們不妨從極小處做起，比方組織工作，假定我們可以找到一兩個人，連自己也在內，夠得上三個人的話，就組織起來，雖然是頂小的，最起碼的。雖說在今日，爲了救國，爲了救自己，而組織，並不應該是若何困難的事，但是我們都應該把它當作十分艱苦的工作，拿出極大限度的耐心來做。

一旦組織成立，我們就應該開始訓練，用訓練來嚴密組織擴大組織，比方一個自衛會，或者義勇團，或者先鋒隊之類的組織，它本身雖說是爲了把某一地方各種各樣的人團結起來，但主要的却是在訓練他們。倘使祇組織而不訓練，那麼這組織祇是形式的，寬懈的，沒有力量的。訓練是組織的工作，有工作纔能使組織有生氣，纔能強固，纔能表現出力量來。

爲了準備抗戰的到來，我們的訓練不消說是軍事的，但是一說到「軍事」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或許會着起慌來，因爲他們對於軍事這東西一向總以爲是軍事專家的行業，我們什麼也不懂，如何與人以軍事訓練呢？其實這倒不然。即令是我們一點軍事知識也沒有，就單憑我們的經驗，我們也可以幹這個工作。尤其是農村中人更容易訓練，比方打架這件事，農民們大都是經常幹的，即沒有幹過，他們也見得不少。假定有兩個人各站一邊，準備打架，那會打的，一定是不先動手，他一定是先立定脚步，做出一個「坐山虎」的姿勢，一雙眼睛集中視線望着他的對方，專等他打過來；那個不會打的，他就冒冒失失地撞將過去，他非但不能把人撞倒，往往還被人利用。他這一撞之力，順勢把他摔得老遠，這就叫做「以逸待勞」。你不要小看了中國的農民，他們大都是有作戰經驗的，這並不是說他們當過兵，上過戰場，而是說他們在「勇於私鬥」上獲得了

經驗不少。比方說農村中的械鬥吧，械鬥常常是兩個不同姓的村莊，爲了某一件共同的利害，甚且祇爲了一件某族長的私人小事，而各聚集全村的人，手持鋼叉、鋤、扁担、鐵棍，甚至火槍之類，儼如作戰似地互鬥起來。他們這鬥，不完全是是一場混戰，有時也各有陣地，各用心思，什麼衝鋒啦，逆襲啦，偷營啦，誘敵啦，倒也頭頭是道。他們受過軍事訓練嗎？沒有的，他們也無非爲了出奇制勝，繞挖空心思地來鬥爭。即令是一個很好的軍事家，有時還沒有他們那麼熟練，那麼精明。我們訓練他們，正是要從他們這些經驗上着手，啓發他們，把他們的經驗匯集起來，合理化起來，作爲我們戰鬥的法則。自然，這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過，我們這麼說，無非是證明羣衆不是不可能訓練的，而我們縱非軍事專家，但是遇危急時，我們也得磨練我們自己，創造我們的能力，担負起不平常的任務。所謂「急能生智」就是這個道理。

不過我們要注意，他們的那種集合往往是隨時號召的，不是十分嚴密的，非政治的，非科學的，更是沒有紀律的。我們的訓練必須要有組織，就是爲了要使行動科學化，政治化，紀律化。我們不能像普通的軍隊那樣把人當做機械地去訓練。固然在作戰時爲了指揮的便利，有效起見，服從是必要的，但是這服從決不是盲目的服從。普通軍隊中的服從就是十足盲目的服從，而我們

的服從必須是自動的意識的服從，因此，在訓練中，除軍事的訓練以外，還必須施行政治的訓練。比方作戰，我們首先要讓大眾們知道作戰的任務是什麼，目的是什麼？為誰戰？讓他們理解了這些以後，我們還得讓他們自己提出意見來怎樣戰？應該守還是應該攻？應該衝鋒還是應該退？却自然，他們的意見不盡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正應該抓住他們不正確的意見來糾正他們說服他們，讓他們完全理解了以後，再做最後的決定。這最後的決定成立以後，我們必須宣佈這是我們全體共同的意志，我們絕對地遵守，絕對地服從，我們各個人都必須按照這共同的、最後決定而行動。有誰違背了這決定，該怎麼處罰等等。這樣，大眾的一個隊伍的行動纔會像一個人的行動一樣，非但不会紊亂，而且能獲得最大的效果。這樣，每個人纔肯拚命的作戰，因為這戰是他自願的，他懂得是為什麼的。這就是紀律，也祇有這樣纔能建立起紀律來。普通軍隊中的紀律是獨斷的，是呆板的，是士兵們所不願遵守的。因此他們的紀律，往往有被破壞的可能。而我們的紀律，則與這大不相同。它是鐵的，是不可破壞的。

行動以後，決不是一切都完結了，我們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教育工作。這一步工作不做，我們的訓練不能算完成。猶之乎普通的軍隊中，在每一次的操演之後，少不了要

來一番「講評」是一樣，我們在行動之後，也得來一番對這行動的檢閱。不過他們的「講評」也是長官獨斷的，而且是照例的官樣文章，在他們看來，那也是具有教育的意義的，和那教育究竟有多少效果，是頗值得懷疑的。因為第一，普通士兵的操練，完全像槍砲坦克車等機械一樣地聽號令受指揮而行動，這裏面絲毫不含有他們自己的意志；第二，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的任務和目的是什麼；第三，他們完全聽命於長官，他們對於行動的錯誤與否一點責任沒有，好壞都是長官的事，與他們不相干。所以他們對那「講評」聽不聽都可以。即使聽了，對於他們自己毫無益處，因為下一次的行動，他們仍是聽命於長官。我們的檢閱就完全不同了，我們的檢閱首先是在檢閱這次的行動有沒有完成我們預定的任務，有沒有達到我們的目的。假如是完成了和達到了，那就證明我們預先所估量的和所決定就完全是正確的。假如沒有完成和沒有達到，那就證明了我們所估量的和所決定的不正確，有錯誤。錯誤在什麼地方，我們得檢閱出來，而且這檢閱是要大家共同負責去施行的。由此來教育全體，使全體從這次行動的體驗中獲得進一步的深刻的認識。然後再就每個人的行動檢閱他們各個人所担负的任務，看究竟完成了若干。在這裏是需要毫不客氣地互相與以批評的，不論是大眾或領袖，有功，自然應該加以贊揚，藉作鼓

勵，有過，則須加以指摘作爲教育。尤其是領袖，假如犯了錯誤的話，應該勇於認錯。因爲領袖是大众的表率，要如此纔能使大眾心服，要如此纔能啓發大众的威力。這就叫做「自我批評」，這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它和紀律是有密切的關聯的，要有紀律就必須有「自我批評」，唯自我批評纔能建立並強化紀律。

最後我們應談到領袖的問題，我們首先要認清我們在大眾中工作，是爲了全體的，不是爲了個人的，因此我們事事應該以全體爲前提。固然我們在大眾中工作也是爲了領導大眾以完成救亡的重大任務的，因而我們必須握住領導權。但所謂領導，決不是形式上的我在前面走，一定要大眾在後面跟隨着，或者，我們指東，大眾就得往東，指西，大眾就得往西，我們的領導是一個共同的救亡綱領，這綱領取得廣大羣衆的贊同和擁護，在這綱領的號召之下，他們一致地行動。固然這祇是就領導權而言。至於實際行動的領導，自然仍須所謂「領導者」即領袖不可。但是做領袖也是有條件的：這人得有偉大的品德，豐富而正確的理論知識，不屈不撓的精神，吃苦耐勞的實踐，纔能做大众的領袖，但是唯一的，是爲大眾所知曉所擁護的人，最好是由大眾中產生出來的。因此，我們在大眾中工作，不必一定要找領袖做。領袖最好由大眾選舉他們所擁護的人。

因為倘使這位領袖是他們自己選舉出來的又是他們所擁護的那麼他們就會心甘自願地受他的指揮。但是倘使你在大衆中能吃苦耐勞地工作絲毫不爲私利打算，完全爲大衆的利益着想，而你的生活完全和大衆的生活打成一片，那麼你就是大衆最親密的最敬愛的朋友，同時他們也就把你當做領袖。可是你若真的被大衆選爲領袖時，你却又不應該以爲你不是爲做領袖來的而逃避。你應該勇敢地積極地站到大衆的前面去領導他們，卽令是軍事行動上，也應該如此。

(鑿機)

新的軍事訓練

在我們尚未施行大衆的軍事訓練以前，我們會想像到：當我們把大衆召集起來，向他們說：「我們今天實施軍事訓練」的時候，他們一定要問：「我們無槍無砲，怎樣受軍事訓練呢？」是的，這是一個問題，而且是極重要的問題。我們正應該抓住這個問題去啓發他們，去訓練他們。我們就趁着他們發出這個問題的機會，去反問他們：「我們是老百姓，而且是窮苦的老百姓，老百姓自然不會有槍有炮，更不會有錢去買槍買砲，我們怎麼能夠有槍有炮呢？要知道槍砲這種東西是軍火，只有官家纔能有，民家是不許有的，那麼我們的槍和砲應該從什麼地方來呢？」也許有人會說：「要求官家發槍。」是的，照理，倘使官家要重視人民這個龐大的力量的話，官家是應該把人民武裝起來的，但是這究竟不大容易。一則全國人民的數量太多，四萬萬五千萬人口，我們以三分之一爲男女壯丁計算，也還有一萬五千萬。在全國軍隊中也還沒有這麼多的槍支，那麼哪兒來槍支發給人民呢？二則現在要官家來發槍支武裝人民，在根本上講，還是不可能的事。因爲現

在我們的官家最怕的就是人民武裝，目下對於人民的武裝，正消滅之不懈，它如何肯來武裝人民呢？不過據說：在中國的農村中，有些農民，特別是富農和地主們的家裏大都是有槍的，他們預備了槍是防「盜」的，倘使我們能把這些槍收集起來，雖然還是不夠得很，但也不妨輪流交替地來使用。可是怕的是就連這些槍也收集不起來，因為他們不肯拿出來。雖說抗敵是全國人民一致的志願，但是他們總不免要懷着一點鬼胎，防備最後的一着棋。自然，我們能夠說服他們，使他們肯拿出槍來，那是最好，但是主要的，我們的武裝還是取自敵人。因為我們的軍事訓練最初一步是在如何奪取敵人的武裝來武裝我們自己。

講到這裏，我們就要弄明白一個根本問題了。在這一年來關於抗戰的問題，我們不是聽到過各種各樣的理論鬥爭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有的主張我們非抗戰不可，不抗敵便不能生存；有的主張我們不能抗戰，因為我們的軍火不足，我們要準備充分的軍火，纔能抗戰。對於這一論爭，老實說，我們是擁護前者的，在我們，軍火不足不是問題，怎樣在抗戰中來充實我們的軍火纔是一問題。我們可以舉一個實例：東北義勇軍該不是正式的軍隊吧，他們都是我東四省被壓迫的勞苦同胞，雖然他們之中，有的本來是有槍的，但那究竟是少數，和現在所謂「滿洲國」×偽軍

比較起來那真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但是他們和敵人苦戰了已經五年之久，而他們的武裝是越打越多。那些武裝是哪裏來的呢？不消說，是取自敵人的。他們如何能把敵人手中的武裝奪到自己的手裏來呢？那就是他們是採取的一種特殊的戰術。

說到戰術，我們要嚴正地提出一件事來，那就是阿比西尼亞對意大利帝國主義七個月的抗戰給我們的教訓。阿比西尼亞和意大利來比，恐怕還不如我們和日本比。誰都知道意大利是帝國主義列強之一，它的軍事實力之強，應該是一等一的，坦克、飛機、大炮、毒氣，舉凡一切現代化的武器，幾於無一不備。可是阿比西尼亞呢？其軍械之陳舊不足，那是誰都知道的，要說是戰，那真是雞蛋碰石頭，不堪一擊。然而它竟也抵抗了七個月之久，並且其中還有過不少次偉大的勝利，雖然終於是失敗了。但據軍事專家們的研究，阿比西尼亞人民勇武善戰，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都極有利，雖說軍火不足亦不良，然而到底是不應該失敗的，可是他們用錯了戰術。他們不應該對敵人採取對壘式的陣地戰，他們應該運用天時（大雨天）和地利（森林和山谷）對敵人來虛襲擊，誘敵深入，破壞後方等等游擊的戰術。在軍力上不堪對比的形勢下，弱者一方面祇能以智以巧取勝，却不能和它硬上。可是阿比西尼亞沒有採用這一智巧的戰術，所以纔遭到慘敗的。這就是

告訴我們倘使我們要向我們的敵人抗戰，我們也不能和敵人作對壘式的陣地戰，至少我們武裝不備的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抗戰是如此。我們一定得採用我們弱小民族獨特的戰術——游擊戰。

所謂「游擊戰」在我們中國，尤其是在中國的農民大眾，並不是一個什麼新名詞。我敢說：中國大部分土地——比方福建、廣東、江蘇、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河南、陝西、山西，以至甘肅、寧夏等凡是有過「匪」蹤的地方——上的農民，大概沒有不曉得「游擊」這回事的。我們要講起「游擊戰爭」來，或許他們比我們還懂得多些，甚至他們之中還有人有過這種作戰的經驗也說不定。我們今日再和他們談游擊戰爭，祇不過是舊事重提，對他們施行軍事訓練，也不過是溫習舊功課。

現在我們該說怎樣組織游擊隊了。自然游擊隊的組織，應先從地方做起。比如村、鄉、鎮、市，我們先從村起。先說編制：照普通軍隊的編制法，是排、連、營、團、旅、師、軍團，比方五十人為一排，三排為一連，共一百五十人；三連為一營，再加上一些軍佐之類，差不多五百人；三營為一團，約一千五百人；三團為一旅，約五千人；三旅為一師，約一萬五千人；三師構成一軍團；這就是所謂「三三制」。

我們的編制，也不妨採取同樣的方式，但是我們不要往那大處着想，我們應該從極小處做起，我們還應該更精密些，從幾個人編制起，比方有十個人我們就成立一小隊，幾個小隊成立一中隊，幾個中隊，成立一大隊，這樣地推進。我們前面估計過，假定一個村子有五百人口，以一百人為壯丁，能夠組織，那我們就成立一個大隊，甚至連一個大隊也不容易，我們就成立一個中隊也行。就是祇成立一個小隊也不妨。我們應該以小隊為組織的基本單位，逐漸地強化，逐漸地展開。倘使一個小隊弄不好，那麼就是讓你構成一個軍團，也是軟弱無力的。徒然誇大是沒有用的。

游擊隊的組織，是在作死活的鬥爭。這東西不能和普通的軍隊比，那是再明白不過的事。我們的游擊隊組織起來，要比普通的軍隊勝過百倍。這「勝」，自然不是在數量上，也不是在武裝上，而是在質量上勝。那就是說：我們每一個游擊隊員都是鐵一般的堅硬份子，由這些堅硬份子，構成一個堅硬的部隊。一個份子要抵得上幾個普通的軍人，一個部隊要抵得上幾個同量的普通部隊纔行。因此我們對於游擊隊員的選擇，不能不有相當的條件。什麼條件呢？

一、要具有必死的精神；

二、要具有決定的志願，不動搖，不悲觀；

- 三、要具有強健的體格，不畏難，不怕苦；
- 四、要具有政治意識，瞭解自己的任務；
- 五、必須不但同意救亡的綱領，還須堅決地執行；
- 六、要忠實於自己的任務；
- 七、在行動時，要能服從決議。在戰鬥時，要能服從指揮。

每一個隊員要具有這些條件，纔能組織成一個鋼鐵般的部隊，擴而大之，纔能構成一個偉大的堅強的人民軍。固然這些條件也許過於嚴格了些，並且像裏面的有幾條，比方政治意識之類，在一般大眾，恐怕是不容易具有的，要他們具有這樣嚴格的條件，不是很困難嗎？但是要知道：一切「事在人為」，要知道：「百鍊成鋼」，如果我們不斷地予以訓練，生鐵也可以磨成綉花針的，雖然是十分困難，只要我們耐心地去做。

不過有些條件是有些人容易具有的，也是有些人不容易具有的，因此我們在組織的對象上，不能不在大眾中加以選擇。那就是說：我們先要在大眾中確定我們的基本對象。我們前面說過：抗戰救亡雖是全民族的任務，是每個中國人的事業，不分貧富智愚賢不肖。但是，在社會構

成上講，由於他們所處的地位和環境以及生活條件之不同，他們自身間的利害關係，也就各異。比方那些貧苦的人，他橫豎勞動拚着命地勞動，有時還挨餓受寒，生命難以維持，死在他看來，是不足惜的，但是生，當然是他所欲求的，從死裏去求生，是他唯一的路。可是有些社會地位和生活條件比較好些的人，他雖也知道做了亡國奴要吃苦，但是要他去拼命，那麼對於眼前的舒適生活總難免有些留戀，因而他的意志就不堅決，容易動搖，怕吃苦，貪生怕死。這樣看來，我們組織游擊隊的基本對象就容易確定了。就是說：在農村應該是那些田無一畝，地無一分的僱農佃農，在城市中，應該是那些家無隔日之糧，手無生產工具，完全靠出賣勞力的工人。

雖然我們的基本對象這一類的人，但是非這一類的人，我們也不應該放棄。雖然他們不能參加到游擊隊裏面來拚命，但是要他們贊助游擊隊的組成却是可能的。比方供給經費、食糧、房舍，以至於武裝等等。我們一定得千方百計地使得他們環繞在我們的周圍，與我們以種種的方便。萬一有什麼格格不入的地方，我們應該苦口婆心地責以大義地去說服他們。千萬不可爲了一時的意氣衝動，犯些幼稚的毛病，激成階級的仇恨。要知道：我們目前最大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在未把這最大的敵人打倒以前，我們便什麼也談不到，而打倒這一強敵是非拿出我們全

民族的力量來不行的。因此我們纔主張不分黨派不分階級地一致對外。過去雖然有過仇恨，但過去的仇恨，不妨暫時擱下，並且在打倒帝國主義的這一進程中，這仇恨會消除掉也說不定，我們什麼事都務必要以結成這民族的聯合戰線爲前提。

（鹽機）

新的邏輯及其方法

動的邏輯的全部精神剛剛與形式邏輯相反，後者忽視事物中的矛盾之存在，而前者却承認一切事物與概念都包含有矛盾，一切體系都是對立物的統一；後者忽視事物的流變發展，而前者却認為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斷的變動發展中，世上沒有不運動的物體，亦沒有不變化的事物。後者抹煞事物的關聯，而前者則以為個體與個體之間總是相互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的，世上斷無孤立存在的東西；後者的推理與判斷總是抽象空泛的，而前者則認為事物的真相只能求之於具體的實際情況中，真理總是具體的；後者常常抹煞量與質的差別及關聯，而前者則以為量與質是有差別而又互相轉變影響的。動的邏輯這種根本精神是最能確切地反映客觀的實際情形的，我們可以說動的邏輯與形式邏輯分歧的主源就在於它的規律是原來存在於

客觀的世界中經人發見出來的，只有當人的主觀認識能夠與客觀的實際運動法則取得一致，這種規律才由客觀世界轉移於人的頭腦中，所以這種邏輯可以說是客觀與主觀的統一或一致，這和後者——形式邏輯剛剛相反，因為它的規律祇是由人的主觀頭腦設想出來，而這種規律不符合客觀的實際是絲毫沒有保障的。就是歸納法雖然亦注重客觀的觀察，但一則因它只能抓住現象的皮相，而不能透入事物的內部，發見其內在的關聯與轉變；二則因為它不能把握着客觀世界自存的基本運動法則，而以此種法則為思維的基礎，所以它所得出來的結論仍然是常常與實際不符的。

動的邏輯既是一種思維的方法科學，它就不能不依據一定的哲學理論之上，因為哲學主要的一部分，就是方法論。動的邏輯的思想發達得很早，在古代希臘，許多哲學家都曾流露過動的邏輯思想。譬如赫拉諷利圖士(Heraclitus)（約生當紀元前五〇〇年間，希臘唯物派哲學家）就有許多名言是富有辯證的（即迪亞納克希克的）意味的，他說「鬥爭乃萬物之母」，又說「一切皆流動不居」。他舉了一個淺顯的例子說：「人不能兩次浴於同一之河，」因為第二次入浴的河，由於水的流動，已不復為第一次入浴之河了。德謨諷利圖士(Democritus)（紀元前四六〇——三六一，新

厭唯物哲學家也說：「河流是存在的，同時又是不存在的。」蘇格拉底亦曾說過，同一事情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亞里斯多德雖是形式邏輯的創始者，而他的哲學亦含有許多迪亞納克蒂克思想。後來歷代許多哲學家都常流露迪亞納克蒂克思想於他們的哲學學說中。只是歷來的哲學家的迪亞納克蒂克理論是斷片的，偶然的；直到十八世紀黑格爾（G. W. F. Hegel）（1770—1831，德國大哲學家）才將迪亞納克蒂克整理成爲一種嚴整的系統，今日的迪亞納克蒂克邏輯可以說是導源於此。不過黑格爾的迪亞納克蒂克方法是以唯心論或觀念論爲基礎的，即是將世界的發展看做「絕對精神」的發展。所謂「絕對精神」是存在於客觀世界永久不變的，宇宙及一切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都受它的規定。在黑格爾哲學中，顯然包含着無可解除的矛盾；一方面他承認萬事萬物都在不絕的流變發展中，另一方面却又主張有所謂「絕對的精神」；一方面認爲真理是具體的，另一方面又企圖在自己的哲學中確立永恆不變的真理。這個矛盾直到十九世紀才爲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建立者所解除了，從此以後迪亞納克蒂克才與物質論聯結起來，成功爲迪亞納克蒂克的物質論（Dialectic materialism），這與黑格爾的迪亞納克蒂克的哲學基礎是全不相同的。然物質論辯證法在方法論上是發展黑格爾的迪亞納克蒂克

的，所以在基本法則上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

一一

新邏輯的思維法則是依據新的方法論迪亞納克蒂克為基礎的。但最徹底的迪亞納克蒂克方法論乃是依據於物質論上的，所以我們在此是以物質論迪亞納克蒂克為準繩。要敘述新邏輯的思維法則，首先就必須弄清楚迪亞納克蒂克的基本法則是什麼？迪亞納克蒂克的基本法則向來有很多的劃分法，但比較經濟而概括的說明法，是不外將它分為下面幾個基本律則：

一切的事物都含有量（數量或分量）與質（性質或特質）的兩重要素，沒有無量的大小之物體，亦沒有無質的差別之物質。然我們所要明瞭的是，質的差別與變化是受量的大小與變化的規定的。原子之所以各不相同，就是由於所含的電子量與陽電荷的單位量之大小不等；假使世界上一切原子的陰電子量與陽電荷的大小完全一致，那就不會生出物質的差別。這樣的宇宙萬物就根本不能構成了。水的熱量增加到一定點，就變成為汽，減少到一定點，就結成冰，由水變成為汽或冰之質的轉變，是由溫度的增減所規定的。這是量的變化決定質的變化極淺顯的

例子。在社會現象中我們亦可看見同樣的情形。例如勞動者集合在一塊作工，由於人數增加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工作效率的改變，因為多數的人能夠實行分工，減少許多勞動上的浪費。商品生產過剩與勞動大眾購買力縮小二者達到一定點，就必然要引起經濟恐慌，這說明在社會界與自然界同樣可適用量的變化引起質的改變的法則。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明白，就是由量到質的變化是採取着突變的姿態。當一種物體的量的增減尚未達到一個臨界點之前，其變化是漸進的；可是當牠一達到一定之點，突然的質的變化於是出現了。在自然界如上述的水化汽或結成冰，在社會界，如革命與恐慌，都可以說是突變，沒有突變，亦就沒有質的改變。其次，我們更要知道質的改變亦可以規定量化的變化，換言之，由質轉變到量是由質來決定量，正和由量轉變到質是由量來決定質一樣。由水變為汽，一方面引起了一種新質（氣體）出現，另一方面汽的新質之出現同時就將分子的密度、運動及能力之量的關係改變了。同樣，由物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達到一定點，引起了社會革命，這種質的突變必然使社會生產力向前增進，使社會的生產規模更為擴大。上述的法則，我們就稱為量質互變律。

一切事物為什麼會運動變化呢？就是因為每一物體含有對立的矛盾。一種東西正因為特

是自己，同時又不是自己，是這樣同時又不是這樣，才到向前發展運動着。最簡單的如機械的位置移動，就是因為運動體在同一瞬間是在某一點，同時又在某一點之外，沒有此種矛盾，就無運動可言。故所謂運動，就是在某一個位置同時又不在這一個位置的對立之統一，也可以說，運動就是物體向前移動這個統一過程之分裂。在有機界中，我們亦可以看出對立的統一與鬥爭是生命活動的基礎，如細胞的死亡與新生，機體內部物質與能力的新陳代謝等現象正是對立不絕的發展過程，此等對立是在有機體內統一着，互相聯繫着的。但是所謂對立的統一，並非兩種相反的力量機械地對抗湊合而成的，而是由對立經過不息的鬥爭互相轉變表現出來的。有機體的生長過程是細胞的不斷分裂增多（一分裂為二，二分裂為四……），但這必須使許多舊的細胞歸於消滅，才能促進機體的成長，我們前面所舉的生物體新陳代謝亦是這樣，所以生長即是發生與消滅的不斷鬥爭與互相轉變過程，假使不是這樣，細胞只有新生，沒有消滅，那機體將無限制的發展下去，牠的生命活動就一定不能繼續。又如社會主義是要消滅國家的存在，但這必須以建立一種新的獨裁為前提，使國家得到高度的發展，即是要消滅社會的差別，而促進國家的自然死滅。社會的不斷變動與發展將來必使各個民族的文化歸於消滅，而融化為全人

類的世界文化，但在未達到世界文化的階段之前，必須使各民族的文化盡量發展。這些都是對立的鬥爭與相互依存相互轉變的實例。最後我們要認識清楚，所謂對立是由事物內部發生的，事物運動發展的根源是在自己內部，並非由於外力的衝突對抗。一種事物一開始發生，就包含有否定自己的反對物，而造成內部的對立，對立的統一鬥爭與互相轉變，就形成該事物體的存在與發展過程。封建社會之所以歸於消滅，是它內部的對立（發展的生產力與封建生產關係的衝突，新興市民集羣與封建閑閥的對立等等）發展鬥爭的結果；代替封建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並非由封建社會外部襲來，而正是胚胎於它的自身內部，換言之，是由封建社會內在的對立發展與轉變而來的。總之，事物的發展，即是不絕的自己運動過程，而這種運動的根源却在於它內部所含的矛盾的對立，此等對立是在互相鬥爭互相轉變上統一起來的。上述的法則我們可稱爲「對立的統一律」。

一切事物（無論是自然界的，社會界的，精神界的）乃是在不絕的變化發展中，在這過程中由於內部的對立之增大，就使事物走到與自己反對的方面去，而否定原來的自己，但這樣並沒有終止發展與變革，在舊的形態（原來的自體）被否定之後，否定自身（新的形態）又要繼續

發展到它的反對面，而再被否定着，這樣就達到了否定之否定的境界。不過否定的否定，並不是指事物還原為最初的形態——原來被否定的事物的形態之復活，——而是產生具有更高級的形式、內容的體系，因為它綜合以前的有用的成分作為它自己構成的內容，而又加上新的性質，例如穀子播種於泥土中，因萌芽成長為稻而否定了它自己，以後更因開花結實而否定了稻自身，這就是否定之否定，但新稻子是以許多倍而出現，比原來的稻子增大了其數量了，所以否定之否定在稻子並非單純的還原。許多虫類的變形亦可以說明這一點。例如由蠶蛹變為幼虫——蛾蛹被否定了，蛾在產卵後又衰老而死，所以蛾自身亦被否定了。在社會界亦可以舉出無數類似的例子：例如私有制代替財富公有制，這時是公有制被否定了，但以後反私有制的革命發生，於是否定（私有制）自身亦被否定了。又如性生活的絕對自由是原始人類生活的重要特徵之一，以後這種自由終於為限制的佔有的婚姻制度所破壞了，但是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了真正自由平等的階段以後，佔有式的婚姻制又必然要被否定了，而出現新的自由的性生活。自然未來的財富公有與原始的財富共有是不相同的，因為前者是在一個最高級的最大規模的生產基礎上建立着，又未來的自由性生活與原始的亂交亦必不相同，因為前者是基於科學的衛

生的知識上而與高級的生產文化配合起來的。社會的進化不能解釋爲循環，就是因爲否定的否定不是單純的復歸原狀，而是繼續往上的發展。其次我們有三點要弄明白的：第一、否定的否定並不能從事物變動的形式上去了解，而必須從事物發展的內在關聯之互相推移去體察。如果我們單單說稻的萌芽否定稻子，稻實又否定稻莖，這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必須明瞭稻子本身之所以被否定，是在於稻子自身在適當的自然條件之下發生了有機的矛盾與變化（如細胞的分裂與蛋白質的化學變化等），而以後稻自身之所以重被否定，亦本此理。私有制否定財富公有制，亦是因爲原始共同社會內部發生了矛盾，當時共同的生產關係包容不了正在發展的生產力（剩餘勞動與新的生產手段之發明），以後共同制代私有制而興的否定之否定亦同此理。第二、所謂否定，並不能解釋爲完全的取消，否定之否定尤不能認爲取消之取消，而必須把否定之否定看作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矛盾之總解決，例如私有制否定公有制，並非將原始社會的一切生產技術與物質生活基礎通通破壞無餘，未來的共同制否定私有制亦是如此，這是要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基礎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給予根本的解決，使新的生產力在另一種生產狀態之下向前發展。第三、不論是否定或否定之否定，不是採取緩慢的形態，而

是以飛躍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這就是說自然界與社會的變革及再變革到來時，不是一點一滴一寸一分堆積而成的，却是突然的跳躍地出現的。這在前面我們講量與質的相互轉變時，已詳爲述說了，此處不必再贅。

三

我們在前面之所以不憚煩來敘說新方法論的基本法則，並非要對讀者高談哲學的理論，而寫成一部專門的哲學著作或社會科學專書，只是因爲要獲得新的思想武器——新思維法，就不能不洞曉製造此種武器的模型。新方法論是對於形而上學舊方法論的克服，明瞭了它的基本法則，然後始能談得上新的思維術。

依照上述的三大基本法則，可以建立我們的新的思維法則——動的邏輯的思維法則如下。因爲物質論迪亞納克蒂克既然承認思維法則是客觀世界發展的法則之反映，所以在下面我們對於客觀的運動法則與主觀的思維法則作統一的綜合的考察。

第一、因爲世界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中發展，以對立的統一形式存在着，運動着，所以我們

觀察一切事物，亦必須辨認其內在的特殊矛盾與對立之相互轉變。只有在矛盾中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質，解決現實上所生的矛盾問題。例如機器排斥勞動者是有弊的，促進社會生產又是有利的，我們在沒有提出具體的解說以前，即斷言機器是有利的，或是有害的，這是一種武斷，而一定要陷於事實上的矛盾中。又如我們研究一個社會革命，就必須從一定社會的內部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社會各集羣的矛盾等等中去找出它發生的客觀原因來，而不能求之於偉人的頭腦中或是沒有矛盾的偶然事件中。研究戰爭、經濟恐慌與各種重大的事變，也要乘此觀點着手。

第二、因為世界由其內部的對立推動其向前發展運動，所以世上決沒有絕對靜止不動、固定不變的事物，一切都在新生、成長、消滅與變形之中。因此我們觀察任何事物，也不能將牠們當作凝滯的死板的永久不變的東西看待，只有在不絕的流變發展過程中才可以發見事物的本來面目，一切的天體、生命現象等總是在向前改變自己，所以我們不能說地球、太陽系、生物界永久是如一的，我們只能認為從無限大的天體到渺小的生命體都要經過發生、成長與消滅的諸階段，而其中是包含着無窮的變化的。我們的社會亦是這樣，誰能說自有人類直到現在，人類社

會沒有經歷過許多次的變化呢？誰又敢說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將維持到萬千年永不滅亡呢？我們不論是觀察自然界，人類社會，都必須追求各種現象的生滅變化，尤其要注意到的是量與質的相互轉變與飛躍的突變，而將飛躍的變化看作新的事物體系發生之起點。要記牢一切事物都是無限的發展過程。自然，這一法則是必須和上述的法則聯起來運用的，因為事物流變發展的根源，還在於牠本身矛盾不絕的發生與解決。

第三、因為世界並不是由無數個別的事物體堆積起來的總和，而是有着內在的有機聯繫的，所以世上決沒有絕對孤立的東西存在着，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環境、以及個體內部各分子之間都存在着不可見的關聯，而互相影響着，牽連着。準此，我們不論考察何種問題，決不能把問題當作孤立存在的東西去解決，而必須注意到它的現實上的聯繫性。譬如說地球在太空中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因為假使沒有太陽及其他星球的相互牽連維繫，地球決不能單獨存在。中國在世界上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因為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中國已與世界聯結得、分不開來。當我們研究一個國際問題時，就必須要對於所有和此問題有關係的國家與民族加以考察，而辨認她們之間的相互牽連與影響。當我們研究勞動者的生活狀況時，我們就必須考察勞動集

羣與資產者層的關係，必須考察他們的工資與社會的分配制度之關係。總之，從全面與相互關聯中去觀察事物，才能發見事物發展的實質。

第四、因為世界一切事物都是有矛盾的，在變化的，並且具有質與量的特性的，所以世上就沒有抽象的籠統的真理，一切真理祇能是具體的，因之我們觀察任何事物決不能單看見一面或一時的表面現象就遽下斷語，說某種事物是這樣，而絕對不是那樣。例如前面我們舉的一個例子，即美國是窮呢抑是富呢？我們就不能籠統的回答一句美國是窮或是富，必須要從美國各社會層的生活狀況去加以觀察；然後作出如下的答覆：美國的資產者層是富有的，勞動者層是貧窮的。又如問戰爭是應該反對呢抑不應反對呢？如果我們只根據人道主義的立場來下斷語說是「應該反對」或是依據軍國主義的觀點來回答說「不應反對」這是顯然荒謬的。我們必須要辨認清楚，一個戰爭究竟是帝國主義戰爭或殘殺人民的戰爭，抑為反帝的革命戰爭，如果是前者，當然要堅決起來反對，如果是後者，則我們就不但不能反對，而且應該擁護贊助了。所以祇有從具體的實際環境與情況中去觀察事物，才能不與事實相違背，相去太遠。

最後，我們還得明瞭所謂動的邏輯與形式邏輯最大的分歧點，就在於前者是盡量反映實

際通過人的實踐求出來的，而後者只是憑主觀的思維用形式的法則去解決問題，兩者的所以價值懸殊不問而知。要正確理解及運用動的邏輯，就必須處處顧到理論與實踐的關聯，祇有經過自己的實踐（如自然科學上的實驗解剖，社會科學上的觀察試驗）才能獲得正確的對於實際的認識而使動的邏輯之運用取得實際的基礎。

總之，動的邏輯是活的規律，不是死的公式，只要在不違反迪亞納克蒂克的基本法則的條件之下，我們隨時可以運用它來探求真理，鍛鍊我們的思想。我們不論是研究學術，處理實際問題，都必須立足於動的邏輯的精神之上。

動的邏輯是一種銳利的思想武器，這是與形式邏輯不可同日而語的。可是這並不是要完全拋棄形式邏輯。形式邏輯固然有許多缺陷與謬誤，但在某些特殊的場合，它有時是可以用得着的。因為形式邏輯解答問題總不外「是」與「否」，所以有些事物在永恆的運動中形成了相當久遠固定的結合而未被運動所消滅，我們對它是可應用形式邏輯的思維法則「是即是，否即否」來解答的。如果有人問我們所住的地球是存在嗎？我們當然要回答「是」；如果有人問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嗎？我們當然要回答「否」，「要是不然，那就連起碼的真理都成立不起來

了。所以動的邏輯並不排斥形式邏輯——「是即是，否即否」的邏輯方法。形式邏輯與動的邏輯之對立在人類的思維上是統一起來，而且必須被統一起來，不過形式邏輯不能作為主要的思考方法，它對動的邏輯是處於從屬的地位的。（平心）

新的科學

科學能夠給予人們很大的利益是明明白白的。要是科學不發明消毒法和麻醉藥，今日還只有小瘡癩能夠開刀，須施大手術的病便不能醫治，要是科學不發見傳染病由於微生物的寄生而起，今日這等疾病還沒有方法防禦。要是科學不發明血清注射和引種牛痘的方法，每年必有許多或更多的人死於天花和白喉等疾病。在交通方面，科學的發明也給予人們許多的便利，倘使不發明輪船及火車等，我們出行時，旱道只好穿了麻鞋步行，或坐了騾車行走，如走水道，只好坐帆船航行。現在有了輪船和火車，快捷得多了，從前一兩個月能走到的路程，現在數天便可走到，科學把空間縮短了，時間也經濟得多了。此外，科學應用在農藝上，可以改良品種，增加收穫。機器的發明和電氣的利用上給予我們的利益真是一時說也說不完，好在也不用着說，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科學研究的結果，只要能夠好好的應用，能夠給人類的生活更加便利，安全而且豐富，是一點沒有疑義的。將來科學再進步上去，當然更能夠增加利益，這是意料之

中的事。

科學不僅給予人類物質生活上的利益，並能使人類的思想進步而且正確。——把人類的思想從迷信和黑暗中拉出來，引導它走入科學思想的路上去。譬喻：從前的人相信人是由神人女禍氏用黃土做成的，科學說明人類是從像猿猴那種生物進化而來的，這說明很重要；不特打破迷信，並且使人的思想前進。——人類既從較下等的生物進化而來，將來必定還能進化上去的，迷信說個人的產生是由靈魂投胎來的，個人的生活得好不好，全靠投胎的靈魂如何而定。科學說個人是由卵子發育而成的，並沒有靈魂存在。這說明也非同小可，不特把思想從迷信中拉了出來，而且教他向奮鬥的路上進行。所以真正的科學，在精神生活方面也很有用的。

可是，古代不必說，便在認為科學已頗發達的現在，科學還有着許多缺點，原因是由科學的誤用。我們譬喻的話來說吧：火藥用在有益的方面，可以開路，省却許多人的勞力；然而用在壞的方面，可以做成炸彈，炸死許多人。又如飛機吧，如用以坐人，探險運送，以至於治害蟲，都是極有用的。但如用它來投擲燒夷彈，大炸彈，還能做出好事情來嗎？用科學方法鍛鍊出來的鋼鐵，可以做農具和機器，但也可用以造大砲。空看如何方法。電器可以開動機器，點燈，煮飯等等。但用得不

好，便有所謂電刑；全看如何應用。

同樣的，古代不必說，便是到認為科學已很發達的現代，科學中還夾着中古時代的彩色，還不是徹底的，嶄新的科學。在這種情形之下，科學研究的結果之所以往往要被誤用也就不足怪。科學的本身該是打破迷信的，照穿黑暗的，反對宗教的。然而今日的有些科學著述中却還夾雜着迷信。例如第那摩夫（Sergei Dinamov）曾經指出紐約（？）的科學家哈爾登（Dr. J. S. Haldane）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科學和哲學」裏曾經說着這樣的話：「上帝分明在實驗室的日常工作中。」又如英國的著名物理學家洛奇（Stroliver Lodge）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的「你為什麼相信不滅」裏竟說人體死後的靈魂不滅是可以證明的事。還有生物學家潑練忒（Platt）說「宗教是最大的恩賜。」蘭克（Ranke）的「植物的哲學」裏說是有創造主存在着。此外更有相信所謂生機論的科學家，說有一種超自然的力在指導着生命！科學裏是這樣的混雜着迷信，以及唯心論。

理想的科學，是應當把研究所得的結果用在有益於大眾的方面的，使各人的生活更豐富而且便利。真正的科學是應該澈頭澈尾科學的，一點不夾雜迷信和唯心論一類的東西而是新

新的，題目上所謂「新的科學」，便是指這樣的新科學的誕生。中國不久便應當不以介紹學習這等含中古色彩的科學為滿足，好好的培養出新的——即真實的科學來。（周樹人）

新的文學

前些時候，有人出了個題目，徵求討論——「中國現在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討論的結果，（我想說那次的討論其實並沒有結果，不過有意義的提示 [Suggestion]）却倒不少，這裏只好省點篇幅不照抄，但是單單看了「爲什麼沒有產生」這問句就叫我們對於「新的文學」四個大字有點臉紅。倘使讀者也是留心文壇現狀的，那他會覺得目前「新」的路上荆棘還多得很；他會看見「僵尸」在那裏跳舞，「垃圾堆」在那裏蒸發毒氣。「文學」這東西，好像壓在磐石底下的一棵樹，雖然是往上長，却是曲折盤旋，費了許多冤枉的力量。

自然這也是「生」，而且是「新生」，但還不是我們大家來開「慶祝會」的時候。我們可以數出一打的理由來，證明前途的希望是必然無疑，然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了去找新的「肥料」！

也許你，朋友，是樂觀的；不過也有些人是悲觀的。這些悲觀的先生們不一定看了「新的文

學」四個大字臉紅，也不一定看明白了路上有多少「僵尸」，多少「垃圾堆」，他們只記得這新的芽頭是早就透露在地面的，可是現在還長不出熟透的菓子，就搖搖頭倒抽一口冷氣。這些先生們有時「纏夾」得可入「幽默」之林；譬如人家說「現在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因為作家的生活經驗不夠」這是一種鼓勵，然而悲觀的先生們却就據此而加強他的搖頭嘆氣；又如最近「大衆語運動」要求作家們用「大衆語」寫作，要求作家們獲得大衆的意識，於是悲觀的先生們在「貨色」看不到的當兒，又頓覺得鑼鼓雖響，還是不行。他們似乎一向早已認定「新的文學」乃是直線式的，——人家說一聲「成了」，他們就想到「慶祝會」，說一聲「還留得有毛病」，他們就想到「發訃聞」。其實我們不該如此「生鐵門脫兒」；我們對着「文學的新生」五個大字老實要臉紅，因為這個「孩子」還是九災八難的，還是幼稚的，還是沾着點兒「僵尸」氣味，還是披着老式的阻礙牠發育的緊身襖兒；但是我們的臉紅是「知恥近乎勇」，我們一邊紅着臉一邊却要正正經經說：「得給牠更多的滋養品！讓牠在太陽光下晒，在暴風雨裏吹淋。讓所有對於牠的指摘都成爲糾正牠姿態的木板鐵棍！」

我們不應該替牠辯護說：因為牠年幼小，因為牠多災多難，所以還產不出偉大的作品。我們

却要認明白正因爲牠年紀小，正因爲牠多災多難，所以牠一定能夠鍛鍊一副堅強的筋骨，產生偉大的作品！

我們在目前這紀念日做的是搭題文章，但將來在另外的紀念日就不會再是這樣一種光景！

從前有一個時候，大家對於這「孩子」不免寵着了一點兒；不大注意到牠還有先天帶來的「僵尸」氣，牠還穿着那件阻礙發育的老式緊身襖兒。並不是沒有一個人看出來，却總不像最近幾年裏那麼大家指着牠叫道：「看！這孩子身上還有一股破爛舊東西的霉腐的氣味呢！牠還穿得那麼一件不衛生的古老的緊身襖呢！」這樣的指摘，在一向覺得這「孩子」就很「合式」的人們看來，自然以爲是多事。他們中間最虛心的朋友也不免賭氣地說道：「好！就請你們來調理牠妝扮牠給我們看看罷！」其實不等「請」，人們已經拉這「孩子」出來在太陽裏晒，風裏吹，雨裏淋；這時代有的是對於這「孩子」有益的陽光和風雨。人們又忙着找新材料，打算給牠裁一身合式的褂子。纔晒了吹了淋了這麼幾天，牠不能馬上就長成鐵骨銅皮，可是你不能說這樣的「調理」辦法就不對。纔找了這麼不多幾天的材料，忙着剪裁，自然還沒成衣，可是你

不能說這是瞎忙一陣子，弄得這「孩子」永久沒有衣服穿。這當兒，素來憎惡這「孩子」的人們自然要說幾句冷話。便是「孩子」自己也不免暫時「茫然」不知所措。然而歷史命定牠的路牠要是不走，只有死。牠一生下來，牠的「八字」就注定了牠必須在奮鬥中求發展，求生存。牠的「路」不是一條直線，而是螺旋形綫；而這螺旋綫便是時代的客觀環境所決定。

在這裏，我們不妨再拏前面說過的大石頭底下小樹的生長來作一次比喻。小樹在生長，牠要陽光，要雨露，牠是要朝上攢的；然而大石頭壓住牠，使牠不得不先取了橫生斜上的姿勢。碰到旁邊還有東西阻礙牠的時候，牠不得不這麼彎一下子。在牠這生長的過程中，有時爲了空氣和光線都不適宜的緣故，牠的莖和葉會不像牠本來應該有的樣子；但是這不大像樣的莖葉無論如何是牠吸收水分炭氣的助長牠發育的過渡時期的「作品」。沒有了這，牠根本就會枯死。要是我們錯認了這些就是牠應該有的本來面目，果然不對；然而倘以爲這些簡直就不用「產生」，也不是正確的議論。我們一方面要認明這樣的莖葉還不是這棵樹應該有的莖葉，但另一方面我們絕不能因此而就剪去牠們，我們得明白：只有靠這些莖葉的蓬勃滋生，這才能夠使得這棵小樹粗壯起來，把壓在牠身上的大石頭掀開，把一切阻礙牠朝上長的困難克服，產生了像樣的

莖葉，開放美麗的大花。

目前我們這棵「文學」樹正因為有大石頭壓着，正因為空氣光線的關係，只能抽放着不大像樣的莖葉。我們是感到不滿的。但是我們與其單單指着牠大叫「不行」或者是單單「研究」牠倒底算不算得「真種」，（自然大叫和研究也應該；你不叫，人家不理會，你不研究，就不會弄明白，）倒不如趕快給牠加肥料。但是這肥料單單有滋養還不夠，還得連帶殺蟲性；有些蟲蛀這「樹」的根。

在這裏我們又會連帶想起了「雜文」和「顯微鏡」的比喻。倘使把人們所要求的一偉大的作品「比作那能夠把「現在」放大又能夠遠見「將來」的「千里鏡」，那麼，短短的一「雜文」便是「顯微鏡」那樣的東西。（關於這個，讓我介紹文學十月號的一篇「論壇」雜文，也不容易做。）「千里鏡」是要的，但「顯微鏡」也是要的。尤其是現在，「樹」旁有一潭水也許是藏着有害的細菌，看去是光滑的皮，也許已經有什麼害蟲的卵寄生，這都需要「顯微鏡」來檢查個清楚。一個健康的人不會怕「顯微鏡」，一個想要健康的人一定歡迎「顯微鏡」。在目前「顯微鏡」式「雜文」的發展正是時代所要求。

預言往往靠不住。但對於現任文壇印了幾句話可以預先說的就是文壇上倘若客客氣氣毫無論爭，倘若青年們都恭奉「十年鍊賦」的「格言」，不敢在這薄弱的陽光混濁的空氣中吐出他們的「不太「偉大」的莖葉，倘若那件不衛生的緊身襖還不趕快脫掉，讓民間的天才也來貢獻他的一瓣兒，——那，倒是文學的死症！（茅盾）

新的教育

宇宙是在動。世界是在動。人生是在動。教育怎能不動？並且是要動得不歇，一歇就滅！怎樣動？向着那兒動？

我們要想尋得教育之動向，首先就要認識傳統教育與生活教育之對立。一方面是生活教育向傳統教育進攻，另一方面是傳統教育向生活教育應戰，在這空前的戰場上徘徊的，緩衝的，時左時右的是改良教育。教育的動向就在這戰場的前線上去找。

傳統教育者是爲教育而辦教育。教育與生活分離。改良一下，我們就遇着「教育生活化」和「教育即生活」的口號。生活教育者承認「生活即教育」。好生活就是好教育。壞生活就是壞教育。前進的生活就是前進的教育。倒退的生活就是倒退的教育。生活裏起了變化，才算是起了教育的變化。我們主張以生活改造生活。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使生活與生活磨擦。

爲教育而辦教育，在組織方面便是爲學校而辦學校。學校與社會中間是造了一道高牆。改

良者主張半開門，使「學校社會化」。他們把社會裏的東西，揀選幾樣，縮小一下搬進學校裏去，「學校即社會」就成了一句時髦的格言。這樣，一隻小鳥籠是擴大而成爲兆豐花園裏的大鳥籠。但牠總歸是一隻鳥籠，不是鳥世界。生活教育者主張把牆拆去，我們承認「社會即學校」這種學校是以青天爲頂，大地爲底，二十八宿爲圍牆，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學生都是同學。不運用社會的力量，便是無能的教育。不瞭解社會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們認定社會就是一個偉大無比的學校，就會自然而然的去用運社會的力量，以應濟社會的需求。

爲學校而辦學校，牠的方法必是注重在教訓。給教訓的是先生，受教訓的是學生。改良一下，便成爲教學——教學生學。先生教而不做，學生學而不做，有何用處？於是「教學做合一」之理論乃應運而起。事該怎樣做便該怎樣學，該怎樣學便該怎樣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學而不做，不能算是學。教與學都以做爲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學的是學生。

教訓藏在書裏。先生是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學生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改良家覺得不對，提倡半工半讀，做的工與讀的書無關。又多了一個死。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工學團乃被迫而與。工是做工；學是科學；團是集團。牠的目的是「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團不

是一個機關，是力之凝結，力之集中，力之組織，力之共同發揮。

教死書，讀死書，便不許發問。這時期是沒有問題。改良派嫌牠呆板，便有討論問題之提議。課堂裏，因為有了高談闊論，覺得有些生氣。但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有何益處？問題到了生活教育者的手裏，是必須解決了才放手，問題是在生活裏發現，問題是在生活裏研究，問題是在生活裏解決。

沒有問題是心力都不勞。書獃子不但不勞力而且不勞心。進一步是教人勞心，改良的生產教育者是在提倡教少爺小姐生產。他們掛的招牌是教勞心者勞力。費了許多工具，玩了一會兒，得到一張文憑，少爺小姐們到底不去生產物品而去生產小孩。結果是加倍的消耗。生活教育者所主張的「在勞力上勞心」是要貫徹到底，不得中途而廢。

心力都不勞，是必須接受現成知識方可。先在學校裏把現成的知識裝滿了，纔進到在社會裏去行動。王陽明先生所說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便是這種教育的寫照。他說的「即知即行」和「知行合一」是代表進一步的思想。生活教育者根本推翻這個理論。我們所提出的是一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有行動之勇敢，纔有真

知的收穫。

傳授現成知識的結果是法古。黃金時代在已往。進一步是復興的信念。可是要「復」一則不能「興」；要「興」一則不可「復」。比如地球運行是永遠的前進，沒有回頭的可能。人只見春夏秋冬，周而復始，不知道牠是跟着太陽以很大的速率向織女星飛跑。今年地球所走的路絕不是牠去年所走的路。我們只能向前開闢創造。沒有什麼可復。時代的車輪是在我們手裏。黃金時代是在前面，是在未來，努力創造啊！

現成的知識在最初是傳家寶，連對女兒都要守秘密。後來，普通的知識是當作商品賣。有錢有閒，有臉的乃能得到這知識。那有特殊利害的知識仍爲有權者所獨佔。生活教育者就要打破這知識的私有。天下爲公是要建築在普及教育上。

知識既是傳家寶，最初得到這些寶貝的必是世家，必是士大夫。所以士之子常爲士，士之子開了一間爲農的道理，便被罵爲小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教育只是爲少數人所享受。改良者不滿意，要把教育獻給平民，便從士大夫的觀點幹起多數人的教育。近年來所舉辦的平民教育，民衆教育，很少能跳出這個圈套。生活教育者是要教大衆依着大衆自己的志願去幹，不給智識分子

玩把戲。真正覺悟的知識分子也不應該再耍這套猴子戲。教大眾聯合起來自己幹，纔是真正的大眾教育。

知識既是傳家寶，那麼最初傳這法寶的必是長輩。大人教小孩是天經地義。後來大孩子做了先生的助手，班長，導師都是大孩教小孩的例子。但是小先生一出來，這些都天翻地覆了。我們親眼看見小孩不但教小孩，而且教大孩，教青年，教老人，教一切知識落伍的前輩。教小孩聯合大眾起來自己幹，纔是真正的兒童教育。小先生能解決普及女子初步教育的困難。小先生能叫中華民族返老還童。小先生實行「即知即傳人」是粉碎知識私有，以樹起「天下爲公」萬古不拔的基礎。（陶行知）

新的教育原則

侵略者有所謂「非常時」，被侵略者也有所謂「非常時」。侵略者所謂「非常時」的要務，是怎樣推進帝國主義的政策，趕造軍火，增加賦稅，濫作宣傳來欺騙民衆，使他們誤認爲向外侵略是挽救內部恐慌之道，誤認爲「光榮」比「麵包」更來得重要。而被侵略者所謂「非常時」的要務，則是怎樣抵抗帝國主義的壓迫侵略，喚起民衆，加強組織，發動一切力量，以挽救危亡。

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以來，侵略國內的軍閥官僚就提出了所謂「非常時」的口號，他們企圖以這樣的政策，脅使和平的民衆跟隨他們走，加速推動了對華侵略的輪子。實際上，從那時起，我們被侵略者的「非常時」也跟着開始了。但是，由於慘酷的摧殘所造成一般的麻木，我們這裏卻有人以「不抵抗」、「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以至「長期抵抗」等說法，掩蔽民衆對於「非常時」的危機的認識。然而，這樣的掩蔽只有加深了「非常時」的危機；我們領土

主權的喪失超過了以前一切的紀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民族中的醒覺分子還是在各方面呼號着。推動民衆造成挽救危亡的力量；只是他們所受到的內外壓迫也是「非常」的。不過民族危機的加深卻始終是掩蔽不住的；在去年整個華北危亡的關頭，我們醒覺了的學生民衆終於衝破了一切的障礙，把「非常時」的危機提出來給全國人民認識了。這樣，在許多人的口頭，我們才聽到了種種關於「非常時」的呼聲！

那麼，我們要怎樣應付這個「非常時」呢？這就關連到所謂「非常時」的要務了。無疑的，非常時的唯一要務是發動一切救亡的力量，立刻展開全面的抗敵戰爭。不過，這樣的發動抗戰當然需要特殊的訓練，於是許多人又提出了非常時的教育的問題。

關於非常时的教育，在廣義的方面，應包括全體民衆的訓練，在狹義方面，則學生青年所受的訓練，更含有特殊的意義。學生青年對於民族危機的感覺，最爲銳敏；在喚起民衆的工作上，他們也最爲努力。最近十餘年來我國學生青年在民族解放關爭中所表現的力量，乃是顯著的證明。所以，在目前的非常時，我們對於學生青年所需要的訓練，應加以特殊的重視；我們應以學生青年的訓練，作爲全國廣大民衆的非常時教育的基礎。

在最近許多方面對於非常時教育的實施，已經提出了具體的方案。這種方案，有的固然不免於機械式的或官樣文章化，但許多從民衆立場提出來的，確已包含了最切實的理論和步驟。在這裏，我想提出幾個重要的原則，作為中學青年接受非常時教育時候的基本注意點。

第一、我們所需要的非常時教育，應該適應於弱小民族的特殊性。在本文的開頭我已經說過：侵略者的非常時和被侵略者的非常時，是根本上不同的，而且是互相對立的；所以我們的非常時教育的特質，最重要是在表示被侵略的弱小民族的立場。譬如，侵略的帝國主義的非常時教育的特色，是在欺瞞民衆，那麼，我們的非常時教育的特色，就要盡量暴露侵略者及其工具的罪惡，昭告愛好和平的被侵略壓迫的民衆。現在侵略者及其工具的欺瞞民衆的主要手段，是封鎖新聞及輿論，我們被侵略壓迫者就應該利用一切的機會，去衝破這種封鎖，使一般民衆明白他們所受苦痛的來源，積極參加民族解放的鬪爭。

上述是關於弱小民族的政治鬪術方面的特點；在軍事的鬪術方面，弱小民族以低劣的武器抵抗高強的武器，他們的主重點應在利用遊擊戰術與經濟抵制的力量，去打擊到帝國主義的根本弱點。不抵抗主義者常以弱小民族武器的拙劣，說明抗戰的無用；這不是弱小民族所需

要的非常時教育，這是幫助了帝國主義的非常時教育。固然，我們應該明瞭最新式的高強武器的性質及用途，而且我們應該盡可能的利用這種高強武器；但這不是說，我們沒有了高強武器就不能抗戰。我們特別應該明瞭高強的武器也沒有不可避免的缺點，例如高強武器的轟炸，是宜於新式的大城市，而不宜於荒野的山林的。還有，高強武器的應用在經濟上也是非常浪費的。這樣，我們就可以發揮遊擊戰術的特點：延長陣線，使侵略者無從集中作戰；儘量減少本身的損失，卻要敵人浪費許多的軍火；長延時間，使侵略者的財政不能支持。在這時候，再進行經濟上的抵貨運動，以打擊到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場依賴的弱點，則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弱小民族的。

第二、我們在施行非常時教育的時候，更要注意從實際抗戰中取得訓練的一點。有人以為我們要準備好了以後，才能抵抗，這種等待主義的「準備論」，也就是坐以待斃的「亡國論」。侵略的帝國主義可以準備充分了之後，再製造一些邊境事件，開始大規模的侵略；但是被侵略者要在這種危機臨到之後，再從容等待就只有自取滅亡。從九一八到現在，一步步的「忍辱退讓」，「忍痛犧牲」所引起一層層加深的侵略，已經給我們以最慘酷的教訓。所以，現在我們的

非常時教育的意義，就是要使民衆明白在這個民族滅亡危在旦夕的「非常時」，只有立刻發動抗戰，從實際鬪爭中學習，才是抵制侵略者步步進迫的正道。許多理論上的缺點會在實際的經歷中糾正，許多技術上的弱點會在實際的鍛鍊中增強。在大禍臨頭的時候，這是唯一的爭取生存的道路，大家必須謹記着的。

第三，我們的非常時教育的另一種特質，是促成全國民衆的團結，一致對付侵略者。「團結即是力量」，這應當是弱小民族最重要的箴言。在大敵當前的時候，我們內部的一切小的私見都應當破除，站在一一致對外的戰線上。誰在內爭上用工夫，誰就是幫助了敵人。我們要知道，即使在文化比較上落後的弱小民族中，甘心助敵者也必是少數；而促成內部的團結，就可以多數人的意志克制少數人的變心。在施行非常時教育的時候，我們要以這一點作為最基本的精神上的教訓。

我們希望全國中學青年努力求取切實的非常時教育，使中華民族達到最後的解放。

（金仲華）

新的哲學研究

——民族解放運動的鏡子——

現在是「非常時期」也就是最困難的時期，不但個人的生活，社會的經濟，覺得困難，整個民族的生存也到了生死關頭了。

在非常時期，我們大眾就不能不起來做點非常的事情。因為我們要生存，困難在前面，就不能不和困難奮鬥，民族危機在前面，就得要大家起來衝破它。

要做事情，就同時要明白知道這件事情，種田人要懂得種田的一切知識，打魚的人也要懂得魚的習性。對於事情知道得愈清楚，做起來就愈更有利，糊裏糊塗的做事，是不會成功的。

在這非常時期，我們都要想想：我們自己對於這時期的一切，是不是能夠明白了自己應該怎樣做？走什麼路子？是不是也弄清楚了？是不是已經不糊裏糊塗了？

有人說：「這用不着問的。我生在世界，天天醒着，睜着眼睛，看見什麼，就知道什麼，周圍有些什麼難道還會有不明白的事嗎？我的心思就像一面鏡子，遇到什麼，就把什麼映進去，一切都清楚得很。」

這些話，有是有道理的，人的心思果然就像是一種鏡子，我們所道知，所認識的一切，都是這鏡子裏的反映。思想是外物的反映，這就合着了唯物論的道理。但我們要知道，鏡子的表面，也有不平的，也有凹凸不齊的，裏面反映出來影的，就不一定能保存原來的形狀。如果我們心思的鏡子不是一面好鏡子，不是也要把周圍的一切弄糊塗了嗎？

現在還有很多的人生活的困難給他們很多慘痛的教訓，他們還不明白自己的痛苦和冤屈，是那兒來的。民族敵人再接再厲的進攻了自己的領土，還有人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一定要來進攻，還妄想着可以用和平外交的方法停止敵人的野心。這都是他們的思想的鏡子不平整，把事實的影像弄歪曲了。

在這非常時代，要担任做非常的事情的大眾們，必須有一面磨得很平，正，能反映事物的真相的鏡子。這面鏡子不但要把事情的真相映出來，並且要能夠把我們所要走的路也照出來。

我們談人類生活的哲學，也就是爲要得到這面鏡子。這哲學必須把社會生活的變化前途告訴我們，把我們目前做事的方法指示給我們。如果它不能幫助我們做事情，我們就用不着還要談它。如果不能做民族解放運動的鏡子，我們也不要它，這面鏡子要立在我們民族解放的黨派上。

要成爲這樣一面很好的鏡子，我們的哲學就不能只是講空話的哲學，這哲學要切切實實地研究我們的社會和生活，敵人爲什麼在這幾年來會特別加緊的進攻我們呢？漢奸又爲什麼會這樣多呢？中國民族的解放是要走那一條路呢？這些問題都得要很明瞭的研究出來，要像科學一樣的說得很真確。

我們不要跟着一些昏庸的老頭子們，說些什麼「人心不古」的話，把一切的担子都推到「人心」上去。有些人以爲日本的侵略中國，完全是由於軍人的野心，有些人以爲中國的漢奸多，全是因爲一般人沒有良心，做軍人的不能抵抗，是因爲他們沒有愛國心，沒有民族的氣節。所以中國民族的出路，就是要設法向這些人有一個什麼表示，把他們的良心激發起來，或者來一個「節操運動」或「自覺運動」，使一般人有「民族的氣節」。

其實這是完全錯誤了。日本軍人的野心，不是最近幾年才有的，但爲什麼只在最近幾年才在中國大大發展呢？這就不是「野心」兩個字可以說明的了。漢奸賣國，又何嘗只是「良心」一氣節」的問題呢？如果單靠激發良心，就可以使賣國的人心同意轉，那麼，北平、上海及各地學生們的流血的愛國運動，也應該使他們覺悟了。

民族解放運動的鏡子不應該只照見「人心」，不應該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一些有權勢的人們的心意上。不然，一定是失敗的。南京續範亭自殺的事件，不是一個明證嗎？他想靠割腹自殺來激發一般軍人的自覺，結果是只殺了自己，他所希望的人們並沒有起來抵抗外侮。

上海各校進京請願的運動中，有許多同學也是上了這種良心主義的當了。他們對於請願抱着太大的希望，想靠請願把他們所希望的人「請」出來救國。結果不但請不出來，自己反而吃了很多的苦。怎樣辦呢？最大的希望也受了打擊了，於是許多同學就灰心起來，說：「中國沒有辦法，我今後甯可一生消磨在舞場裏！」

這些灰心的同學，是覺得找不到路了。但並不是中國真的沒有路，只是因爲他們拿錯了鏡子。在這鏡子裏，他們所看見的只是「人心」，他們看不見中國社會生活的真實情形。如果他拿

到了一面好的鏡子，能夠切實的認識社會，他們就知道不應該灰心，更不應該在舞場裏去消磨自己的生命，尤其不應該像續範亭樣的只殺自己不殺敵人。」

所謂「人心」，在哲學上也稱爲「人的主觀」，只看重人的心，看輕了現實的社會，也稱做主觀主義。從事民族解放的戰士們，如果你們的鏡子是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就得要把它掉換一下。因爲它不是民族解放運動的鏡子。

民族解放運動的鏡子，是要認真的反映半殖民地社會的一切。要看得清楚這社會的經濟結構，看清楚這社會的一切變化法則，看清楚在這社會的經濟結構裏，那些人是做什麼事情，那些人是真正可以爲民族抗爭，那些人又有所爲漢奸的可能，他們做漢奸，是爲了什麼利益總之，這鏡子裏所反映的，是社會的一切客觀法則，不是主觀的人心。

社會的一切變化法則，在社會科學裏就有詳細的研究，所以，要替民族解放找一面好鏡子，不能不學習社會科學，我們所談的生活的哲學，也和一切社會科學分不開。

關於社會科學的理論，從前的人也會遺留給我們很多的遺產，我們可以拿來學習，因此我們已經有現成的東西可以繼承了。但要注意的，是我們學習前人的理論，目的是要幫助我們了

解現在的社會，不是要把它當死板板的模型，把什麼都嵌進去。

我們用前人的理論，來幫助我們了解現在的社會，並且可以把現在所看見的新的東西，加進前人的理論裏去，使它變得更豐富。民族解放運動的鏡子，是要很活潑的反映我們當前的東西。

不能夠活潑的反映現在的東西，單把前人的理論死板板的嵌到一切上去，這就叫做公式主義。

主觀主義只看見「人心」，公式主義只看見前人的理論，都不能替我們照見實實在在的社會情形，都是一種觀念論的思想，都是要不得的。

但是，還有一種鏡子，它不反映人心，也並不是死的公式，它也反映前面的社會生活反映客觀的現實情形，但它把這些東西反映得太大了。例如有人說，敵人有充足的新式武器來進攻我們，那樣的武器全然不是中國人所能抵抗的東西。中國沒有這種武器，就只好屈服了。這就是所謂的「唯器武論」。

有人說，「半殖民地的中國，是不能獨立的。」他們把這一點誇大了，認為中國不能作獨

立的民族戰爭。要抵抗敵人嗎？一定要得到英國或美國的幫助，使力量相稱才行。他們以為中國幾十年來能夠不亡，也就是因為各帝國主義的勢力均敵的緣故。

這種思想，叫做「均衡論」。依照這種思想，那麼，中國能夠不亡給日本，是全靠英美兩國的幫助了，現在他們兩國都抱着袖手旁觀的態度，中國失去了幫助，就只好屈服了。要想解放自己的民族，也只好坐着等他們高興的時候來幫助了。

這種思想，又是把客觀的事情誇大得太利害，忘記了中國民族自己的力量。一切事情，都只想坐着等待周圍的好機會，不肯馬上努力起來做。這叫做客觀主義。客觀主義是一種機械論。

客觀主義的錯誤，在阿比西尼亞的例子裏，就可以看出來了。從前人們都說，阿比西尼亞敢於和意大利抗爭，是有英國撐腰的緣故。但現在英國已經明明不肯替它撐了，不但不肯在國聯裏努力主張制裁意大利，並且還聲明不願使阿勝產敗，然而阿比西尼亞仍然敢於抗爭，仍然能獲勝。

民族的抗爭如果起來了，力量是最偉大的。我們不能把希望放在少數有權勢者的良心上，我們要切實研究社會的各方面，在廣大的民衆中去找真正的抗爭的隊伍，因此要反對主觀主

義。我們對於民族的武裝抗爭的力畫，要充分的信任，要看清楚如果堅強而統一的民族戰線結成了，一定能夠衝破一切的壓迫和侵略，因此要反對客觀主義或機械論的思想。

一面反對主觀主義或觀念論，一面反對客觀主義或機械論，這樣才可以磨練出一面正確精緻的民族解放的鏡子。（艾思奇）

新的文學研究

在目前，中華民族的國恥，已經打破古今中外歷史的一切記錄，（王造時語）而敵人正在進行着不費一顆子彈的大陰謀，來全吞中國。死有餘辜的文人、文江，早叫我們退到堪察加去。可是，除了可以賣掉祖考的骸骨，妻女的貞羞的少數漢奸，何處是我們真正的中國人的退路？堪察加敵人的侵略野心，不到全部滅亡我中國，決不會死塌。我們的前途，要不是抗爭，就祇有死亡和災難的東洋大海。

在這種非常時期，我們的文學研究，從最初一課到「最後一課」，都應當爲了救中國。「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中華民族——就是我們，我們母親大地的兒女們。」我們不能讓人家強暴或陰謀的滅亡祖國，我們更不能甘心被人家驅去做「前鋒」去替他們侵略和平主義的蘇聯，做那不名譽的替死鬼。

爲了要這樣，所有的文學大師和學徒，都應當把自己的「每一點鐘，每一滴血」獻給我民

族。注意並參加一切形式的救亡運動，鼓勵並鼓動已發未發的民族革命的戰爭。我們更要用革命的民族主義，教育大眾，改造落後的民衆的思想。

中華民族解放的事業，應當成爲文學大師和學徒的個人事業，我們和要垂危的民族一塊兒生死，和受侵略的大衆一道喜怒哀。祇有這樣，才能夠保證我們目前的文學的成功。因爲祇有這樣，才能夠汲取現實中的「豐富的印像」，搜集並貫徹現實中的活生生的材料，看清民族救亡運動的發展方向，高揚自己的革命的民族精神，而且，要有這一切滲進了創作活動的時候，才能夠使我們的文學有深度的真實性和飽滿的民族解放的情熱，然後可以有方的影響讀者。

和目前民族解放運動失掉「有機的關聯」的文學者，絕對不能夠產生新鮮有力的作品。他們的最大努力，至多造出些溫室裏蒼白的幽花，以博得公子哥兒，小姐太太們的微笑和冷淚，不是爲了民族解放的戰鬥者的營養品。

爲了替我們戰鬥的文學內容，獲得和牠相照應的明快有力的文學形式，我們要批判的學習過去和現在的藝術家們的文學經驗，可是，我們要認清楚，就是他們的成功，也決不是單靠技巧，他們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對於現實的深刻觀察和理解。從來沒有單單焦燥於技巧的文

學者，能夠成就偉大的作品的。

爲了更明確的了解現實的現象和牠的歷史的動態，我們應當了解現代世界和中國的形勢。我們更應當達到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文化水準，應當學習目前人類智慧的最大成就——

——革命的世界觀。但是，我們也不是說，一定要先懂得了世界觀，然後才能夠提筆。

爲着學習和體驗，團體的研究比個人孤立的探求，更要有効。我們應當立即組織或參加文學團體。文學者大都是愛保持自己的個性的，可是一個性並不會因爲融化在集團生活中而趨於消滅。相反地，祇有在集團生活中，個性才能有牠的最高的表現。」（巴比塞語）

創作的實踐比理論的探求更要緊。而且，文學的才能，應當隨伴着創作實踐的大胆。我們要不斷的把創作的成果，獻給大眾；來發動他們的戰鬥氣分，改良他們的思想；我們要「改革當地報紙的文藝欄」，要建立農村文藝，工廠小報，街頭壁報，學校壁報等，發行文學小冊子。用自己團體的旺盛的創作力來匡扶各地微弱的文壇。能夠這樣，一定不祇是自己的成功，也是真正的有益於危亡的民族解放任務。

但無論是組織或個人的文學活動，我們在目前，都有一個中心，那就是怎樣更直接而露骨

的肩起國防的任務。在這裏，我們要談到「國防文學」。

「國防文學」原是一九三〇年，蘇聯組成的「赤衛海陸軍文學同盟」（簡稱「洛卡夫」）所倡導的一種文學，在他們自己國內的所建設的花園樣的新世界逐漸成功，而帝國主義的豬鼻子不斷想突進這花園的時候，「國防文學」要發揮巨大的防衛作用。「國防文學」在蘇聯的有名的收穫，是普里白伊的「對馬」和鐵霍夫的「戰爭」還有許多的長篇短篇和詩。

「洛卡夫」有四個關係雜誌。「洛卡夫」的作家參加軍隊的生活。組織講習會，研究會，來探討創作方面的防禦的課題。他們的批評家更指出：爲了軍隊的建設，軍隊技術的獲得，軍隊的教育等等的鬥爭，和赤衛軍一切英雄的描寫，都應當是「國防文學」的主題。而世界戰爭的經驗，對勞動者農民努力建設的號召，對世界勤勞大衆防衛蘇聯的召號等，都應當是「國防文學」的中心任務。而「國防文學」對於汎繫主義的戰爭文學和有產者的麻醉人欺騙人的「和平主義」的文學，都要給以無情的打擊。

「國防文學」在中國被提起，有着新的重大的意義和任務。中國「門戶開放」以後，疆土日蹙，而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的國防，一天天被破壞。到最近四年，我們更失掉了半個中國，失掉了

萬里長城，我們要收復失地，更要在民衆的意識領域普及的建民族防禦的工事。

近百年來，尤其是最近四年間，我們產生了無數可泣可歌的民族戰爭的活生生的史料，失敗的如黃海之戰，勝利了，而終於被漢奸賣了的，如諒山之戰，一·二八戰爭，還有東北義勇軍的長久的血戰，這些事件中，產生了多少犧牲者和民族的英雄！描寫這一切，來保存戰鬥的經驗，勗勉後死者，也是我們的任務。

目前的中國一方面有英勇的英雄男女，另一方面也有陰險無恥，醜態百出的漢奸和他們的賣國事件，我們要曝露這一切，把牠們和民族英雄的敘事詩對置，給國民明劃出抗戰和投降的「兩條路」，並用藝術的形象，告訴大家！「今日之事，非抗戰即投降，絕無餘地，容我迴旋。」（馬相伯名言）

敵人不會放鬆我們的大地，而抗戰的男女，也不會放鬆敵人。民族戰爭要更擴大，這圖謀解放的神聖戰爭要使得一切不願意做亡國奴的男女參加，「國防文學」要鼓動並擴大民族戰爭，激起落後的民衆的愛國情緒，提起他們的最後勝利的信念，打擊一切散播不能抗敵的麻醉劑的亡國妖言。

在這些任務之下，「國防文學」可以找到最繁多的題材和主題。在目前的中國，「國防文學」的題材和主題，「觸目皆是。」

「國防文學」的意識的提出，雖是在最近，可是牠的實踐，早曾有過的。一二八戰爭，產生了茅盾的「右第二章」，李輝英、張天翼等人的小說，白薇、適夷、李健吾諸人的詩。東北義勇軍的長長的抗戰，產生了「八月的鄉村」，「生死場」。南中國的外侮，產生了艾蕪的「南國之夜」裏的短篇。對這些小說，我們都要有慎重的評價，研究牠們的長處和短處，汲取裏面的創作經驗。

不消說，對於國外的作品，首先要採取蘇聯的花蜜。不但是行將出現的鐵霍洛夫的「戰爭」等作品，我們要研究，就是「鐵流」和「潰滅」等作品，我們也得把牠們當作建立「國防文學」的藝術的模範，因為，中國今日，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也正是「鐵流」和「潰滅」的時代。

「國防文學」是要鼓勵民族解放戰爭，却和「民族主義」的提倡喝人血吃人肉的「黃禍」主義，絕然不同。「國防文學」是主戰防衛自己，却決不主張反守為攻的侵略人家。牠起要以弱小民族解放的戰爭反對一切侵略戰爭。因此牠和非戰文學決沒有矛盾。而巴比塞的同情弱小民族解放的反戰文學，正是「國防文學」強大的一翼。牠的「火線下」，（可惜還沒有中

譯)和「光明」(可惜譯得太不好)和其他短篇(如「外國人」有中譯)也是「國防文學」的優美的旁支。而雷恩的「戰爭」也是值得閱讀的作品。

真正能夠同情中國解放的國家，除了蘇聯，首先是各弱小民族的人民，他們的聲音使我們感到親切，他們的反抗，更能在精神上給我們許多興奮和助力，因此，弱小民族文學也是我們的友伴，茅盾譯的「桃園」「雪人」和其他散在的弱小民族的作品。「譯文」和「世界知識」所載的短篇，黑人休士的詩和小說，猶太人賓斯奇的「在黑暗中」和其他戲曲，我們都可以特別在這裏提出。更像激動匈牙利民族反抗精神的斐特非的詩(中譯有「勇敢的約翰」等)描寫大戰中比利時民族自衛的「比利時的悲哀」(俄安德列夫作)等，也都值得誦讀。

「國防文學」還是一塊新墾地，還等待大批文學園丁的勞動。牠的理論，也等待更深入的檢討。如「國防文學」的階層性問題，牠和標語口號的區別，牠和現實主義，和進步的浪漫主義的關係等問題，都還需要精確的闡明。這些問題和創作實踐中所要引起的新的問題，都可以作為非常時期的文學研究的課目。(立波)

新的語文

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爲文明國者，文字已爲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却大概只佔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麼？

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着中國文化，代表着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並不對。這樣的少數，並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喫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

我們倒應該以大多數爲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例。

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糊的不安的，清末的辦白話報，四五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爲此。但還只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復興文言文也爲此。他明知道現在的機關鎗是利器，却因歷來偷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徵幸，就只好夢想大刀隊成事了。

大刀隊的失敗已經顯然，只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但文言文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牠還有壽命。

和提創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衆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

反對，當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規，動他不得。格理萊倡地動說，達爾文說進化論，搖動了宗教道德的基礎，被攻擊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飛發見了血液在人身中環流，這和一切社會制度有什麼關係呢，却也被攻擊了一世。然而結果怎樣？結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環流！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却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麼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

礙傳佈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並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於中國大眾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麼久。

至於拉丁化的較詳的意見，我是大體和「自由談」連載的華圈作「門外文談」相近的。這裏不多說，我也同意於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衆語的前途的危難；但以爲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魯迅）

新的大眾語文

胡愈之先生所下之大眾語之解釋很好，我想提出兩個字的修正，大眾語是代表大眾前進意識的話語。大眾文是代表前進意識的文字。

大眾語與大眾文必須合一：在程度上合一，在需要上合一，在意識上合一。

大眾語文適合大眾的程度，需要和意識時，在大眾本身所起的反應是高興。所以大眾語文是大眾高興說，高興聽，高興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這高興的境界便是藝術的境界。

一個月前，我從一家電影公司裏，借得一捲電影片子，送到鄉下去公映。我們想在公映前幾天，教農人讀說明書。這說明書雖是用白話文寫的，但是鄉下，小先生不會教，農人也讀不來。我只好重新寫一篇說明書來教大家。這工作是不容易。我一連換了幾次稿才勉強寫成。據小先生說：我最後寫成的說明書，還嫌太深。但比了電影公司的原稿是淺了十倍也不止。這個例子說明現在通行的白話文只是把文言文的「之乎者也」換了「的嗎啊呀」夾了一些外國文法和一

些少爺小姐新士大夫的意識造成的。這種白話文，寫起來，大眾看不懂，讀起來，大眾聽不懂。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文學運動裏是有一個大黑幕：白話文不與大眾語合一。

大眾是過着符號貧窮的生活。但是他們需要符號是鐵打的事實。老太婆用繩結記帳，農夫刻樹皮抒情。野孩子寫王八罵人。民衆學校學生用注音字母代替他所不會寫的字。這種需要更可以用一個故事來說明。從前有一位婦人寄了一封信給她的丈夫，丈夫打開一看，紙上畫的是：

「一個單圈，一個雙圈，一個圓圈，一個破圈，一連許多圈。」

丈夫看不懂。一位聰明人把他夫人所畫的圈中祕密指點他說：

「欲寄相思無從寄，畫幾個圈兒替。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圓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說不盡的心思，把一路的圈兒圈到底。」

這些例子指示出大眾的生活中是有一個大缺憾。大眾沒有取得夠用的思想的符號，情感的符號，行動的符號。總而言之，沒有取得充分的生活的符號。大眾的符號是和大餅一樣的貧乏，剝削大眾的大餅的人是同時獨佔了大眾生活所需要的符號。

照這樣看來，大衆語文運動是有兩條大路可走：

(一) 智識分子參加大衆生活，在大衆語演進的基礎上努力寫作語文合一的大衆文。

(二) 將生活符號普及於大衆，使大衆自己創造出語文合一的大衆文。

智識分子要想寫大衆文必須先學大衆語，他必須拜大衆做老師。不夠！他必須進鑽大衆的生活裏去與大衆共生活其甘苦。他必須是大衆隊伍裏的一位戰士。等他自己的生活在與大衆的生活打成一片，然後他纔能領略大衆生活之酸甜苦辣；然後他寫大衆便是寫自己，寫自己便是寫大衆。如果他不屑拜大衆做老師，不肯在大衆的隊伍裏做一個小兵，他決寫不出好的大衆文。拿什麼符號來向大衆普及漢字呢？注音字母呢？拼音文呢？我的建議是三管齊下：漢字要教；注音字母要教；用注音字母拼成大衆文更要教。

漢字是士大夫的法寶，大衆必須認得這法寶，纔能看破士大夫的神祕。能教漢字的人有八千萬。漢字的本身雖難學，但是能教這符號的人如此之多，是推廣運動的一個大便利。我以為漢字只要認得就夠了。幫助大衆認識漢字的一個方法，便是注音字母，大衆學會注音字母便可以自動去用字典，認生字，追求新知識。但是我們不能停頓在這裏，我們必須立刻教導大衆運用注

音字母去記錄自記的思想，情感，行動。我們必須立刻教導大衆運用字母去寫大衆文。我們教漢字的目的在使大衆認識那被漢字包圍的中國。我們教字母的目的，小而言之在幫助多識漢字，大而言之在用秋蟬脫殼之方法創造拼音字來代替漢字，以產生拼音的大衆文。

我們做普及文字符號的工作時，應當連帶提倡俗寫簡筆漢字，印寫字體合一，字母正草合一，以節省學習之時間精力。

中小學校及民衆學校之學生都該做起小先生來，每人至少教兩個不識字的人。這樣一來，我們便有一千多萬有組織的分子來負起普及符號之重任。再加上八千萬識字民衆之進一步之培養及總動員，數年之間，必可使大衆取得他們生活所必需的符號。

大衆得到符號便能將自己的生活，深刻的描寫出來。大衆的隊伍裏自有文藝的天才。他們自然而然的會產生出第一流的大衆文。

我們把文字符號傳給大衆的時候，要做一番「濾清」的工作。我們要把時代落伍的意識濾掉，要把麻醉的毒質濾掉，要把古典濾掉，要把洋文法濾掉。我們獻給大衆的符號是要和沒有微生物的清水一樣。大衆得了這種清水的符號便能自由的寫出真正的大衆文。

我想指出大衆語必以一種活的語言爲基礎。中國四分之三的人能懂的活的語言便是滬語。北平話又好聽，人就願意學。因此，北平話實有成爲大衆語之主要成分之資格。但大衆語應當膽量大。凡與大衆前進生活有親切關係之各地土語，甚至於外國話都可以儘量吸收。我們也不必懸一抽象的主觀的標準，勉強加以去取。讓大衆自己去選擇好了。不合前進大衆的口味的必歸天然的淘汰，用不着我們過慮。

抱有前進意識之大衆要領導意識落後之大衆，把自己的生活提高起來；把程度提高，把需要，把意識提高。這樣，大衆語便能繼續不斷的提高，大衆文也就跟着牠繼續不斷的提高了。

(陶行知)

新的通俗文

——如何通俗化——

我們常常接到讀者的來信，或朋友們的批評，說讀書生活裏的文章，還寫得不好懂，不夠通俗。他們說：

「沒有進過學校的人，雖然認識幾個字，還不能讀。」

「剛讀完千字課，或讀完小學的人還不能讀。」

「甚至進過中學，像我的太太那樣的人，也還不能讀。」

完了，有這樣多個「不能讀」，「不能讀」，那能讀的人自然還是幾個文化程度較高的人了。不用說，這與我們原來打算要做到的還差得太遠！

二

「不要怕！我們更要努力做得通俗。」我們編輯部同人互相鼓勵說。

我們向作家要求說：

「請你們要再寫得好懂些。你們什麼地方還寫得太歐化，不好懂，請你們再改改。」他們也着實出賣氣力在求「通俗」，他們說：「我寫這篇文章比替別的雜誌寫稿子多花費一倍功夫，可是通俗仍通俗不來，通俗到底有什麼標準呢？」

我們沒有將標準給他們，更不能逼迫他們，不然有幾欄就會沒有法子印出東西來。我們只有在自己担任的稿子上下工夫，結果仍然是聽得到處「不能讀」的聲音。

三

這並不使我們灰心。我們預先就想得到的。這更不是通俗化碰了壁，這不過是做得不夠。我們平下心來，研究怎樣可以減少一些「不能讀」的聲音，在暫時並不安想這種聲音完

全消滅。

我們發覺，我們這一年的努力，所收的效果很小，是因為我們太孤獨了，從事通俗寫作的人還不多，社會對於它還冷視，對於我們的習作沒有批評，我們自己方面也太散漫，各人弄各人的，沒有聚在一起討論過，批評過，這種個人主義的幹法，哪裏會有成功！我們看出今後補救的方法，首先要趕快把同意通俗化的作家找在一起來，認真的作有計劃的討論，不客氣的批評，這是第一點。

第二，我們發覺寫東西的人，還需要與讀東西的人合作。我們要不使人讀不懂，先要明白他們讀不懂的根源在哪裏？不懂的是一些什麼地方？然後我們來怎樣磨練自己手裏這枝筆，用它去說服他們。

編者，作者，讀者，要實行合作。

四

本刊就預備照這樣幹起來。一方面盡量接受許多讀者來信的意見，一方面破題兒第一次

請了替本刊寫文章的九位朋友，聚會過一次，這是說我們有困難大家來担，我們再不唱獨腳戲兒。在這聚會中，我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說明了以上的意見。誰知不談，大家沒有話說，一談各人肚子裏藏着的意見，都拿出來了。真正是個個談風皆健，說我們爲什麼不早點聚攏來討論它一個三清四白呢！誰不想寫得通俗一點呀！正是「英雄所見相同」，第一次一談就談出許多大道理來。

五

通俗化應不應該來做，已經共認不成問題了。生活逼起大家要求生活的知識，知識來源之一，是讀物。現在凡在生活中掙扎的到處都發現要求知識，要求自己起來說話。現在印出的書，刊物，卻不能滿足人望，而中國四方塊字這種語言工具又不能適合大衆自己發表意見。這種社會要求，就變爲語言改革運動（拉丁化運動）現在再來個一通俗化運動是適合客觀的需要，有何足怪呢！

大家又指出：通俗化不是離開語言文字的改革運動（如拉丁化運動）而孤立的行動，它與整個語言文字總的運動是連繫的，並且是這運動的一部分，通俗化不僅不反對文字的變革，它反是造成這改革更順利的條件。

六

要討論的中心是這「化」的問題，如何通俗化呢？

先問能不能通俗？

自然，這答復是肯定的。但同時也承認通俗有一定的限度。我們是在這限度內儘可能的做。這限度是什麼呢？一是這四方塊字寫成的東西的普遍性有限，二是用口頭語講解高深和抽象的理論的通俗性也有限。

在前者我們的目標，似乎只能做到使寫的東西，儘可能的合於口頭語。

在後者我們的目標似乎只能做到簡明化、具象化、趣味化，這幾方面。

通俗化決不是不可能。

根據以上的目標，我們認為通俗化並不是庸俗化，它決不反對高深學理的研究，把高深的理論化為庸俗，遷就低級恰恰相反，它是在一面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一面代表着正確立場使高深學理普遍化，在形式方面盡可能的去掉經院氣，做到使大眾易於接近。

簡明化不是公式化，定義化。

具象化不能妨害科學的抽象的法則的理解，而且是文學與科學的結合，在說明抽象法則時，用具象的方式去表達。

趣味化，不是迎合低級趣味，而是注意用藝術的手腕，生活的情調去調和枯燥艱澀的知識。

七

通俗化的道理，說到這裏，就暫且帶住罷！

大家都承認，道理的懂得倒不是一件難事，怎樣把這些原理原則，翻成事實，卻不很容易。路標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到底還是在走路呵。

所以寫作技術倒成了通俗化最主要的內容了。

現在且將已經有了的經驗略爲談談吧！

八

一篇所謂通俗文字，雖然在文字形式上，篇幅短小，節段、明白簡短，造句短而合口頭語，一切固然都是重要的條件，但有了這些條件也不見得即是通俗易解。

這裏自然主要的是內容，內容方面的接受性和題材的處理都是很重要的問題。

成人補習教育比兒童易於施教，就是成年人生活經驗高過兒童，理解力甚過兒童。同一內容在成年人間也因生活不同生出理解力的差異。工人不關心土地問題，農民不關心罷工，怠工，工會組織等事。所以在這裏就生出一問題對於某些人是易於了解，某些人變爲漠不相關了。上面說的我們那位朋友的夫人，是中學生，讀不懂讀書生活大概是因爲她的生活環境不同，它對她失掉吸引力。這一點也自然成爲普遍性的一種限制。

不過，遇了這種情形，我們先要明瞭接受性的矛盾的性質是怎樣的。這種矛盾是上面指出的工農間的，那大概是相對的，可以從中國當前工農生活抗爭的一致性去連繫起來，消滅各自

生活圈內的偏見，是可能的。如果這矛盾發生於高貴的人們與低賤的人們間，那是絕對性的矛盾，那種偏見不能克服，我們不必去白費氣力。

消滅這種相對性矛盾，就是擴大讀者的普遍性，是構成通俗化內容之二要素。

九

處理一件題材，幾乎與文藝創作相似，是一篇通俗文成功失敗的關鍵。

要打破經院氣，學術的擺場，課本講義式排編，這里要完全把理論融化過，在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這是一種創作過程。雖然，在目前只有少數人在習作，沒有很好的成績可說，但也約可指出數點。

譬如，用文學的具象表現法，代替科學的敘述法。抽象理論與生活實踐融合作統一的對照，儘可能放棄學術專門用語，注意生活上健康的幽默，已在一些習作中，博得讀者欣然接受，現出一些創作方法上新的氣象來了。



同時，在今日的習作中，也發現文學的表現法，有時容易紊亂主題，使讀者不明一篇文章的主體何在，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但是並不是說具象表現法不能說明抽象，而是過於偏重表現，而忘了科學的職責。有人對於今日科學理論用文學的手段來解說，認為既不是文學，也不是科學，罵為兩不像，因此引起習作的人發生懷疑，這是應該首先克服的。

是的，這種新作風，也許真要被入看作兩不像吧！其實說這話的人不是對於文學存着所謂純文學的觀點，就是對於科學扮起莊嚴的臉孔，以為不是專家就不要出來獻醜，因此，恐怕別人侵犯他們神聖的領域。通俗科學文體既是主張理論與文藝融合，自然老實可以承認，我們反對「閒人到此止步」的純文學和純粹科學的招牌，我們並不認為文學高過科學，或科學高過文學，在這裏我們不過不要忘了談科學是自己主要任務，不要因為表現的方法紊亂了主旨，使抽象法則的了解反不明白。

同時對於趣味與所謂健康的幽默，在今日的習作中已收有相當的成功。因着明快，每每使

讀者忘記自己在讀艱深的理論，這雖是新作風的一個要素，但要謹防的是內容空虛，專求語句輕鬆，走入低級趣味的泥坑中去。

十一

至於用語方面呢？現在在習作中並無對內容方面同樣的成績。就今日新的習作說，都還沒有做到口頭語。不過，已感覺用方言寫，就某一當地人說，是比較容易了解的，因為方言對於當地人的親切性，好像在異鄉聽了鄉音一樣，分外動聽。不過我們覺得在某一地方人這樣去做當然可以，就一般說，我們主張還是應該以普通口頭語為標準。「寫」儘可能做到「說」相近，不要十分謹嚴的顧到文章的格調，使「說」變成為不容易了解的「文」了。

在文字改革未實現前，要做到說話一樣的寫，我們應該怎樣做呢？我以為我們暫時不妨大家相約：

1 話的構造，力避外國語文法死的應用，沒有變成中國人口頭上應用的外來語彙，不得入文。（這裏，我們得聲明，翻譯世界名著和寫高深學術文，我們並不反對外國語文法精密

的運用。

- 2 不用文言，古典，洋典，甚至冷典。
- 3 少用新術語（已在口頭上流傳的不在內）。
- 4 用在口頭上流傳而尚未應用在文章中的一切行話。
- 5 不拘于文章的作法，創造大眾語文體。

十二

已有的經驗還是淺薄的。但淺薄是高深的階梯，我們並不希望停止在以上的認識及技術的限度。

如何充實與展開呢？

這是大家的事，編者，作者，讀者要大家合作。

好在現在已有更實踐的穴，在那裏分解，審閱今日已有的習作了。我們盼望他們趕快有一個報告出來，提出具體的討論。

我們希望所有同情通俗化的作者，讀者，大家都發表一些意見，尤其對於讀書生活，請下最嚴肅的批判。我們要求上進，要求「不能讀」「不能讀」的，聲音減退。但我們知道，這不是我們幾個人所能做得成功的。

我們願意接受一切的指教。（柳湜）

新的職業觀

在我個人所遇到的青年，或從間接得到青年們所表示對於職業的意見，我認爲他們對於職業，都不免具有一些錯誤的見解。

第一，他們在沒有投身職業之前，也知道現在社會的不景氣，在這世界經濟恐慌的時期內，各種事業都實行減縮，裁員減薪，很普遍地流行着，所以深深地感到找職業的困難。同時因爲在現行社會制度之下，一切物質的引誘，又刺激着他們的腦筋，使他們對於金錢，發生一種強烈的要求。因此沒有投身職業的青年們，已經很深感到職業的煩悶，既怕找不到職業，又怕找到的職業不能適應自身的欲望。

第二，已經投身職業的青年們，一方面時時感到很容易碰着失業的危險，一方面又感到對於現有職業不滿足，其原因大部份屬於經濟方面。因爲現在正是一個「人窮世富」的時候，就是職業的人，因爲經濟負擔的繁重，上焉者到手輒盡，稍次者便不免負債，以致時時感到經濟

的壓迫而又時時希圖多得金錢的報酬。

總括一句話：青年們對於職業所懷抱的種種煩悶，無非是金錢的勢力在暗中作祟！要解決這煩悶必須先認識清楚個人爲什麼必須從事職業的根本原因。

原來每一個人都不能獨立生活的，每一個人所需要的種種生活資料，完全靠社會大眾用勞動力量所換來的生產品。個人既享受社會大眾勞動所得的結果，便不能不用自己的勞動力量爲社會大眾服務，這便是個人必須從事職業的根本理由。

但在新社會組織沒有根本合理化以前，要完全實現「職業的新生」是不大可能的。因爲「職業的新生」必須以機會平等爲基礎，使大眾各就個人興趣所在，各專一業，爲社會大眾服務。而在現在這個過渡時期，機會是極不平等的，只有盡可能的範圍，盡量選擇最有益於社會大眾的職業，或盡力避免有害於社會大眾的職業，並共同促進社會組織的合理化，以求「職業的新生」早日實現。而在未實現以前，青年們必須認識現行社會制度的缺點，以改正自身對於職業的態度。

認清楚了人們必須從事職業的根本原因，看明白了個人職業和大眾的密切關係，便可以

知道職業的意義，不過是一種社會的分工，一個人的勞動力量有限，不能從事許多種類的生產事業，以供給自身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因此便不能不分工。整個社會好像一部極複雜的機器，機器由各種各樣形式不同大小不同的機件組織而成，而社會却由各種職業不同的個人組織而成，各有各的功用。不過社會的組織，更形複雜，不但包含具有各種功用的個人，而且也有反大眾利益的不正當職業參雜在內，所以很容易使人誤入歧途。但在真理上看起來，凡有益於社會大眾的職業，都是必需的，青年們從事職業，不必以地位高低報酬多寡為選擇職業的標準，而應該以職業效能是否有益於社會大眾為取捨的標準。當然，為了機會不巧，未必人人能找到有益於大眾的職業，但如果認識清楚了在現狀之下，除了少數特殊人羣外，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是必需找個職業以維持生活，也就沒有煩悶。

青年們對於職業的煩悶，因為都沒有認識清楚的緣故。倘使青年們對於上面所說的話，真能十分明瞭而又能切實做去，不但可以解除對於職業的煩悶，而在現在這個過渡時期，「職業的新生」也可以部份的實現了。（畢雲程）

新的文學生活

如果我們從前當真有過這麼一個倉頡，那末倉頡就是第一個過文字生活的人了。因為他既然是黃帝的「史」，總不見是自備資斧或枵腹從公的吧。

從此以後，這門生活就不住的翻新花樣：有的替人做文字的傭工，也同別的傭工一樣靠工資過生活，上至內庭供奉的文學侍從，下至同門房跟班，一律看待的私人書記，都屬這一類；有的簡直把文字作商品，跟顧客作現錢交易，上至賣碑諛墓，下至掛招牌，訂潤格，都屬這一類。總之，無論什麼方式的文字生活，都是「自古有之」，不見得「於今爲烈」。

但是這門生活是「向就叫人瞧不起的。從前人說，「爲文人，便無足觀，就無非因其「人」靠「文」爲生的緣故。現在則只消提出「文字商品化」五個字，也就立刻判定了這門生活的罪狀。

不過，我們仔細查一查自來文人的生活，就可曉得這樣的判決未必一定是公平。因為說「

文字」和「生活」兩件東西決不應該連在一起，那就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叫文人簡直不要生活，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又一是要文人做文字工作時別謀生活。

是的，我們查一查從前文人的詩文集，不但沒有稿費可拿，版稅可抽，並且還得自己拿出錢來刻。但是他們是怎樣寫成這些詩文的呢？這裏邊就有個分等了。

在那種「資本」雄厚的文人，他從蒙童館慢慢爬上翰林院，先得墊一筆大大的本錢。到了翰林院待詔應制的時候，雖然也不論字算稿費，却已有俸銀可以養活，及至散館放外缺，這才不但是從前的老本可以撈回，並且可以終身不愁衣食。於是他就閒情別致來做他的「不朽之業」了。

至若資本不厚，或者官運不亨，那末下焉者就不得不做馬二先生，自將鋪蓋挑進文翰樓，選選墨卷，偷閒到湖上看女人，買幾個制錢的處片嚼嚼，到底飽不了肚皮。上焉者就算做到昌黎先生那麼的文名，也還免不得賣碑諛墓，然而賣碑諛墓就要算是文人的第一大恥辱了，而其實跟前一種文人比較，也不過生意規模的大小不同而已；究竟誰是清高，誰是卑鄙，那也沒有什麼尺度好做標準。

到了現代，情形當然又兩樣：「文字」和「生活」這兩個詞兒的連結更不能不密切。故若社會上暫時還需要文字這東西，而文人們又不願受人象養的話，那末我們似乎不便藉口「文字商品化」的惡證根本否定文字的生活問題；只在你所出的是何等商品，你的商品是什麼質地，你的商品能有幾何社會價值。

清代詩人趙翼的後園居詩有一首道：有客忽叩門，來送潤筆需，乞我做墓誌，要我工爲諛；言政必翼黃，言學必程朱，吾聊以爲戲，如其意所須，補綴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諸其素行，十鈞無一銖。此文倘傳後，孰能辨賢愚？或且引爲據，竟入史冊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屬誣。

又一道：

頻年苦貧乏，今歲尤艱難。內子前致辭：「明日無朝餐。」一笑謝之去：「勿得來相干，吾方吟小詩，一字尙未安，待吾詩成後，料理盡鹽酸，君見長安道，豈有餓死官？」

這兩首詩恰好可代表舊時文人的兩種生活態度，前一種可說是「爲生活而文字」，只要「潤筆需」拿得到手，就不妨「聊以爲戲」的。後一種則可說是「爲文字而文字」，如果「一字尙未安」，那就「明日無朝餐」也是不管的，我們看目前的情形，這兩種態度大概都有人承

襲前二種「聊以爲戲」的態度。我們當然認爲要不得，就是後三種態度。雖然已比較的難得，但仍不能認爲滿意，一來，長安道上雖可沒有一「餓死鬼」文場之中却難免要有餓死鬼，所以這不管「明日無朝餐」的精神固然可取，而必要等到長安道上奔走之餘再來做文字，那怕就不見得有好文字做出來。二來，我們也要問，這一「未安」的「一字」安了之後，到底有什麼好處？說你這一字安了之後，也不過落得你自己的心境一時安適，那末你也大概犯不着害得尊夫，本明天沒有早飯吃吧。所以，這自古有之的文字生活裏邊果真有「新生」可尋的話，我以爲應該從這兩種態度以外去尋它。（傅東華）

新的人生觀

——新的世界觀的一部分

十多年前，國內曾鬧過一場很熱烈的筆墨官司，中心的問題是「科學與人生觀」，擁護科學和擁護玄學的分成兩大陣壘，混戰了許久。這場筆戰在現在看來雖是很幼稚，但是它無疑的是當時兩大社會思想系統彼此鬥爭的具體反映。可惜的是，在當時雖有反唯心論的唯物論存在，而這種唯物論却是機械的，我們不曾看見站在正確的方法論上的新唯物論出來解決問題。時候過了許久，關於人生觀這問題似乎不大能引人注意了，但是人們需要生活需要認識世界和自己這件事實依然沒有改變，不只如此，眼前的世界和十多年前是很不相同了，在生活的複雜的程度上，在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上，乃至在學術思想的發展上，我們已進到了一個全新的異常的階段，因為這樣，關於人生觀這問題就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有人說，人生觀這問題是根本無法作客觀的研究的，因為每個人的生活環境與生活方式不同，各人自然可以有種種不同的人生觀，譬如有的人以打麻雀牌抽大烟爲終身的生活方式，他所有的人生觀當然是瞄準着「紅中」「白板」「發財」與烟槍；有的人歡喜多討姨太太，玩骨董，唸金剛經，他所有的人生觀當然就跳不出女人、古董與佛經的圈子。所以照這樣子推論下去，人生觀完全是屬於主觀的，不能研究，也不必研究。

這樣的解說也有幾分道理，爲的是我們不能否認人生觀是多少受着各人私生活的規定的；但是假如我們不從個個孤立的個人去觀察，而將許多人劃分爲若干類別考察着，就立刻會發生一些新問題：第一是，爲什麼各種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與人生觀；第二，何以在某一類的人中有着某一種大同小異的生活觀，在別一類的人中又有着別一種相差不遠的生活觀；第三，何以各個時代的人的人生觀不相同，而每個人的一生中也常常改變他的生活意識與生活態度。

要研究這些問題，單是靠各人主觀的頭腦冥思亂想，是決不夠而且危險的，起碼需要的條件，是基本的哲學認識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

嚴格地說，人生觀並不是每個人對於生活的斷片的願望與傾向，這是一個全盤的生活理想與生活認識的體系，所以它並不能孤立地存在，而常是受着各人及所屬的社會集羣的世界觀的規定的，把意義放大點說，所謂人生觀也可以說是世界觀的一部分。

鄉下的老農們（指那沒有受過新的社會洗禮的）相信天上有一位玉皇上帝，他指揮着諸神，管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雪，因此他們認為世上也應該有一位非凡的眞命天子，號令百官羣僚，管理百姓，不是這樣，天下就不太平，這樣就影響到他們的生活觀。他們相信自己的一生一世是受着命運的支配的，服從，守舊，私有在他們生活上常是牢不可拔的。從此可見各種人的人生觀總是和他們的世界觀配成一致。自然，我們不能忘記，各種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又是決定於各集羣人的生活狀態與文化狀態的。老闆，廠主，田東們有他們特殊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夥計，工友，種田人也有他們特殊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在同一生活關係下的人們雖然世界觀與人生觀也有些差異，如受過科學教育的老闆相信地球是繞着太陽兜圈子，而老式的老闆仍舊以為地是駐在一條大鯊魚背上，但是兩者的思想仍有許多共同點，譬如他們都認為世界是受人的頭腦支配的，少數人憑着自己的「本領高強」爬在上面享福是合理的，是他們養活衆人，不是衆人孝

敬他們，這些想頭常是一致的。生活地位與利害關係，可以使得一定的人羣的人生觀大致趨向同一，這是隨便那個否認不了的。

既然世上有着各種不同的人生觀，當然生存在現代有志前進的人們就必須選定一種正確的人生觀作為生活的軌道，我們固然不能教每一個前進者都抱持絕對同一的生活理想，更不能強每個人對社會擔負同一的任務，使大家的興趣，志願與日常生活都統一於一色二樣的模型中；但是正和前進的羣需要統一的世界觀與歷史觀一樣，凡不留戀舊時代屍骸的血性份子也必得有他們大體共同的人生觀，所以那些主張各人應有自己特殊的與衆不同的人生觀的人，雖然調子唱得美妙動人，在事實上是等於將人類看作個個漠不相關的超塵世動物。

我們需要一種嶄新的人生觀，這人生觀不只要成為各人新階段的生活——或簡稱新生活的指標，更應成為轉變社會改造歷史的機輪，因為大家如果都能有一種新的正確的生活認識與態度，在任何一種有意義的社會事業上必能注入一種活潑的生命力。

說起這一種人生觀並不怎樣高超不凡，但也不庸俗單純，它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決不建基於一時的感情衝動與純粹的幻想上，却是每一點以現實為依歸，使理想生活與現實生活的對

立融和統一，理想有時儘管新而宏大，但它決不能和現實隔離，成爲永久矛盾的死對頭，有好些浮淺的人完全聽憑自己野馬般的情感幻想支配全部生活，一下子恨不得手拿手榴彈飛渡東洋將日本的侵略者頭腦炸死，一下子受了挫折，又心灰意冷，靜待敵人宰割，甚至一變而爲敵人的爪牙，這批人的人生觀是瘋人院的人生觀。有意義的人生觀就剛剛和這相反，它並不排斥個人奮鬥前進的理想，而且亦不排斥個人的感情作用，但它是建築於一種對世界對社會有系統的認識上，依據這種認識再去決定個人生活方式與行動計劃。例如一個具有正確的人生觀的青年在認識了宗教的欺騙性與麻醉性之後，他並不憑着感情衝動去殺死幾個神甫、和尚、尼姑，就算作是反宗教的行動，他必須聯合具有同一見解的人發動及宣傳反宗教的運動，叫大家認識宗教的真正面目是什麼。在這過程中，他需要利用自己的情感，需要憑自己有系統的理想定出種種有效的計劃來。

新的人生觀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絕對排斥那種玩世的厭世的消極態度，而把人生看做有積極價值的永續的人羣生活之流，在這樣的一種認識之下，個人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非凡動物」，却亦不是毫無辦法的可憐蟲。在最近國內一部分智識份子中，特別流行着一派自命爲

高雅者所標榜令人全身起雞皮皺的「孤芳自賞」主義，他們雖然裝幾句畫虎像狗的「幽默」腔，但那副假充玩世者的小丑醜態却也暴露了他們一種令人作嘔的人生觀，七手八足挖出幾個死去了的名士的屍骸，替他們重新安上本主，開口閉口性靈解放，仇視文化的大衆化運動，這些都一貫地說明他們的人生觀是在維護和推廣一種庸俗的頹廢主義的，雖然他們自己以為「風雅」和這種人生觀恰成對照，而事實上是互相聯結的，便是那種極無用的悲觀主義，這便是將一切看做絕望的，把世界社會看成狹小的牢籠，把自己看做渺小的螞蟻，什麼「得過且過」，「聽天由命」，便是那些悲觀主義長用的口頭禪。這兩種型式的人生觀都是障礙個人接近真理阻止社會向前展動的，我們要像拋棄爛殼一樣拋棄到毛坑裏，每個有勇氣推動社會機輪的人，祇有將自己個人的生活當做整個社會生存的一部分，而絕不放鬆自己對社會進展和社會變革的効勞，爲着有意義的生活和合理的社會制度戰鬥着，方才能夠把握着人生的真實的意義。

最後，正確的新人生觀是反對一切的愚昧和偏見，而以不斷的發見真理維護真理爲生活的基調的，真理不單存在於科學哲學中，而且包含於每一個生活斷面與社會關係中，使它們轉

移到頭腦子裏，而擴大應用到一切事物中間去，這是每個前進者終身應用的生活態度，不正如斯爲着真理他還須具有一種獻身戰鬥的精神，對迷信對偏見以及對一切殘害真理的惡勢力宣戰，對一切妨礙真理的庸俗勢力進攻，這樣才能使自己的生活不絕地沿着真理的道路馳進。

所以我們所需要的新人生觀是切合現實的，維護真理的，奮鬥的！科學的！
（蘋果）

新的人生觀

新是舊的對稱，所以要說新的，就不能不先說一說舊的。

本來，某個人或某羣人的人生觀，都不過是其本人或本羣意識的反映罷了。舊的人生觀，除了書本子是其廣大的淵藪以外，至今還保藏在不少人的腦袋裏。但舊的世界差不多總是「人上人」佔着優勢；奴隸暴動固然是失敗了，農民暴動也多半被撲滅；就是不撲滅，也不過像中國歷史上常見的那樣，一部份「豪傑」靠農民搶到了「天下」，整個的農民仍沒有獲得真正的解放，結果社會的變化不過是走馬燈似的走了一轉；資產階級雖從被壓迫的第三階級摘去了封建貴族的帽子，可是資產階級當屈居第三階級的時候，就已有所謂第四階級的窮光蛋做其「墊褥」，賤時早已是「人上人」，貴時可還用說麼？這樣看來，舊的人生觀，簡直全是「人上人」的人生觀，「狗嘴決不會生出象牙來」，「人上人」最多也只會說幾句騙騙「人下人」的話，決不會替「人下人」開人生的真正「訣竅」，所以離開真理豈祇十萬八千里而已！

但是時代不同，「人上人」的意見也不必完全一樣。譬如拿我們做人究竟是自由的還是不自由的一個問題來說，那麼就有二種好像相反的論調：一種說是自由的，一種說是不自由的。自由論者認為我們的思想有掀大動地的功用，我們的意志不受任何拘束，我們不但要喝茶就喝茶，要散步就散步，甚至只要我們能想得出來，儘可以「依心如意」的改造社會，改造世界；這種說法的不妥當是很顯然的，因為我們人類，至今為止，不但還不能「依心如意」的飛往星球去，就是在地球上面，有些比較落後的國家，對着水旱天災，簡直還是沒有辦法，只是束着手抬着頭在過那「聽天由命」的生活。至於在社會裏面，自由可更難說啦；自由戀愛的「福音」恐怕已經「播」得很久了，然而在有些地方，你要是實行自由戀愛，就是不被「活埋」的話，至少你得挨餓，最後就弄到你非拆散戀愛不可。於是相反的意見來了。相反的意見認為人的意志一些兒也沒有什麼自由的，因為人不但出世時完全不憑本人的意志，就是出世以後，情勢也不見得怎樣好轉。你要吃，為的是你的肚子餓了；你要喝，為的是你的舌頭乾了。你的思想，是你出世以來受着家庭社會的影響，漸漸兒長成起來的。你的細胞，一個一個都是現社會的產物，你的一舉一動，都有迫着你不不得然的某種原因，你絲毫作不得主。如此這般，就產生了如此這般的你；如

此這般的環境，就養成了你如此這般的思想和舉動；如此這般說來，人生什麼都是受着限制的，一些兒也說不上什麼自由。

人的意識複雜得很，因為古往今來的思想常常是積疊錯綜着的，所以人的意識，斷不能純純粹粹的只是在反映某一種思想，不過這話並不能禁止我們，認為我們不能說明某種意見約略是代表某時代的某羣人的。我們知道「人上人」的這二種意見，當然同時都是可以存在的，不過約略也可以說，正好是代表着「人上人」的二個時代，尤其是資產階級的二個時代：出風頭的時代和倒霉的時代。當資產階級在革命勝利的時候，在「生意達三江，財源通四海」的時候，封建是被打倒了，行會是被推翻了，社會上開了自由生產、自由買賣、自由競爭的花葩，社會的一切，都依照了資產階級的心願，資產階級創造了世界，資產階級有的是錢，資產階級愛怎樣，政府便怎樣，社會也便怎樣，處處都呼吸着自由的空氣，不但肉體上感到快樂，並且快樂一直沁透了資產階級的心苗，自由呀自由，自由於是根據着人生觀的領域了，然而資產階級的生產却發生了恐慌，一蹶是偶然的，二蹶也許還是偶然的，三蹶四蹶已不是偶然的了。恐慌的蒞臨，使平安順適的社會發生了悲慘的現象，「人下人」慢慢兒抬起頭來，社會終究還是好像受着「誰」

在冥冥中支配着，資產階級不但覺得社會不能盡歸其控制並且自身更有沒落的預感，悲觀失望，意志的不自由論也就這樣又得了勢。

可是話兒還得說得清楚些意志不自由論，也就是意志必然論事實上可並不是那麼簡單的。當資產階級灰心失望和自己預感沒落的時候，必然論固然會熱鬧起來，但必然論的內容也是隨着時代在推演，在不同的時期，往往會起不同的作用的。譬如在社會停滯得走馬燈似的，則必然論其實就是宿命論，一個人被狗咬了一口是命該如此，被人誣作強盜也是命該如此，生活迫得沒有辦法而自己拿着帶圈兒去上吊也是命該如此。宿命論是「人上人」撞住「人下人」腦袋的最巧妙辦法，因為這樣，「人下人」決不會想到貧富的不平，想到貴賤的不平，想到一切種種的不平，決不會常常有什麼踰矩越軌的行動。但是必然論當作反映資產階級灰心失望的時候，實是對資產階級從前的一手舞足蹈「一個尖刻的諷刺，所以同時也就變做了一人下人」推翻舊社會的一種信念，這是可以從反對方面來證明的。因為資產階級當灰心失望和預感自己沒落的時期，宿命論那樣的必然論固然可以抬頭，但當資產階級真正已到了沒落的時候，哲學上却有了兩種傾向：一種是已經不說什麼必然和自由了，而是認為世界是永久的

對立和分裂，始終不可克服，前途絕對沒有希望，這是失望的加深，是悲觀的更進一步，是資產階級臨死時的悲哀；一種是唯心的現實主義，認為資產階級可用殘酷的手段來鎮壓「人下人」，暫時延長資產階級的壽命，這裏多少就帶有意志自由的氣息，實在也就是資產階級在最後掙扎時的「迴光反照」罷了。

但是必然論還是有必然論的缺點，所以必然論也只能當做資產階級「狂歡」的諷刺，並不能當做前進羣的鬥爭武器。必然論認為歷史的進化是必然的，新社會的降臨也是必然的，這自然不錯，但必然論如果機械地去了解，認為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必然，社會現象的一鱗一爪也全都必然，那麼終究將逃不出宿命論的範圍，結果必至於雖然知道革命的必然勝利，然而並不急起直追的去幹，不但使革命的勝利變成了渺茫的泡影，並且事實上還是在促成革命的失敗。我記得我鄉有這麼一個故事：說是有一個父親，看相看得非常的精確，全鄉都叫他「賽神仙」，他臨終時說他的兒子是大富相，他的兒子長大了，也牢記着父親的遺言，認為他的大富是必然的了，於是什麼都不幹，直至窮困潦倒而死。他在冥府裏便向閻羅王嚴厲質問，認為他如果不應大富，那麼「賽神仙」的相理是破產了，他如果應該大富的，那麼冥府的管理實在太糊

塗了。後來閻羅王翻開冥冊一查，果然他是應該成爲一位百萬富翁的，於是大爲震怒，傳城隍爺、城隍爺又傳土地公嚴訊。據土地公說，土地公追隨他已有數十年之久了，然而他竟懶得就是一「發橫財」的機會也絕對沒有。有一回，他灑洋洋的在階沿上坐下來，土地公趁他還沒有坐下的時候，趕忙在他的臀下生了一顆帶刺的草，滿望他因爲坐得不舒服，拔去以後便可以發露下面的財寶，可是他老實沒有事似的坐了好久，始終不肯動一動手，叫土地公的鬚子愁白了也沒有辦法。這故事固然迷信氣味太重，並且本身也就充滿着宿命主義，然而說明就是有宿命的話，也必須要加上人的力量去，這是再好也沒有了。

新的人生觀對人的力量一層看得特別重，所謂必然，可不是機械的了解。新的人生觀認爲人的思想和活動，也是物的一種本性，好像植物能生長，動物能行走的本性一樣，不過人類這樣的物的本性，是後出的，是比植物和動物等等的本性還要進步的，人有了思想和活動的本性，於是便產生了人類的歷史；歷史產生人，人推動歷史，成爲往復迴環而又向前在發展的一種形態。換句話說，社會的進化是必然的，社會向什麼方向在發展也是必然的，不過歷史究竟是由人製造，所以人生的意義，也就是要看清歷史發展的方向，並且盡一份子的力量去推動社會，使歷史

不停滯，使歷史不倒轉和後退。人的意識，固然由社會來決定，但人並不是絕對沒有自由，這有二種意義：第一，某羣人，尤其是反動羣的人，雖然有某羣人的一定意識，但一羣裏的個別人員，如果能覺悟，能將社會發展的情勢看得非常清楚，那麼雖然很困難，也儘可努力來改變其自己的生活習慣，克服其本羣裏的偏見和成見。譬如佛里德利赫，原來甚至是一個資本家，他却能終生爲着進步一羣的人服務，就是一個例子；不過這種克服本羣的意識，需要極堅強的意志和忍耐，所以只能有個別的現象，可不能有普遍的現象。第二，認清了社會發展的趨勢，順着這種趨勢去做，那麼不管一路上有多麼的障礙和困難，所謂理想總是慢慢兒會實現的。這也就是自由的真意義了。所以我們認爲人生並不是絕對沒有自由的，不過只是必然條件下的自由罷了；人能認識必然，做人也就愈自由。必然同自由好像相反，而實際上却是相成，相反而又相成換句新的術語，就是矛盾的統一。所以將必然和自由用矛盾統一去了解，也正是辯證法的了解。

推動社會可以從各方面去進行，並沒有一定的形態。不過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中心任務，這可不好忘記。忘記了中心任務，不但不能推動社會，也許反而要阻止社會。社會的進化，已可使落後的國家只要同最前進的國家結合起來，便可以從發展資本主義做起點，而不循着資本

主義發展的舊道路，經過短短的時期去走向社會主義，這時你如果硬要將社會拉任，定要向正規的資本主義道路去努力，那麼你就變成了社會的阻力，似進實退了。但如果社會受到了阻力，已經談不到前途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問題，而是民族能不能繼續生存問題的時候，你要是仍在高談社會主義，結果還不是一樣麼？中國近來受着敵人的侵略，已成爲一個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我們如果真能認清人生的意義，那麼我們一方固可不必悲觀，一方更要盡各種各樣的力量，來促進抗敵的實現，只有在擊退敵人收復失地的條件之下，社會才有向前躍進的機會，而我們也就不失做人的意義了。（貝葉）

新的婦女觀

提起「新生」兩字，我忽然想起了一個關於新生的小孩的傳說。諸位大概總看見過新生的小孩的屁股上有一大塊或一小塊青紫色的肌肉罷！據我故鄉的傳說，那是在嬰孩出世之前，他的靈魂必須先向閻王求討投生人世的許可，閻王知道人世間雖則比陰間較自由，但亦較艱苦，恐怕那個靈魂一遇到痛苦就逃回陰間，總要叫牛頭馬面打他幾千下屁股，測驗測驗他的本領；因此小孩的屁股上，都有青紫色的傷痕。偶然有人家生了一個沒有青紫的小孩，做他父母的就會滿面憂慮，時刻怕小孩會夭亡，因為他們大半迷信那個傳說是真實的。

我們現在要說的婦女新生，雖然不是指和嬰孩，一樣的軀體的新生，而且我們亦決不會迷信有什麼閻王之類的東西，但情境却很有些相同。生活在這和陰司一樣沒有生氣的社會裏的姊妹們，因為受不了種種氣悶和拘束，而想開始去過一種新生活的人並不少，但剛跨上新生的途徑，馬上就畏怯地退回舊的世界來的，却比新到人間的小孩，因為適應不下種種生活環境而

逃歸陰府的百分比還要高。這自然是因為做新婦女雖則比做舊婦女多一點點自由，但她們所遇到的艱險風波，却也許要加多千百倍，在她們決意追求新生時，既然冒冒失失沒有經過閻王老爺測驗耐苦力的痛楚，她們退退時也就不大會怎樣留戀。

婦女的新和舊的分界線，是畫在依賴「性」和不依賴「性」的兩種生活之間的。

雖則說婦女在過去會因為她們的「性」受了不少摧殘，但同時，婦女們也差不多全只會依賴她們的「性」去取得安逸和享受。在這種「性」的神通特別廣大的時候，婦女們的腦力和體力就受到了廢置不用的待遇。現在一旦要起用久已廢置的腦力和體力來代替慣用的「性」的神通，不但婦女本身會像用慣右手做事的人突然改用左手一樣覺得生疏不便，就是男子方面，也要像看見向來祇會向自己叩頭作揖的僕役，忽然伸出手來和自己握手行平輩禮一樣，覺得看不入眼，不能不表示反對，可見這種嘗試，並不是一舉就能大功告成的。

但是，過去專依賴「性」的神通的婦女生活史既已把慘敗的結果昭示了我們，我們當然不能再去蹈前人覆轍。顯而易見的，我們的面前，祇有一條充分運用腦力和體力的路徑是光明的。我們一定要掙脫「性」的羈絆，超脫「性」的迷惑，用我們的全心全力，來建造一個不為

「性」受摧殘，也不是依賴「性」佔便宜的環境。

不過這也並不是說我們馬上能夠不顧現實，一脚就跨上理想的標準。例如女招待、女店員等等職業，僱主方面固然大半是想利用女人的「性」以廣招徠，但在婦女方面却又不能因為這原因而就不去充當，因為婦女職業的初期，最多的職業機會都是有點「性」的影響的，全沒有「性」的影響的職業是不會先開放的。祇不過投身這種職業的人，却不能忘記了這祇是過渡時代的一種橋樑，真正的婦女職業是應該以技能勞力為前提的。

至於家庭婦女，雖則有好些人認為治家也是職業，但我總以為以結婚代替職業是造成婦女地位低落的一種主因；她們至少應該在治理家事之外，再作一點對社會的直接貢獻。較少「性」的影響的職業，自然祇有勞動婦女和自由職業婦女兩種。不過到現在為止，這兩種婦女也還不能全超脫「性意識」的支配。例如一般比較守舊的女工人，她們大都在潛意識裏希冀着將來丈夫如能養活自己就不必再做工，所以她們對於團體組織的態度總比較的冷淡，工資比男工低她們亦不反對，同時她們的工作效率亦較低，沒有精益求精的野心。至於一般的自由職業婦女，情形比女工也差不多，她們有的以職業為消遣，有的以職業為出風頭的工具，她們取的

大都是得過且過的因循態度，和男子的對事業的野心差得很遠很遠——自然亦有例外的少數，數是比男子還要認真辦事的。

現在，從事職業的婦女已一年比一年增多，這是一個很叫人樂觀的現象。她們的經驗將會促醒她們，使她們覺悟到：在社會上和男子做同志同工的確是比在家裏仰男人的鼻息更能發展自己的人格，促進社會的文化，達到新生的目標。不過這條路是窄的，走這條路的人也是辛苦的，必須有堅決的意志，偉大的耐力，才能繼續着向前走。（蔡慕暉）

新的戀愛觀

戀愛是一般生活中間的一環。在社會，在個人，都是跟一般生活有拆不開的關係。在五卅時代，倘出「娜拉出走後怎樣」這樣一個題目叫一般人解答，答案大概是出走後讀書，出了這種說法居多數；現在再出這樣一個題目叫一般人解答，恐怕却是說出走後作工去了居多數了罷。前幾個月，有一個中學的學生在上海西藏路寧波同鄉會演話劇，劇中給這個問題的答案，便是這樣的。娜拉的出走是因為戀愛破裂，出走後的答案的不同，便是解決破裂的方式的不同。五四式的方式，是認讀書作解決一切生活——戀愛也在內——的途徑的，如今却認工作當解決一切生活——戀愛也在內——的途徑了。可見認識總是跟着歷史的輪子滾向前去的。雖然現在還有些人躺在幸福的床上在做幸福的幻夢，心想重做堯舜禹傳說裏頭的人，但由我們動看（不是「靜觀」）過去，五四跟現在就已經這樣不同。將來自然更要不同。

將來的娜拉或許會更加聰明一點，不把「出走後怎樣」當作問題，却把「不出走怎樣」

作爲問題了

出走後去工作，好像是新；但一定要到出走後才去工作，到底還是舊的。戀愛只是生活的一環，不能把戀愛當作生活的全體，在戀愛時期專門戀愛，拿當愛戀工作，等到戀愛破裂了才去找工作。戀愛只是生活的一環，不能把戀愛當作生活，甚至因戀愛而妨礙了其他生活。將來的娜拉，大約會把「出走後」的「怎樣」提到「出走前」或者提到結合前去想的罷。這樣的娜拉現在也已經有了。韜奮先生在「萍踪寄語」裏記下來的那個德國女子，或者可說也是其中的一個。

我們是人，都得做點人的工作，我們是人，不是上帝，也不是什麼猴子，在戀愛中也不能勉強大家都去做上帝或者做猴子。什麼一天「靈」呀「靈」呀，或者「靈感」呀「靈感」呀，把人當上帝看的高調，或者一天「肉」呀「肉」呀，或者「肉感」呀「肉感」呀，把人作猴子看的低腔，都只有彈來聽聽罷了，於一般人尤其是新人的實際生活上是沒有用的。

新人的戀愛只是一般生活的一環，在一般生活的規律之外並沒有什麼戀愛的特殊規律。在新人之間，固然不會有那些超常的迂腐行徑，實際也不會有那些越格的狂瀟體態。他們對於

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自自然然地待自己，也自自然然地待別人。豔奇妖異，不在他們眼裏；對於戀愛，便都看作各個個人尋尋常常的私事。不再給以特別的注意，更沒有人借此來敲詐，造謠中傷。一切全像專向垃圾箱裏檢取垃圾似的。三面新聞記事，他們的光亮到了，就將立地消失，好像

影子一樣。（陳望道）

新的道德觀

新人羣的道德觀，認爲道德這玩意兒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千秋萬世都是可以適合的，認爲道德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換句話說，人對於道德，也就是對於善和惡的見解，好像人對於人生的見解一樣，各時代不同，各人羣之間也彼此不同，所以從整個人類歷史看，各時代有各時代的道德，各人羣也有各人羣的道德。這便是新人羣新道德觀的精髓，新人羣的生活條件，使新人羣有這種最前進的道德觀，也就是有了這種道德觀，新人羣才不會附着那舊道德的骸骨再去迷戀，而發生了一種祛舊革新的力量，新道德觀的妙處也就在這兒。

在宗法社會裏，孝是至高無上的道德，因爲那時父權的社會組織已經鞏固，家長的權威正在擴大和發揚，所以每個人的一切利益，都以「家業」也就是拿家庭做單位的這份產業爲中心，兒子在家裏固然是家長的作品和私有物，爲着整個家庭，實際上就是爲着家長在做，就是出外做事，也爲的是替家庭在爭光榮、顯門楣。「家業」不但是父母保持下來，而也是歷代祖先

創立和恢弘起來的，所以緬懷祖先的情緒在那時非常濃厚，兒子不但要尊敬父母，並且也要尊敬祖先，於是甚至有祭祀那樣的儀式產生了。「家業」既然要世世代代的繼承下去，所以做兒子的方面要繼承父母，一方面自己也必須製造自己那樣的兒子來繼承自己，於是「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道德觀也就大爲流行了。「家業」一分散就不容易保持，所以爲着避免兒子太多而墜落「家業」起見，便確定了什麼大宗小宗的家族系統。

在封建社會裏，至高無上的道德已是忠，不是孝了。因爲這時社會的組織已經擴大，封建主一家的私利和封建國家一國的公利打成了一片。封建主爲要保持其一人之聲威，就需要臣民都能對他表示忠忱。封建國家是在不斷戰爭中長成和發展起來的，爲驅使臣民服服帖帖的去作戰，提倡「忠」的道德尤其切要。中國的封建社會裏，宗法社會並沒有完全掃除，所以忠孝二項德目，常常同時並舉；歷代的儒者，更有許多溝通忠孝二項德目的微妙說明，然而什麼「大義滅親」啦，「爲國忘家」啦，正是封建主的權威超過了家長的鐵證。不過封建主本人，就是一個大家庭的家長，而臣民的生活，也還是拿家庭做單位而沒有變更，家庭如果在那時解了體，社會將發生怎樣的騷亂，簡直無從想像，這也就是在封建社會裏沒有使孝的德目偏廢的緣故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道德便有資本主義的新花樣了。這兒主要便是更響亮些來吶喊私有財產的神聖，所以「不偷盜」便成爲一種好的道德；不但是好的道德，並且已由道德轉變爲比封建時代更細密而更嚴厲的法律，犯偷盜的人應該坐牢受刑，甚至消滅其存在了。總夾二的先生一定說，不偷盜是道德，如果只認爲是資本主義或私有財產社會時代的現象，那麼難道在非資本主義或非私有財產社會裏就是道德了麼？換句話說，那時就可以偷盜了麼？話可不是這麼說，問題不在於偷盜在那時是不是道德，而是在於沒有私有財產的社會裏偷盜根本不會發生，所以「不偷盜」的成爲道德，在那時實在沒有絲毫的意義；反過來說，也就證明偷盜只是私有社會的一種病態罷了。原始公有社會裏，生產品沒有多餘，偷盜實在無從說起；就是那時偶然已有掠奪現象的話，那麼也是認爲這是爲着生存而不得不然的，壓根兒也沒有什麼道德或不道德的念頭。至於將來，社會的組織已經改變，技術的發達也到了非常的高度，「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的制度已經實現，那麼除非有神經病的人才會去偷盜，普通人決不會的，也決不會有偷盜或不偷盜是道德或不道德的觀念，更是非常明顯的事。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標準道德和道德標準，已足證明道德是活的，不是死的；如果我們

再拿同一的事實，用道德的三稜鏡來照，那麼各時代也可以有各時代的不同解說，各人羣也可以有各人羣的不同解說，結果也還是更確切的來說明這一點罷了。譬如殺死龍鍾的病人，由我們看來，無論怎樣總是不道德的，然而在原始的社會裏，不但因為要解除老人的痛苦，沒有善良的醫藥可以應用，並且因為生活資料的缺乏，每人採獲來的只夠每人的吃食，老人病久了不會出去採獲，餓也差不多已要餓死，所以壯年人殺死疾病纏綿的老年人，解除其痛苦，在當時正是一種道德。又如戰爭，看法正是不同得太厲害了。帝國主義的大戰，大多數都認為是再殘忍再慘酷也沒有的事，然而帝國主義者却認為這是在爭正義，爭公理。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在侵略者的口頭上是在「宣揚文明」，「宣揚王道」，然而從被侵略者看來，是帝國主義臨死時在發瘋，在肆威，在「弱肉強食」罷了。反過來，侵略者對被侵略者和統治者對被統治者，都認為必須鎮壓，必須屠戮，然而被侵略者和被統治者有時却認為民族的抗戰，是至高無上的神聖戰爭，認為用國內戰爭來制止帝國主義的國際戰爭，正是推進歷史輪子的偉大任務，每一個前進的人都應該來盡一分的力量。

道德顯然是隨時在變化的，然而舊的道德觀，認為道德是亘古不變的教條，這是什麼緣故

呢？這是因為舊社會向來是「人上人」的社會，「人上人」終希望這樣的社會能夠永生不死，所以在道德問題上反映出來的也有這樣的見解。「人上人」如果在社會興盛的時候，自然希望這樣的社會能夠「永存」，就是在衰敗和沒落的時候，也希望這樣的社會能夠「苟延」。當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時光，舊的思想會一度被理智所審判，舊的道德也會一度被「暴民」所蹂躪和毀滅，然而繼着而來的却是資產階級永恆的真理，是資產階級永恆的道德和法律。

反映「人上人」對現社會永存的希望，不但在道德方面，並且在其他各方面，也都可以看到。譬如在經濟方面，資產階級的學者，認為商品交換價值的產生，是因為商品有使用價值的緣故，而不是什麼化在商品裏面的人類勞動。至於使用價值呢？誰都承認，不但是商品，就是在原始社會裏自製自用而並不交換的生產品，甚至大自然中間的日光空氣和水等等，也都是有的；這樣看來，使用價值既永遠存在，交換價值確也是永遠存在，而商品也好像是永遠存在；這樣，資本家也不必要在這樣的社會裏才能賺錢了。許多厚顏的帝國主義讚美人，常用連篇累牘的巨著，來歌頌帝國主義的偉大，來證明帝國主義的永恆存在，其用意也完全是一樣的。他們想入非非，認為蟻窟裏、蜂巢裏、狗的「社會」裏，也全有帝國主義的存在。這樣說來，帝國主義不但是

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的永恆真理，並且也是動物界的永恆真理；這樣說來，帝國主義不但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也必然要存在；誰說帝國主義已經腐爛了，誰說帝國主義終究要被顛覆，誰便是在造謠，在說謊。希特勒要恢復「第三帝國」的光榮，「友邦」的人士正企圖在神州大陸上延續萬世一系的帝國，顯然都是帝國主義永存論的忠實信徒。然而秦始皇那知道「二世就丟了天下」，俄國的沙皇那知道當二月革命沒有爆發以前，早已被叫做「尼古拉第二」了呢！

「人上人」用永恆法則來論道德，與其說是不自覺，還不如乾脆說是自覺的好，這可以拿他們也「活」看道德的許多事實來解釋。在舊的社會裏，除被壓迫者和被統治者有時也有自己可抗奮社會的道德以外，不但那些「人上人」在宣傳和鼓吹的道德，多半都是「人下人」偏面的義務，而同一的德目，「人上人」為適合自己的利益起見，也常常會借用舊的軀殼，灌入新的靈魂的。譬如勤儉，窮光蛋的需要勤儉，有錢人還需要什麼勤儉呢？「人上人」希望「人下人」勤儉，第一是恐怕「人下人」要再不勤儉，不是更要搗蛋麼？第二是說勤儉可以致富，那麼「人下人」就不會對那些致富實在並不因勤儉而來的人懷疑或為難了。又如廉潔，也多半是對「人下人」說的，「人上人」或者已是不廉潔得不需再不廉潔，或者便是另有養廉的方法。

所以「人上人」鼓吹和宣傳的道德，不是與「州官可以放火」並存着的那種「百姓不准點燈」的道德，便是「竊國」的人索性提議大家不准「竊鉤」的道德。不過譬如勤儉和廉潔等等，原來都是封建時代已有的德目，資產階級的社會爲什麼不另起爐灶，而竟愛陳陳的因襲着呢？這是因爲封建時代的許多德目，已由封建時代的「人上人」努了幾千年的力，在廣大的一人下人」裏已播下了深切的信苗，所以這種信苗儘可由新的「人上人」來借用；何況借用舊的軀殼，並不一定要保存舊的靈魂：封建時代的勤儉是叫農民對地主多納些兒貢，那麼資本主義的勤儉未始不可叫工人對資本家多納些兒剩餘勞動。要是老百姓能盡忠愛國，那麼只要移君王一人的忠而爲整個階級的忠，移古代的國而爲現代的國，試問有何不可呢？

這樣看來，有許多的德目，好像在什麼社會裏都可以應用，事實上並不是絕對沒有，不過這兒改的只是形式，內容却是各時代都在改變。基督教的教義，從謀解放被壓迫的人起，經過作爲箝制思想和文藝的工具用的黑暗時代，終成爲麻醉勞苦大眾和殖民地人民的醇酒；儒家的思想 and 道德，改頭換面，始終在中國的社會上流行着；實是二個最好的例子了。我們譬如再拿「守秩序」的一個德目來說，不但現在處處都要借重它，恐怕在將來的社會裏也不見得會一下子

消滅的，然而各時代守秩序的內容却是完全不同：奴隸時代守的是奴隸主役使奴隸的秩序；封建時代守的是地主剝削農民的秩序；資本主義時代守的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秩序；在殖民地社會裏，守的是帝國主義侵略和統制殖民地的秩序；而在沒有對立人羣的新社會裏，守的才是真正和平自由的秩序。

新人羣既然否定了舊道德的停滯性，所以新人羣也就有新人羣自己的新道德了。新人羣是在人煙稠密的大都會裏產生和長成的，所以新人羣的主要德目是自己人羣的團結，因為新人羣只有團結，才能成爲一種不可毀滅的偉大力量，也就是這樣，才能負起改革社會的大責任來。社會發展的歷史，使新人羣必然成爲改革散漫的舊社會而變做組織嚴密的新社會的主力軍，所以新人羣的道德標準和舊道德標準有一個大大的區別，這就是舊道德常常從個人出發，而新道德却處處從社會出發。舊道德常常偏重個人的修養，就是個人在爲着社會服務，爲的也只是爲着個人的名譽和地位，也就是爲着個人的利益。這本來也不足爲怪；因爲在無組織的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的生產，全都爲着個人的利潤，所以個人的利益，似乎是一切社會進化的推動力，因此這種個人主義的思想遂深入在各個人的腦際，牢得不可開交，新人羣的人生目標，

便是要將這樣的社會改爲有組織的社會，自然不會再從個人出發，而是從社會出發了。

不過從社會出發的道德，並不是完全抹殺個人道德的意思。掉句話說，我們並不是把公德和私德完全對立起來，也不是把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完全對立起來。社會的存在就靠各個人的存在；社會的進化也就靠各個人的努力，個人行爲的善和惡要看對社會有利的還是有害的作爲標準。所以新人羣對於那些什麼「獨善其身」的道德，不但不加揄揚，甚至認爲這對於社會並沒有什麼好處，還要力加排斥。不過新人羣的道德觀，對於個人那種過份放縱和浪漫的行動，一方面給社會蒙上了不良的影響，一方面自己對社會實際上正是採取了消極怠工的態度，所以也要加以抨擊和督責。總而言之，新人羣的道德是活的，不是死的；各時代固然不同，同一事件而各個人也應有不同的看法。

新道德觀脫不了時間性，所以對於某一時期的社會特徵，必須緊緊的抓住，這才可以抓住某一時期的道德標準來。譬如說，現在中國正是民族決存亡的時期，所以行爲的善惡大概就該拿這個來做標準。現在一般人認爲替侵略國做爪牙的便是漢奸，公開或暗中來反對抗戰的便是華漢奸，實在就是這個道理，同時也就替新人羣的道德觀寫出活生生的註腳來了。我們說某

青年在現在時候老沈醉在酒杯裏或女人的懷裏是不良的行爲那麼這裏毫沒有禁慾主義的意思，而是認爲某人的那樣青年，這樣子只是躲避戰鬥，至少個人是在放鬆敵人罷了。（貝葉）

新的理論和新的實踐

人人知道理論就是實踐的產物，而實踐又受理論的指導。由這一個公式看來，實踐就是產生理論的根據。我們爲了實踐，也就需要理論。舉一個最淺近的例子來說，火是不能用手碰的。一個沒有經驗的小孩會把手放在火裏，但是受過火燙的人決不敢用手動火。受過了火燙的經驗

——實踐——產生了一火是不可用手碰的——理論，而這個理論又指導我們不要用手去動火。從上面這個例子看來，我們知道爲了實踐，我們需要理論，也可以說，爲了生存，我們需要知識。所以實踐便是理論的動力，生存乃是知識之母。人類由他們千萬年來的實踐的經驗，才產生了種種理論；這也就是說，他們生存的經驗產生了豐富的知識。

人類爲了生存必需獲得知識；所以爲了防備猛獸和充飢禦寒，他們就想出打獵的方法；爲

了吃飯，他們想出耕種的方法，爲了穿衣，他們發明了紡織……這些最粗淺的基本的道理經過各種發展的階段，久而久之，便發展爲很複雜的理論了。

理論雖由實踐產生，但是實踐也需要理論的指導。我們要採取某種行爲，就必需某種理論來指導。例如，有人爲了要多數人替他們服役，他們便創造了一種理論，說少數人是優秀的，多數人是卑下的。他們或是用神話，用宗教，用法定的特權，用身分或財產，用種族或國家等等的關係，來證明他們的優秀。然而多數人的意見又和他們相反對，爲要取消這種不平等，於是也創造了對抗的理論，認爲人是不應該奴役人的。這種相反對的理論正是由相反的社會實踐所產生，因爲不同的需要創造了不同的理論。

所以我們學習理論並不是無所爲的，而是爲了一定的社會實踐。我們要支配自然，我們就研究并創造自然科學的理論；爲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又創造了社會科學的理論。我們要生存，而且要生存得更好，這就是我們學習理論的動力。

中國青年大衆的經驗就證明了這一點。有人說，民國以後的中國青年經過四個用功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五四運動前後；第二個時期是五卅運動和大革命前後；第三個時期是九一八

以後而，最後一個時期便是一二八。到現在，這樣說法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在這幾個時期中都是需要偉大的社會實踐的時代，因此也特別需要正確的理論。

有人也許要否認這一點，他們說在這幾個時期中青年人都動起來了，跑出了課堂，丟下了書本，還需要什么理論呢？這實在是大錯。我們要說正是因為這個原故，他們才需要透澈地研究理論。因為在平時，如果多數青年不去關心國事，他們也不需要研究什麼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原因啦，中國為何受外力壓迫啦等等。他們只要似懂非懂地讀讀課本，也儘夠了。但是一碰到重大的生死問題，他們才能一旦醒悟，就是他們所讀的書對於解決這些問題一點也沒有用處，所以他們不得不把正確的理論弄個透澈，才能對付當前的危局。

例如我們的本國史課本幾乎不能說明中國為什麼降到半殖民地。我們的經濟學課本還不能使我們了解中國的經濟情形。我們的政治學課本也不能使我們明白現時中國的政局……試問這些學問有多大實際的價值呢？在平時，這許多東西還能夠叫我們應學校先生的攷試，但是到了危急的時期，他們却不能使我們應「歷史先生」的攷試了。

於是我們才了解理論研究的重要，而如夢初覺地要求着正確的理論和生存的知識了。這

個理由說明了，近年來中國的讀書界爲什麼有這樣的發達，有這樣的進步。

二

實踐和理論既然是如此密切地關聯着，當然是分不開的了。這種道理是不需要多大解釋的。例如因爲我們要救中國，我們才要建立起救中國的理論，有了救中國的理論，才能勝利地救中國。我們應該這樣認識才對。否則，把研究救中國的理論和救中國的實踐分開來，主張「我已經在救國，所以不需要研究救國的道理」，或者說「我專們研究救國的道理，那裏還有功夫來做救國的事」，那就是不明白什麼是理論，不明白什麼是實踐，更不明白二者的關係了。

這個道理是十分明白的。但是許多人實際運用這個道理的時候，常常發生毛病。因爲他們沒有澈底了解。我覺得這并不需要發什麼空論，祇要打一個比方就可說明的。我們每個人都有練習作文的經驗。如果我們不作文，當然不需要知道作文的方法；但是假如我們只記住先生講的起承轉合，還是作不了文。因爲如何「起」，如何「承」，如何「轉」，如何「合」，都不是口裏講講就能做到的，必須實實在在做起一篇文章的時候，我們才能真個知道如何地運用「起承

「轉合」的作法。

我們必須如此了解，才能學習理論，而且也只有這樣做，才能成功。因為沒有一個會做文章的人不知道做文章的方法，也沒有一個只懂得作文法而不寫文章的人，會做成一篇文章。在此細小的事件中，理論與實踐尚且如此密切地分不開來，那麼在更重大的事件中，難道我們還能夠懷疑這個原則的重要麼？

從現實的研究中去學習理論，用理論研究的所得來指導我們的現實生活，這才是把理論與實踐聯系在一起的好方法。只有這樣，我們的理論研究才不致成爲空的，我們的現實生活才有了正確的指導，才有了一定的發展的途徑。

三

205

但是理論與實踐也不可混同。有的人過分地把二者混合起來，結果會造成對於其中之一的忽視。例如有的人認爲要從實踐中去學習理論，但事實上，他們完全忽視了理論，又有的人認爲研究本身就是實踐，所以只要看幾本書，討論一點問題，發一點議論，最多寫幾篇文章，就算完

了。這樣地把理論與實踐混同起來，實際上還是機械地把二者分開來罷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兩者配合起來，而且在某一特殊的場合時期，或爲了分工的關係，我們可有某種限度的偏重，或是多注重實踐，或是多注重理論，也無不可。因爲一個人的精力究竟有限，不能同時做許多事，而且我們又多處在青年時代，特別需要打下理論的基礎，就是我們做了一個完全的實踐家，都不應忘了理論的學習研究，這樣，我們才能夠有計劃地去做事。

理論研究是堅定我們的意識所必須的手段，這也可說是「武裝我們的頭腦」，只有當我們的頭腦被武裝起來的時候，我們才能武裝我們的全身來作戰。

四

在明白了解理論研究的重要後，我們就進一步來討論實行的辦法。我們的研究既不是學究式的，當然我們要從現實事件出發來研究理論。這就是說，一切理論的研究是基於現實社會的。

在我們眼前，有許多重大的事件，這些事件對於我們是有生死關係的，我們要明瞭這些事

件，我們就得研究理論。「爲什麼我們東北四省會失去的呢？」「爲什麼直到今天我們還不能收復失地呢？」「爲什麼在太平洋那一面的美國收買白銀會影響到中國來呢？」「爲什麼西班牙的內戰和別的國家有關係呢？」……這些大問題固然須要充分的研究才能明瞭，就是較小的問題也決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明，須要下一番工夫研究。例如：「人們的境况爲什麼一年不如一年？」「我們自己爲什麼常常從家裏拿不到錢？」……

這許多現實的問題，無論大小，都和我們的生存有密切的關係的，甚至有生死的作用，我們決不能隨便看過，而是應該下一番工夫弄個清楚的。

從現實生活出發做理論研究，是一件常識。因爲和我們生活有密切關係，我們更要明瞭其真象，因此才更熱心研究。

我們學習理論的基本原則便在此：從現實的具體問題出發，達到原則的理論的研究。由小見大，由淺入深，我們的理論研究工作才能腳踏實地的做去。

五

這也就是教導我們不要只研究空洞的理論，死板地記住幾個公式和定義。這非但不夠，而且也沒有用處。

有的青年朋友正患了這個毛病。譬如他們研究政治經濟學，把生產力、生產關係等等名詞的定義背得爛熟，但是一問他們中國工商業和農村經濟的實際情形，他們却不大了。同樣地，關於世界政治，他們知道世界上有幾大矛盾，關於某一問題的分析有幾個要點，但是關於中國實際的政治情形，他們却知道得很少。

這種缺點，一方面固然是因為這些人缺少基本的修養，缺少生活經驗，見聞的事情還太少，但是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常常懷着一種幼稚的自滿，他們往往以為記住了幾個公式，就已經很夠很夠了，不需要再用功夫做更深一層的研究。他們便講來講去離不了這幾個公式，說來說去，脫不了幾句老調。

這樣子，他們是決不能獲得正確的理論的。正確的實際的理論必須去運用，去處理，并解決每一個具體的現實問題。如果我們只記得一套公式和定義，並不能解決一個問題，那麼這一套東西便是完全空洞的，是沒有實際價值的了。

初學理論的人最易患這個毛病。幾個名詞，幾個公式很容易上口，但是實際運用牠們，并不是很容易的。這不單需要對於每一個公式正確深切的了解，更需要運用牠於每一個現實問題的能力。我們很希望熱心學習的朋友們能夠獲得這種能力。

六

這當然不是一天兩天所能得到的，而需要長期的刻苦的努力。這努力的辦法主要地可分三方面：首先是對於現實社會的觀察，我們要認清每一個現實問題，就要有觀察的力量。亂絲般的社會問題糾纏在一起，紊亂繁複極了，決非知識淺薄的人所能明瞭，我們應該下一番工夫去觀察、調查、收集材料，並加以分析，然後才能澈底認清一切現實事件。

爲了補充我們觀察的不足，我們第二方面的努力便是讀書。研究多種的書籍、刊物、報張等等，當然能幫助我們了解現實社會。因爲所有的文字研究的成績，不都是現社會的產物麼？當然我們要透過他們來了解社會了。書本的研究是理論研究很重要的一部門，我們還需要專文討論，此處只能指出其重要性罷了。但是我們也要注意，書本的研究，還不能包括理論學習的全部。

最後一方面的努力，便是集體的探討。由於觀察和閱讀，我們已可得到不少的東西，但是只靠一個人去研討，恐怕還不夠，所以我們需要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研討磋商，然後才能互補所短，互學所長，而由大家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來。

這三方面的努力，需要一個持久的精神來推進。久而久之，在不斷地學習中，我們就能夠進步，而且逐漸地獲取健全的理論。（劉羣）

新的社團生活

我們已指出過，個人是屬於社會而在社會環境中生長出來，離開現實社會的孤獨生活，是完全不可思議的。青年時期是每個人精力最旺盛而愛好羣體生活的時期，要教一個青年完全和羣衆隔絕，這在他是最難忍受的。可是我們不可否認，有一部分青年因着精神頹廢或過去受社會的惡劣刺激太深，使他們對於羣體的生活完全感不到興趣，甚或生出厭惡的情緒，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非常態的現象。不論從精神能力的發展上來看，抑或從生活品格的修養來看，一個青年祇有經常浸潤於羣體的生活，始能獲得真實教養的機會。離羣索居只有使得自己的生活日益貧乏化、狹隘化、空虛化。倘使我們是有志研究社會科學的，不親自和實際的社會圈子接觸，有許多問題與事態就無由反映到我們的頭腦裏來，很容易使我們的理論和見解流於偏狹和錯誤。又倘或我們是有志研究文藝的，若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根本就不能在創作上得到優美的收穫，這些都是顯而易見之理。其實即使我們是打算研究自然科學或哲學，或者希望成功

的一個事業家，那種離羣索居，孤陋寡聞的生活，對於我們亦是一種損失，因為我們從實際的羣生活中所接受的教訓常常超過我們得自書本或實驗的效益。總之，羣的生活是每個人全部生活機構中重要的一部分，一切青年必須藉着此種生活來訓練自己，教育自己。

但是我們不是說，任何形態的社羣生活，對於個人的修養和訓練都能生出積極的有益的效果；正和惡劣的書籍足以毀壞許多青年的精神健康一樣，惡劣的社會環境亦能誘引許多青年墮入於腐敗的愚昧的濁濁中。因此在這裏就發生一個問題怎樣使得我們不感受社羣之惡的影響，而接受那些有益於我們的身心修養的良好影響？

很多人主張用遠離惡劣環境的方法去避免污濁環境之沾染，這自然在某些場合亦是可適用的。例如我們自己持有一種嚴格的警惕心，不去接近鄭聲、淫色、力戒烟、酒、賭博，祇要自己堅決，未嘗不能做到。可是我們須知道，存在於社會環境中的惡勢力散佈得非常遼闊，決非消極的遠離方法所能完全擺脫，理想中的純潔的環境在現實中常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我們參加集團的生活的時候，不能忘却了要去認識環境，而用堅強的鬪爭力量去克服一切足以損害我們的身心之惡劣勢力。祇有積極的認識與鬪爭方可以使一切的羣體生活與環境勢力轉變為訓

練自己，教養自己的力量。

雖然和實際的社會接觸，不一定就是要參加某種團體的組織，但團體的生活無疑的是社會生活最真實而重要的一部分。青年們常是通過一定的團體生活而接受社會的影響及影響到社會。古今許多革命家、事業家與學問家，他們在青年時代多半參加着各種的團體活動，有的偏於學術文化，有的偏於政治運動，而他們能夠從團體生活接受各種教益，大都是一樣的。

可是在我們決定參加一種社會團體或羣衆集團之前，我們首先必須要有一種銳敏的鑑別和選擇能力，即必須考察清楚這種團體是否具有前進的促進社會文化發展的意識？它的羣衆份子怎樣？綱領和組織怎樣？斷不能憑着一時的情感衝動或僅僅因友人的勸誘而胡亂加入一個團體，縱使是參加一個不十分重要的團體，也得以謹慎出之。自然，我們對於各種羣衆團體的選擇不能完全依照自己的理想標準來決定，過於信任自己的理想和不顧事實的盲動瞎行，同樣是不正確的。有許多羣衆團體常常暴露各種的弱點，倘使自鳴清高，對它們抱着蔑視的，不屑一顧的態度，這將使自己坐失與羣衆接近的機會，或許使自己永遠生長於孤陋寡聞的寂寥之中。一個團體祇要它不是阻礙社會文化的進展的，祇要它不是給少數人爭奪權利的工具，而

站在正確的軌道上從事一定的社會文化的奮鬥，決不因它自身一些弱點而掩藏着它的光輝。像這樣的團體我們是不妨去參加的。

一個青年既經加入了一個團體——如學術團體、文化團體、政治經濟團體等等——之後，他便變成的該團體之一員。他必須瞭解團體的組織精神，絕對服從團體的紀律與一切決定，個人代替和超過組織的行動是不應有的。不然，他勢必要和團體對立起來。有許多領袖很強的青年，每每不惜用任何手段想在一個團體之內攫取領袖的地位，儼然以英雄自負，以首領自居，結局是將自身的利害置於團體的利害之上，當團體的利益一旦和個人的利益衝突時，他們便犧牲組織與羣衆而與團體背道而馳了，這簡直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每個有思想的青年必須以全副力量和卑劣的領袖慾鬭爭；必須認識清楚，領袖是在長期的工作與奮鬥過程中由羣衆產生出來的，一個優良的領袖不僅須具有組織的說服感化的才能，同時還須充分反映羣衆的要求，代表羣衆的吶喊，這祇有深入於羣衆中間把握住各種真實的精神上和事實上的動向，才能辦到。佳妙的詩歌不是可以勉強死做出來的，它必須是詩人之真情實感之流露，同樣，良好的領袖亦不是可以勉強硬幹而成，這祇是進步的羣衆依據自身的需要與認識選拔出來的。誰

企圖用可鄙的陰謀與卑劣的手腕攫取領袖的地位，誰便是羣衆的罪人，而且我們可以斷言他必然要失敗，要爲進步的羣衆所遺棄。

不論我們在一個團體中，是居於領袖的地位，抑或居於羣衆的地位，我們都沒有理由放棄自己的權利與責任。我們既認定自己全部的或某部分的生活完全屬於團體，那就必須要担負起自己在團體中的任務。第一、對於團體的改進須盡量貢獻自己的意見與力量，當我們發覺團體有某種缺陷或錯誤傾向時，必須立刻在團體中予以指出，並聯合其他的社員提議糾正；第二、在理論上、思想與策略上，須堅持正確的主張，對於同團體的其他社員的主張意見如有認爲不正確的地方，應立即與之作堅決的抗爭，甚至因此引起分裂亦在所不惜，因爲倘使真理在你一面，勝利遲早要歸於你的。但是在爭論的過程中，如果發見自己的意見是不正確的，則不能一味固執成見，而應立刻很虛心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接納別人正確的批評，這又必須在平日要有充裕的理論修養與經驗蓄積，否則，就把握不定自己的主張；第三、對於團體的安全必須竭力保護，凡妨害團體安全的一切行爲必須絕對戒免，尤其要注意使個人的私生活不致和團體的生活利益對立矛盾起來。（金仲華）

新的讀書人

一

中國有三種人。書獃子是讀書，死讀書，讀書死。工人，農人，苦力，夥計，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少爺，小姐，太太，老爺是享死福，死享福，享福死。

一一

書獃子要動動手，把那頭頭腦腦的樣子改過來。你們要吃一帖「手化腦」才會好。我勸你們少讀一點書，否則在頭腦裏養長「痞塊」。工人，農人，苦力，夥計要多讀一點書，吃一帖「腦化手」，否則是一輩子要「勞而不獲」。少爺，小姐，太太，老爺！你們是快樂死了。好，願意死就快快的死掉吧。我代你們挖墳墓。倘使不願意死，就得把手套解掉，把高跟鞋脫掉，把那享現成福的念

頭打斷，把手兒頭腦兒拿出來服侍大衆並爲大衆打算。藥在你們自己的身上。我開不出別的藥方來。

三

與「讀書」聯成一氣的有讀書人一個名詞。假使書是應當讀的，便應使人人有書讀；決不能單使一部分的人有書讀叫做讀書人，又一部分的人無書讀叫做不讀書人。比如飯是必須吃的，便應使人人有飯吃；決不能使一部份的人有飯吃叫做吃飯人，又一部分的人無飯吃，叫做不吃飯人。從另一方面看，只知道吃飯，不成爲飯桶了嗎？只知道讀書，別的事一點也不會做，不成爲一個活書架了嗎？

四

217

有些人叫做蛀書蟲。他們把書兒當作糖吃，甚至於當作大烟吃。吃糖是沒有人反對，但是整天的吃糖，不要變成一個糖菩薩嗎？何況是連日帶夜的抽大烟，怪不得中國的文人，幾乎個個黃

皮骨瘦好像鴉片烟鬼一樣。我們不能否認，中國是吃書的人多，用書的人少。現在要換一換方針才行。

書只是一種工具，和鋸子、鋤頭一樣，都是給人用的。我們與其說「讀書」，不如說「用書」。書裏有真智識和假智識，讀牠一盤。不能分辨牠的真假；可是用牠一下，書的本來面目便顯了出來，真的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

農人要用書，工人要用書，商人要用書，兵士要用書，醫生要用書，畫家要用書，教師要用書，唱歌的要用書做戲的要用書，三百六十行，行行要用書。行行都成了用書的人，真知識才愈益普及，愈易發現了。害是三百六十行之公物，不是讀書人所能據為私有的。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用書人，讀書的專利便完全打破，讀書人除非改行，便不能混飯吃了。好，我們把我們所要用的書找出來用吧。

「用書如用刀，

不快就要磨。

獸磨不切菜，

怎能見婆婆。」

五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在書裏沒有上過大當的人決不能說出這一句話來。連字典有時也不可以太相信。第五十一期的論語的「半月要聞」內有這樣一條：

「據二卷十二期圖書評論載：王雲五大辭典將湯玉麟之承德歸入察哈爾，張家口『收回』入河北，瀛台移入故宮，太液池，雨花台移入南京，城內，大明湖移出『歷城縣西北』。」

我叫小孩們查一查王雲五大辭典，究竟是不是這樣，小孩們的報告是王雲五大辭典真的弄錯了。只有一條不能斷定。南京有內城外城。雨花台是在內城之外，但是否在外城之內，因家中無誌書，回答不出。總之，書不可盡信，連字典都不可盡信。

六

書既不可以全信，那末，應當懷疑的地方就得問。學非問不明。戴東原先生在這一點上是給

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引導。東原先生十歲纔能開口講話。大學有經一章，傳十章，有一條註解說：這一章經是孔子的話，由曾子寫的，那十一傳是曾子之意，由他的門徒記下來的。東原先生問塾師怎樣知道是如此，塾師說朱文公（夫子）是這樣注的。他問朱文公是何時人，塾師說是宋朝人。他又問孔子和曾子是何時人，塾師說是周朝人。周朝離宋朝有多少年代，差不多是二千年了。那末朱文公怎樣能知道呢？塾師回不出，贊歎了一聲說：這真是個非常的小孩子呀！

七

王冕十歲時，母親叫他到面前說：「兒啊！不是我有心耽誤你，只因你父親死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都當賣了。只靠着我做些針線生活掙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雇到隔壁秦家放牛，每月可得幾錢銀子，你又現成飯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說：「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着，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點心錢也不用掉，聚到不兩個月，偷偷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

下看。

現在學校教育是對窮孩子封鎖。有錢有閒有面子纔有書唸。我們窮人就不要求學嗎？不，社會就是我們的大學。關在門外的窮孩子，我們踏着王冕的腳迹來攀上知識的高塔吧。（陶行知）

新的追求知識的三條路

知識對於我們的重要，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我們有了豐富的知識，才可以深切地去認識一切真理，然後才可以依據了所認識的真理，去解決我們的一切問題。所以，無論什麼人都需要知識，都應該求知識。現在，雖然有無數人正在感到知識之急迫的需要，因而都在熱烈的追求，不過他們有許多都只由於本能的激動而無目的的追求，同時他們誤把求知識和讀書當作一件事，以為求知識的唯一法門就是讀書。這原因是由於他們不了解什麼是知識的緣故。讀書對於求知識上固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並不是說就可以包括知識。所以，求知識除了讀書之外，却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知識二字雖然很抽象，無聲無息，但並不是什麼從天上掉下來的神祕的東西，而是產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的。簡單一句，知識是我們對於外界及自身有系統的認識和應付環境而得的實際經驗之總和。所以我們的求知識，是要在各人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求（讀書其實應

該是當作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現在不但有許多人誤把讀書當作求知識的唯一法門而在埋頭死讀書，讀死書，並且還有許多人所讀的也並不是真正的「書」。這樣的求知識的結果，好點也只是事倍功半，不好將為一無所得，或甚至於愈求反而愈糊塗——這樣的情形，現在可實在不少！因此，我很願意將我所知道的一點求知識的途徑和大家談談。

(一) 讀書 求知識雖然不只有讀書，但讀書在求知識的過程中總不失為一個重要的部份。古今來無論那一位大思想家或大科學家，沒有不讀許多書的，而這些書中又包含着各種各類的科目。因為一個人總要受到生命上，環境上的種種限制，對於宇宙間的無數量的事物，任你怎樣的努力，也是不能盡知的，而實際上也無須盡知的。因為當你要研究某項事情時，你不僅對於這項事情的本身要有多方面的了解，同時對於和它相關連的密切事情，也須要有或淺或深的了解，然後你的研究才能深入，才能把握它的真正意義。一個人總要受到生命上，環境上的種種限制，對於這許多方面的事情，有的曾經有過研究的，有的雖曾經經驗過，却還不大清楚的，或甚至完全不知道的。這時，你將怎樣辦呢？如果你要去請教朋友，不獨是不勝麻煩的，並且有許多問題是你的朋友所不知道的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去請教書籍幫助你。

現在且舉一個簡單的例來說：比方現在的日本和蘇聯在目前的中國現狀說，無論誰都應該知道它們的，因為它們是和我們最近的強鄰。但你都沒有到過，並且事實上你也不能去，那你就只有去找各種記載日本和蘇聯情形的書來讀，由書上去知道它。書能告訴你許多你所不知道的各種事情。假設，你有一個機會到日本或蘇聯了，你也只能知道你所到過的某一部份的情形，你如要知道它的全貌，那你又非再去請教書來幫助不可。書又能告訴你許多你已知而還嫌不足的各种事情。

此外，凡是自然界或人類社會的一切演變發展的規律，都可從書中找得。書乃是無數前人和我們時代人的實踐經驗之積聚，包含着人類全部的歷史以及一切學術上的發現與發明。我們讀書，便是利用前人的一切可寶貴的經驗。它能鼓勵你奮鬥的精神，增進你修養的功夫，更能幫助你認識宇宙，認識社會，而進一步去征服自然，改造社會。

(二) 讀書的工具 我們無論做什麼事情，總需要工具，沒有工具就無法製造。譬如木匠如來沒有斧鋸錐鑿等，無論他怎樣的技巧，決不能做出好東西。賽跑的人，如果沒有一個健全的身體和一雙有力而有訓練的腿，無論怎樣他也不能奪得錦標的。斧鋸錐鑿等是木匠製造器具的

工具。健全的身體和有力而有訓練的腿是賽跑者奪標的工具。同樣，在求知識的過程中的讀書這件事，也須要有許多工具。那麼讀書的工具是什麼？讀書的工具最需要而最基本的，就是普通中小學裏的教科書，如國、英、算等等。

現在的青年以至一般人往往有一種誤解，就是對一個在到學校去的普通中學或小學的學生，如果有人問他到學校去是做什么？他的回答一定是「去讀書」，就是那問的人也認為確是去讀書。其實這是錯誤的。我們到學校裏去還不是真正的讀書，而是習學讀書的工具和讀書的方法，同時，也是受一點初步社會實際生活的訓練。在普通中小學裏所讀的科目，有國文、英文、數學、物理……這些東西雖然都是一本本書，但不能算作真正的書，而只能算作各種的工具。讀英文是預備日後和外人接交時能夠說話，在中國書不夠讀時再讀英文的書；讀國文是預備日後能讀多種的中文的書，懂得中國文章的方法，而自己能夠使用它；其餘如讀數學、物理等，也不過爲了日後讀高深的數學、物理等書，並且能算能實驗。

因此，我們應該先把工具讀好，並且要訓練怎樣的運用它。假使你是沒有正式進過學校的，或是曾經進過中小學而仍感到不足的，你就得趕快求儉廣需的工具知識。如有機會進補習學

校最好，不能就努力自習，隨時問人請教，也是一樣。不過你要分別它的輕重，先從最迫切需要的學起。

(三)實際生活的經驗 人是社會的產物，無論什麼人都不能離開社會獨自生存。換言之，只要你是「人」，你一定要和社會發生關係，與社會的關係越密切，則你的實際生活的經驗就越豐富，也就是你的知識的豐富。並且從書本上所獲得的知識不同，書是死的知識，而經驗乃是活的學問。一個鄉下人，他雖沒有讀過書，也能耕種，能生存在社會上，就是因為他有實際生活的經驗，所以「實際生活的經驗」是求知識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項。

就說書吧，它是「人」寫的，書裏所寫的都是著書人的知識。我們讀書就是讀人家的知識。一個人幼時讀書，總是絕對的信任書，以為只要是書上說的話總是對的。待到年齡漸長，有了豐富的實際生活的經驗，同時讀的書也越多，於是對許多書上所說的漸漸起了懷疑，甚至覺到有許多地方簡直是錯誤的。這就因為他是憑他的經驗得到了新的啓發，能夠判別是非了。如果他沒有這些長期的實際生活的經驗，他就不能有許多活的學識，用「一切現實的「事理人情」來判別書上所說的話。

我們知道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是動的，不斷的演變發展的。書本上的知識，是死的呆板的知識。書是人類實際生活經濟的產物。書上的知識幫助你去認識社會，而社會的實際生活的經驗更能改正書上的錯誤，也就是能使你的知識更加豐富。

再舉例來說，譬如一個陌生的人跑到上海來，縱然是事先他是讀過甚至能背誦「上海地圖」的，最多他也不知道一個東西南北和到什麼地方應乘幾路電車等等，一旦遇到一條地圖上沒有的小路，也就沒有了辦法。就是他所記熟的幾條大路，也決不會沒有弄錯。總不及曾經在上海住過一年半載的人來得熟悉。然而反過來說，他總要比那事先未嘗讀過上海地圖而單靠瞎闖的陌生人要便利得多了。所以我們應當知道，讀書是幫助經驗的不足，但是讀死書而無實際生活的經驗，是不能有進步的活的理解的。比如大發明家愛迪生，他一方面從書本中獲得前人的經驗，發明一方面更要靠自己去實驗，如來他沒有一次一次的實驗，怎會有這許多發明呢？所以歷來有許多人，雖是「胸羅萬卷」，但因為他不去多與社會接觸，不把從書上所得的知識和社會實際生活的經驗的知識配合起來，結果只成了一位「書獃子」，一部活而又不能取用的「萬有文庫」而已。

總括起來說，我們求知識的主要條件，除了基礎的工具知識以外，其次就是讀書和實際生活的經驗，關於讀書方面我們的第一主張是「活讀書」，古人雖然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話，在原則上雖然承認「書」應當「活讀」，然實際上我們的古人以及許多自命為讀書者的今人，仍多是過着書齋的生活，很少與社會接觸的實際經驗，所以雖有活讀書的理想，而結果仍不能跳出一書」的範圍以外。我們看看歷史上，凡是在學問上事業上有點成就的人，比如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司馬遷、杜甫、王安石、朱熹、王陽明、文天祥、金聖嘆、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朱教仁、朱執信、廖仲愷等，他們之所以能有獨創的見解，說出前人所未曾說過的話，發動了革命的思想，和事業，就是因為他們都有極豐富的實際生活的經驗，決不是死讀書拘泥於「書」上，而是以自己的經驗與書本子融合起來，成功一種新見地，這新見地就是他們的偉大。因此我們的第二主張就是「讀活書」，單讀他人已有的經驗所寫成的書是靜的書，仍還不夠，尤其需要實際生活的經驗，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如何可使你實際的經驗豐富呢？那就要注意社會上一切活動的事物，這些活的東西就是活的書。比方「你」，「我如果要研究「你」，「那你就是一本活的書，我研究後所得的知識，就是活的知識。我們對於社會上所發生的問題，均應作如是觀。就我們的

需要與理解把它活讀起來，這就叫做「讀活書」。

我們看到目前社會上一切現象的頹廢，不振作，如將要死去的樣子，歸根的研究起來，實也未嘗不可說是由于上上下下讀書者死讀書讀死書的人太多的結果。要挽救它，就唯有反過來請大家根本上改變過去對於讀書的觀念和認識，那就是要「活讀書」，「讀活書」，然後這整個社會民族才可以慢慢蘇轉的「活」過來。（李公樸）

新的思想訓練法

一

在前面我們已介紹了最新最正確的思想方法，但是這些方法如果不能與實踐聯結起來，在實際上去應用，使之變成爲思想的軌道，則縱使能理解這種思想方法，依然無裨益於我們的思維活動。假使我們僅僅記得幾個死的公式，完全不將這些法則應用到實際方面去，我們怎能使自己的思想與此種邏輯相符合呢？並且我們怎樣能證明此等法則之正確？怎樣能理解它們在實際方面的千變萬化呢？所以實在說來，邏輯的方法不過指示我們思想的總的路線，必須要依據此種路線去運用自己的思想，才可以使自己的思想取得日益銳利的武器。這樣，就發生思想訓練的方法問題了。

思想訓練法是含有濃重的技術的意味的，這兒我可以打一個比方來說明此種技術的意

義。譬如學習唱歌，你便必須依照最好的方法去訓練你的聲帶，設法使牠能夠為你運用自如，同時你又必須訓練你的聽覺，使你能在任何時候能辨出各種聲調之高低、抑揚、大小，使牠們很靈敏地能夠傳達並保持於你的記憶中。再次你還要練習看樂譜的能力，直至你一拿起一部新的樂譜即能毫不感到阻滯地唱下去。這是音樂在官能上的一種技術訓練。思想訓練當然比這要複雜得多，但它實際的意義亦是要使全部的官能與神經系統能夠轉變為思想最靈敏的工具，不使任何一部分的逆勢力對它發生阻礙。不過除此而外，思想訓練更要使經驗（包括智識）轉變為思緒的擴張者，所以它又不能視為單純的機能訓練。

思想訓練的第一個基礎條件，就是感官的訓練。因為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過，思想是以感覺為基礎的，倘使一個人的感官很遲鈍，他的感覺必然遲滯，而思想當然亦不會靈活與豐富，因為它不能源源取得反映外界的表象之聯絡。各種感官能夠很靈敏地運用，這無疑的對於思想的推動力量是很大的。不過關於這個問題牽涉到心理學的地方很多，我們不必多事討論。這裏只要指出，感官的磨練對於思想的作用很大就夠了。

除感官的訓練而外，思想訓練的主要內容，還在於使思想適應當前實際的與智識的環境。

這就是要使得每一個客體（自我而外的一切事物與環境）不但不成爲思想的擾亂者與妨礙者，而且使得他們都轉變爲開發思路的啓示力，都轉變爲供給思想上的素材的資源，因爲一切的真理及其規律都包含於客觀世界之中，若果我們的思想能上軌路，則被認識的客體（世界）與認識主體（自我）之間的對立必能統一起來，並互相滲透着（世界供給我們以思想材料，而我們又影響到世界）。然後我們的思想能深入於世界一切現象之內部，而不致彷徨於其外。一個有思想訓練的人，其對環境的關係，是與一個沒有思想訓練的人全不相同的，後者是環境與他自己之間的聯結異常薄弱，環境常常成爲阻礙他的思想之逆勢力，而前者則與環境融洽異常，環境即使是很背逆的，而一切事物之感覺亦能不斷變成爲他的思想之泉源。

二

以下我們要進行檢討上述的思想訓練之第二個內容，卽思想與環境之適應的問題。

訓練思想達到正確與豐富的第一個條件，是對萬事萬物的懷疑態度。因爲我們承認真理常是相對的，在未達到絕對真理的境界之前，許多事物都是值得我們懷疑的。哲學與科學上的

無數發見與發明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由懷疑而來相傳馬革斯有一天和他的女兒勞娜與小燕妮在一道遊戲，他的女兒提了十多個問題問他，馬革斯都一一答覆了。內中有一句是問他「最中意的警語是什麼？」他回答說：「對於萬事都懷疑。」這位偉人所愛好的格言給了我們訓練自己思想的一個鎖鑰。

可是我們必須認清楚，所謂懷疑是與哲學上的懷疑主義 (Scepticism) 不相干的。懷疑主義是根本懷疑客觀世界的真實性與真理之存在，認為人的認識能力是不足恃的，這實在等於否認智識成立之可能。由此推論下去，思想當然亦不可靠，人類的一切努力都成為徒然的了。這種懷疑主義曾經為謝林 (F. W. J. von Schelling) (一七七五——一八五四，德國哲學家) 與休謨 (David Hume) (一七一一——一七七六，蘇格蘭哲學家兼史家) 等所主張。如果接受此種懷疑主義的影響，那必然要使我們和真理遠離。在這裏所講的懷疑是含有兩重意義的：第一，是不要為事物與學理的外表所眩惑，而應使觀察思考深入到它們的內層；因為並非一切事物一眼前上去即是和原來的真面目一模一樣的，它們常常帶着或多或少的虛偽性或現象性（現象性是指那與實象不甚相符的外觀性質）。倘使不加細察，就容易為牠們的外觀現象所蔽。例如我們單憑老實的觀

察，就覺得太陽是東出西落的，如果爲這種外表的現象所眩惑，勢必要使我們發生太陽繞地球而運動或在天上自東而西運行的錯誤觀念，而完全忽視了地球自轉的實象。又如我們如果相信日帝國主義者所宣傳的日本人口過剩是其向中國發展的唯一理由，這種說法是對的，而毫不加以懷疑，我們就必然要變成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贊成者。第二，所謂懷疑是要我們處處和流行的迷信與成見鬪爭，生在今日有頭腦的青年固然不致於爲鬼神一類的迷信所蔽，但往往有許多社會上政治上甚至學術上的迷信容易將我們的思想禁縛住了。譬如對於世俗的名人、英雄的迷信，對於世俗的所謂學術界的「權威」之迷信，這些都是我們思想發展的障礙物。在另一方面，流行的積重難返的成見也是最要不得的。譬如看見某些人鄙視某種有價值的接近真理的學說，思想而加以反對，自己亦隨聲附和，不辨黑白，這將使我們永遠不能和這種學說接近，在思想上豈不是一個鉅大的痛心的損失嗎？孔子說過一句名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意思是說一個人早上聽見了真理，就是晚上死去也可無憾。這句話固然未免過火，然把它當作一句追求真理的格言來看，是有意義的。一個人如果終生與某種重大的真理隔絕，那簡直是生命史上一個填補不了的大缺漏，因爲他失去了許多發展自己的思想能力與貢獻自己於社會

的機會。其實使人們和真理隔絕的，就是積重難返的成見，成見與迷信可以說是姊妹行，它們都是代表世界的黑暗面，攔阻人們走向光明的去路的。

必須處處不爲外物所蔽，不爲迷信與成見所囿，在積極方面根究事實的本質與源流，而打破迷信與成見所加於我們的壓迫，這樣才能使我們的思想展開新的天地。托爾斯泰自少即對於流行的成見與迷信懷疑（可惜還不澈底），這樣形成了他全部輝煌的生活。所以在這裏所說的懷疑是與懷疑主義者的「懷疑」風馬牛不相及的。因爲我們絲毫不懷疑客觀世界之真實性。不懷疑客觀真理的存在，更不否認我們對於外界的認識作用。一種學說或思想、主義如果真的是能代表真理，有事實做根據的，我們爲什麼硬要對它始終懷疑呢？假使事事都無理由地予以不信任，我們的思想將永遠找不着歸宿之地，最後連自己都要懷疑起來，除了自殺或厭世之外，還有別的路可走嗎？所以懷疑的意義是有限的，有條件的，「矯枉過正」適足以迷亂自己的思想。

思想既必須依靠着對於客觀世界的概念之不絕的獲得始能發展，那我們要使思想充實豐富起來，除了讀書及作種種的學習而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於實際作永恆的觀察。觀察的目的：第一、要由實際證明我們的思想是否正確，因為在確定一種信念與認識之前，我們並沒有十分的把握保證此種信念與認識之準確，只有將它們與實際相印證，始能取得相當的憑證，而我們的思想亦不致於飄浮在半空中；第二、是要收集實際的材料以充實所學得的理論之質，量因為我們由書本上所得到的理論，畢竟是有限的，它們多半只能告訴你重要的原則與規律，基本的概念與軌範，必須要自己親自從實際的生活與經驗中蒐羅各種活的具體的材料，然後思緒始能源源而來，由此必然使得你的思想不致有枯竭之虞；第三、是要增大我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因為我們如果不留意實際的情形，就無從將我們所學得的理論應用於實際，徒然記得許多公式、法則與概念，這必然是空虛無物的。譬如要真切理解物價變動的原理，單是知道一些關於供求律的理論就很不夠，因為書本上對於這一類的理論是不會很具體的，每一個物價變動都有着它的具體原因與特殊規律。

總之，觀察不外要使得我們的思想準確、充實及具體化、實際化，利用實際的經驗與智識來

補充我們的理論之不足，而將理論與實際融為一爐，以理論來剖解實際，以實際來證驗理論。

所謂觀察是包括下面兩點的：第一是察微，即是留意於每一個具體的現象與問題，由此求得真理與真相的發見。許多大科學家、藝術家就是靠着此種精神獲得他們的成就。例如伽利略有一天在羅馬教堂看見神前吊燈搖蕩空中，往來不輟，以指按脈驗其往來時間，見其每次時間均相等，遂悟鐘錘搖擺的等時定律。牛頓有一次看見蘋果落地，就研究爲什麼蘋果不向左右落去，而獨向下墜，因悟萬有引力之理。達爾文有一天在一個花園附近發見一種古代建築物的殘餘，因悟蚯蚓對於水門汀基地、牆壁以及土壤的作用。瓦特少時因見水沸衝動壺蓋，而悟蒸汽動力之理。這些故事想必讀者諸君都是熟知的。我現在可再舉一個現代科學界泰斗爲例，那就是愛因斯坦。有一次英國泰晤士報一個記者問這位大科學家，他的宇宙引力之相對論的思想從何處來，他回答得很有趣，說有一天他在路上行走，看見有一個泥水匠從屋上墜下來，而未受重傷，他就問那工匠跌下來時的感覺如何？工匠回答說，沒有別的感覺，只覺得全身的重量都失掉了。他遂由此悟到引力的相對性，而創立了引力的相對性原理。德國物理學家赫琴曾經在研究陰極線時，注意到真空管旁邊的東西發出螢光，因而發見X光綫來。這些都是科學家察微的成

就。至於文藝家亦何獨不然？我們看法國大小說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一八五〇—

一八九三）法國自然主義派大小說家，描寫人物事情那樣細膩逼真，全是由他從小運用自己的細微觀察所致。相傳莫泊桑有一位先生有一次命他去觀察十餘部馬車，教他描寫出每一部馬車的特性來，寫得各不相同。假使沒有精細的觀察，怎麼可能俄國文豪托爾斯泰也是以描寫精細微妙動人的，亦不外善用他的觀察力之故。當代蘇聯文豪高爾基每一篇小說的題材與技巧，都無不是由他平日長期的細微觀察得來。可以說沒有一個文藝家的創作是缺少觀察——特別是察微這層工夫的。

第二是考究，這與上面察微是相關聯的，光是察看留意，而不能將具體現象的變化規律體會出來還是不夠的，必須要在目擊一種現象之後，即立刻發生問題，考究其發生的原因來，然後觀察始不致白費。無數的人看見燈的搖擺，何以獨伽利略能由此發見物體搖擺之等時定律？無數的人看見過蘋果落地，何以獨牛頓能發見萬有引力律？無他，這些科學家能於目擊一種現象時，運用自己的思索根究其爲什麼的原因來而已。馬格斯威爾在童年時代就慣於發問：「那是怎麼一回事？那有什麼作用？」並且反覆問：「它的特點是什麼？」高爾基一生中遇着每一種特

務的事象總得要問問自己「究竟爲什麼？」這種精神是大可爲我們效法的。不過要知道，所謂考究並不是要去研究那些煩瑣無益的問題，像岑譚尼澤（Chernitzker）（爲十九世紀俄國寓言小說作家，其生卒年不詳。）寓言裏面所描寫的玄學家一樣。岑氏有一篇寓言說有一個玄學家跌在土井裏，別人丟下一根繩索救他，他老先生卻在井中大研究其繩索是什麼的問題。弄得那救他的人大大不耐煩起來說：「你這書獃子讓你坐井觀天吧，誰管你來！」要是我們學到這書獃子式的玄學家的「研究」脾氣，那是糟糕的。現在有些淺薄的人常用辯證法一類的口頭禪來解答許多瑣碎不要緊的問題，如說男女兩性的鬥爭是辯證法上的對立物的鬥爭。某人大發雷霆之怒，是辯證法上的突變，這都是拿辯證法開頑笑的把戲，和這位書獃子哲學家的精神是很相近的。我們要考究那些於我們的知識有益的問題，要考究那些爲人所不注意或自己向未注意的問題，這才不致白白浪費思想與精神，否則徒貽人以笑柄，又何貴乎有「考究」。

四

思想訓練的第三要素就是批判，批判是近於懷疑而又比懷疑更進一步，借重觀察而又比

觀察更繁複的思想過程批判力可以說思想能力當中最重要的一種。一個大科學家大思想家的生涯中極可珍貴的武器是批判，這種批判生活是帶有濃重的戰鬥意義的。如古代蘇格拉底批判詭辯學派（詭辯學派為希臘流行於紀元前五世紀間一種哲學派別，其著名代表為勃羅塔哥拉士（Protagoras）與高吉士（Gorgias）等）完成了他的偉大哲學系統，雖然他的哲學在現今很值得我們批判，但在古代它是有很大成就的，這種成就全是由他的批判精神得來。十六世紀培根（Francis Bacon）（一五六一——一六二六，英國大哲學家，近代科學界鼻祖）批判了古代由亞里斯多德一派相傳的演繹論理學（「演繹論理學」就是依據演繹法建立起來的論理學體系，其根本精神是田一般的原理推求特殊的事理，參看本篇第三節）與形而上學，推進了科學方法的發展，他被人稱為近代科學的奠基者。哥白尼批判了托勒密的天體系統，發動了天文學上的大革命；拉瓦謝批判了燃素說（「燃素說」為十八世紀對於物質燃燒之學說，其說謂物之能燃者，是由於物中燃質（Phlogiston）外逸，而不知是氧氣作用。至拉瓦謝，此說始被打破。燃素說倡於貝克爾（Becher））完成了化學上的大革命，達爾文批判了神造萬物說，成功了生物學上的大革命。近時愛因斯坦又批判了牛頓的絕對引力論，而開始了物理學上的大革命。此外尚有其他重要的科學革命都是由批判導來，這裏不再贅述了。

所以批判是人類思想進步的推動力，對於全人類思想是如此，對於個人思想亦何獨不然？不經過批判的思想無論如何是帶有幾分盲從性與幼稚氣味的。托爾斯泰(Leo Tolstoy)在青年求學時代有一種嚴峻的批判精神，對於社會的成見與智識界時常作出不假借的批判，這是他的思想高超處。我們亦必須養成自己的批判習慣。所謂批判是包括兩面而言的，即一方面是對於客觀的事物與思想的鬥爭，他方面是對於自己主觀的錯誤思想與不正當生活形態的鬥爭，前者是客體批判，後者是自我批判。

批判是必須要有一定的方法與理論觀點做基礎這是不待言的，它包括下面幾個程序第一、是分析與綜合，這首先需要對被批判對象有着整個的全面的了解，然後從中找出它的弱點與錯誤來。許多人濫用批判，就是因為對於對象的全不了解或了解不夠。例如有些浮薄的人對於別人的學說一點不懂，或僅僅抓到一兩點無關大體的地方，即濫下批評，這無論如何總是一件冒險的事情。我們必須要在對於某種事物引起了懷疑之後即予以縝密的觀察，然後再加以剖析，把握住它的中心點，綜合為一新概念。

其次是證驗，即搜集關於與批判的問題有關係的材料，來證實我們由分析與綜合得來的

概念是否正確。

第三、是判斷，這可以說是批判之最後一步。關於判斷，我們在前面已講到過它的性質，知道它是構成思想的一個重要因素，現在我們在此處所講的判斷是更狹義一些，因為這是特別着重於它的批判意義的。既然對於一個對象分析並綜合了其特點，並且舉出憑證出來證明了這種分析與綜合之正確，此後更深一層就必須擴大並加強上述的概念之意義，以得出更高的論斷，這便是判斷，所以這和前面所講的暴露及聯結諸概念的判斷，其意義是微有不同的。

五

實驗與觀察的意義似乎很接近，而其實是更為寬廣深邃一些的。天文學家在研究天體現象時，不能不憑藉觀察，但他有時亦不能不藉助於實驗，例如天體力學（「天體力學」乃是一種研究星球運動的關係與規律之力學）就需要高深的數學物理學，而物理學是缺少不了實驗的。有時爲了要測量太空中的一些特殊現象（如宇宙線等）就需要上昇空中作實驗。至於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科學那是更不能須臾離開實驗，差不多沒有那一種自然科學是不需要實驗的，實驗可以補

觀察之不足，廣義地說來，觀察亦不過是實驗之一部分罷了。其實在社會科學上，又何嘗不是如此？由實驗得到的知識比由單純的觀察所得到的，是必然要更爲真切，更爲可靠，而且更爲豐富。因爲社會現象變化萬端，必須要於長期的觀察之外，親自去接觸，去體驗。自然，社會科學上的實驗與自然科學上的實驗是不相同的，因爲我們不能將某些社會現象拿到實驗室中用器具、化學藥品、機械，將它解剖、化驗、運動或通以電磁，也不能用顯微鏡、望遠鏡、X光線等去窺測其究竟。我們唯一的方法只有兩種：第一，是親自去參加社會的各種運動與集團生活，從中作各種的體驗，例如我們到下層羣衆中去，多與他們接觸，或自己親自參加他們的生活，必然可以得到許多。爲我們在書本上或憑藉單純的觀察所得不到的智識。不但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須有此種實驗精神，即一個文學家、藝術家亦必須如此，空中樓閣與閉門造車的創作，那是什九要失敗的；第二，就是從事各種實際的試驗與調查，如組織文化團體，對各種社會現象作實際調查、統計，都能使我們的思想正確充實起來。我們可以由一個組織中窺見社會變化的縮影，可以由調查、統計中窺見各種社會問題的實質。自然，個人的力量在這一點上是無論如何不夠的，必須要用一種集團的力量去辦理，才可以事半功倍。至於那種最大規模的社會實驗，那就是一個集團的力

量也辦不到。

最後我們要認識清楚，實驗是必須與正確的理论相聯結，而顧到客觀的必然性與可能性，它決不能從幻想與空想出發。在歷史上有一些烏托邦社會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是指基於空想感情與道德上的初期社會主義，如聖西門、奧文、傅利葉等就是這種社會主義思想家）者作過種種的新社會實驗，但通通歸於失敗了，這就是因為他們全然不懂得社會客觀發展之必然性，不顧到客觀的實際的需要與可能性，而唯一味憑藉主觀的空想去施行某種實驗。例如傅利葉曾經幻想創立一種共產團體，叫做「華輪蓋世」(Phalanx)，後來他死後，他的信徒依此種空想建立了許多實驗團體，都一一失敗了。又如奧文曾經建立過一個規模很大的公產團體，叫做新諧和社(New Harmonia)，到頭也失敗了。總之，幻想在不變革現狀的現存社會範圍之內作各種改造社會的實驗，這全然是吃力不討好的。現在還有許多人幻想建立新村來實現自己改造社會的理想，當然亦是沒有根據的，日本的武者小路實篤(Mushakoji)(一八八五——日本作家)是一個篤信新村運動改造社會的人，但是他的新村運動至今如何呢？我們是不要做這樣傻子做的實驗的，它只能將我們引到失敗與空虛的幻滅路上去。

六

末後，我們還須說到鍛鍊思想的一個重要注意點，那就是對於自己的思想體系之堅定，所謂思想的堅定是包括下面兩點而言的：即第一是對於問題應有耐久的堅忍的精神去研討。牛頓大家都知道是一個最謙遜的學者，有一次有一個人問他，爲什麼能有如此驚人的科學發見？他回答說：「思索，繼續不斷地思索，以待天曙，漸進乃見光明……假使我對於世界有些微貢獻的話，那不是由於別的，祇是由於我的勤耐的思想所致罷了。」真的，祇要我們肯繼續不輟的思想，何種問題不能解決？原來我們的思想常是循着量質互變律而發展的。當我們研究某一問題，最初思索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可是再繼續地思索下去，就恍然大悟了。自然，這種思索是需要相當的智識做基礎，臆想乃是不可能的。第二點是要由思想昇華（昇華本爲化學上用語，引申爲由低級的發展到高級的意思）爲一種正確合理的信念，而由此將自己的思想體系建立於一種強固的基礎之上。這種信念是與宗教的信仰全然相反的，因爲它絲毫不帶偏見的與情感的色彩，但它具有一種堅忍不拔的戰鬥精神，這是無疑的。我們前面所說的白魯諾與伽利略爲自己的學說信

仰而犧牲，就是思想堅定的模範人物。我現在再舉出一個很有趣的人物來說明這一點，這個人就是前幾年（一九三三年）來華的英國文豪蕭伯納（Bernard Shaw）（一八五六—英國當代戲劇家）。有一回青年蕭伯納和許多朋友談論到宗教的問題，有一位朋友講了一個故事，說是曾經有一個人因毀謗上帝而被雷擊死，由此便引起了在座的宗教迷信者與宗教懷疑者之間的激烈的爭辯。其中有一個人就說當日有一位無神論者名叫柏拉德勞夫（Bradford）的爲了此事而當衆拿出錢來，宣佈若上帝認爲無神論不對的時候，可在五分鐘內給他用雷擊死，相信宗教的一派駭極方否認此事。這時蕭伯納看得兩造爭論不休，不耐煩起來了，他便立起來說，柏拉德勞夫這種方法是很對的。不管他曾經有沒有這樣做過，都不成問題，若果他沒有做，也不妨事。最後他大膽無畏地說：「我的意見是贊成柏氏的，若果他真的不會實驗，讓我來替他實驗吧。」說着他便取出錢來了，金座爲之相顧失色。這個有趣的軼事是表明了這位大文豪思想堅定的大無畏精神。我們應效法這種精神，若果思想忽此忽彼，不敢替真理駁斥迷信與錯誤，不能成爲堅定一貫的思想系統，這與其說是思想的紊亂，不如說是思想的破產，一切的學習、研究都變成爲無用的長物了。

臨了，我還要提醒讀者，就是一切的思想訓練方法都是離開不了新的邏輯法則的，不管是觀察也好，批判也好，實驗也好，總得要基於正確的邏輯體系之上。譬如就戰爭理論的批判方法舉例來說，倘使不從每一個戰爭中各人羣的聯繫來考察，不從每次戰爭的具體情況中來考察，我們怎樣能夠成立正確的批判與結論呢？所以思想的訓練單是偏重於技術與規準方面，是萬分不夠，而且容易陷於空虛錯誤的，必須要建基於邏輯的理論法則之上，而和上述的諸方法配合起來，思想始能在堅實的廣大的地盤上開展。（平心）

戰時的青年知識

全一冊
實價五角

編著者 陳健夫

出版者 新知識書店

經售處 各埠新書局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廿七年六月十日再版

54



753.12
65605
7535